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二 2023.08

小鳥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 | 田野中国

再见，小李子水果店 | 小鸟问答

这些到底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 接力访问

托马斯·哈代传 | 新书推荐





## 小 说

新书试读 | p5 门：一位女作家的自白 萨博·玛格达  
p11 绕到你左边 菲奥娜·基德曼

## 非虚构

田野中国 | p21 温州人林先生的故事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① /  
p29 温州人林先生的故事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② /  
p35 温女士，一个家族创富标本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③ /  
p43 柴博士曾经不可言说的未来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④ 伊险峰  
新书试读 | p51 来自铁路的二十四封邮件 程新皓  
p59 约翰·列侬：小野洋子是我的老师 大卫·谢夫  
p65 “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你还有吗？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  
p71 医疗，一个关于权力的世界 保罗·斯图尔特  
p85 托马斯·哈代：裘德般的“傻瓜”和“顽抗者” 迈克尔·米尔盖特

## 专 栏

接力访问 | p93 058 唐浩多 应对暴力：从《家暴图谱》到“无墙幼儿园” /  
p99 059 丸仔：“他们什么都做得到，什么都不会错” /  
p105 060 似玉：当初设定的“35岁退休”达成，就快乐了吗？ /  
p109 061 陈逸飞：后来我明白了，你不必凝视旧系统里的道路 /  
p117 062 小泉：感知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一种能力 /  
p123 063 梁莹菲：“我不想离社会太远，但是我又不想太进去” /  
p129 064 甘道夫：别想那绳子！杨樱、伊险峰



题图为电影《书店》(2017)剧照

## 小鸟问答 Vol.31

### 小鸟 | 小鸟问答

八月了。

i

#### 什么城市不配有菜店有书店？

浏览新闻标题，说上海有一平方公里那么大的地标性建筑；还有，要向特大和超大城市“城中村”宣战……去年五月底的时候，上海所有人都意识到封控就要结束了，大人物们当然更知道抓完革命之后要促生产了。当时他们誓言要加快城市旧改——过去几个月的防控经验说，那里传播疾病而且不易管理。确实，不擅长用一根铁丝控制住整个楼的人。现在，他们现在喜欢用运动的方式来抓经济。

突然说起了经济，有点奇怪？

起因是巨鹿路小李水果店关掉了。那是一个有二十年历史的水果店，终于还没挺下来。经营收入覆盖不了房租，两代小李，尝试了卖酒、卖冰激凌、卖菜，与此同时矢志不渝在卖水果……终究不行。去年这个时候因为一把鸡毛菜被检出农药超标（又不是自家种的菜超标，何况进货人从何得知它是否超标），又无法提供进货证明（都是早上四五点去大市场批发，几十年什么时候给过证明？），被罚了三千块钱。回头来看，过去一年还不错的时候竟然是封控时期，供应和需求终究都能破除万难到达这个街坊老店，生意竟然还能偷偷做得下去。

一个菜店生存不下去，总归是有各种原因，但你要说它是正常的，我是反对的；你说他们一家做了二十年而没有市场经验，我也是不相信的；你说这也是没办法，我觉得这个论调十分熟悉又十分不可思议，这么多年，“没办法”作为办法是不是回答的问题有点太多了？

就像几年前，上海一家书店要关门，有做经济报道的人跑出来说明它就是经营不善，任何人都不应该带节奏……她的潜台词是说上海没有资格拥有一家能够正常经营下去的书店，我也是要反对的。

以运动的方式进入到经济运行中来，结果都必然以失败而结束，不管它想做什么，是否有好的初衷。

ii

#### 一种虚拟语态的未来完成时

在得知小李水果店要关张的消息时，想到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拿出这样一个说法：“我们终于是挺过来了。”

然后，被自己吓了一跳。

真到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会要付出多少代价？这里有多少是无谓的付出呢？那天还有一个新闻说，要把随申码升级为市民码。想起一部老电影的一句台词，“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

iii

#### 阿希耶赫并不期望奇迹会出现

看了一本叫《伊朗的灵魂》的书。书中说：

“对于那些因为相信哈塔米的承诺而感到恼怒的人，阿希耶赫·阿米尼对于他们的感受并没有强烈的体会。但相较于1997年，阿希耶赫觉得自己对于2005年总统大选的胜负更加关注。她并不期望奇迹出现：民主、言论自由、解放的市民社会。她不认为国内能与强硬派一较高下的候选人，也不认为人权支持者能敌得过司法部。她只希望跟政府之间能有合作的空间，有脱落的线头供她拉扯，在国家沉重的盖子之下能有些许针孔供像她这样的活动分子呼吸。她为女性、青少年与伊朗法律下生命的神圣性争取权利，这是个漫长而缓慢的路途，无论谁当总统，这一路上都将遭受敌视。”

iv

#### 玩笑

参加广州的一个社群活动的时候，一位分享者说，他们最怕开玩笑，所以我们不要以玩笑精神来对待他们所有的暴力。

米兰·昆德拉去世了。他写的东西和这句话意思差不多。

第二代小李有一段时间里也想在小李水果店搞各种社群活动，因为房租太贵，再加上封控，被迫中断，卖雪糕券儿也没能挽救回来。

在“开玩笑的成本”这一点上，上海比广州要弱势不少。

v

#### “小鸟与好奇心奖”

这是一个消息。小鸟文学即将与“在场”合作推出“小鸟与好奇心”奖项。

在作为发布媒体和非虚构写作奖学金“在场”合作两年之后，我们达成了这样一个合作。具体内容如下：

在获得“在场”赞助奖项的选题之外，这个奖项意在为在场的参与者提供更多机会。它关注点除在场的社会责任等要求之外，同时会强调：

——“文学性”，注重文本的文学价值；

——“长线操作”，好奇心不是猎奇，而是在更长远的生活中发现价值；

——“在地性”。

入围者将会获得：

- 1) 小鸟文学将提供有足够经验的非虚构写作编辑指导，完成度高的作品将在“小鸟文学”app 上刊登。
- 2) 小鸟文学将借助其广泛的出版资源，与国内一线出版机构资深图书编辑合作，提早介入选题，提供辅导，成熟文本进入出版流程。

vi

#### 乐观

小鸟文学在看很多选题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共同特征：苦。

苦难当然有被凝视的价值，我们不回避这一点。但我们还是希望于苦中也能有平常心，就像阿希耶赫所说的，哪怕有一个线头，或者像社群分享者所说，要以玩笑对抗黑暗。或者用更冷漠一点的眼光去说，我们看到了哪些变化？我们会为哪种变化纠结？这种注意力的投注是否值得为之付诸思考和梳理？

试着在苦之外发现更多。

你会看到有人说，宽容与爱。

你还会看到有人说，你先把掐在脖子上的手移开之后，我们再说宽容。

乐观不是宽容。乐观是总相信还有希望，而不是堕入虚无。

就像我们相信上海有资格拥有菜店，拥有书店一样。

vii

前面说的那部老电影叫《芙蓉镇》，它更经典的一句台词是，“运动了”。

viii

这一卷的封面小鸟是黑脚企鹅（*Spheniscus demersus*），又名非洲企鹅、斑嘴环企鹅或公驴企鹅。

如果需要联系我们，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为电影《门》(2012)剧照

##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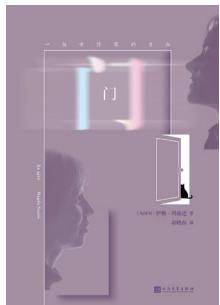
# 门： 一位女作家的自白

萨博·玛格达 | 新书试读

匈牙利国宝作家代表作

萨博的这部小说探讨了生存的技巧，探索了如何从沉默中寻找声音，探寻了本真性如何冲破各种虚伪的迷雾——不止是在艺术、文化等领域里，更是在真实生活过、真实离开过的人的生命中。——阿莉·史密斯

《门：一位女作家的自白》探索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的幽微关系。玛格杜什卡是一位作家，生活优渥，地位显赫。艾梅兰兹是一位农妇，勤劳而粗莽，似乎永不显老。她独自住在一间别人永远无法踏入的房里，她的门永远对他人锁着。她成了作家的管家，料理着作家的生活。时间赋予了她们默契，她们以各自的方式爱着对方，乃至依赖对方，却似乎忘记了亲密关系的危险。在玛格杜什卡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艾梅兰兹的门也被打开了……



## 门

我很少做梦。即使做梦，通常也会从梦中惊醒，全身湿透。这种时候我便重新躺下，等待狂跳不止的心复归平静，沉思着黑夜中这种无法抵抗的神奇力量。我在童年或少年的时候，既不做好梦，也不做噩梦，但是衰老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将过去沉积物中已然变坚硬了的恐惧向我冲卷而来，之所以那么可怕，是因为它们要比我亲历它们的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感到压抑和悲凉，想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尖叫着从梦中醒来。

我的梦境永远是一样的，分毫不差，回顾那些幻象，我总是梦到相同的内容。梦到我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楼梯口，在一扇铁框架上嵌着防爆玻璃的门的里侧，试图打开门锁。外面街道上停着一辆救护车，透过玻璃窗看到医护人员闪闪发光的剪影扭曲地变大了，他们的脸不仅肿胀还泛着光晕。钥匙转动，但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我无法打开门，我必须让救护人员进入屋内，否则就会耽搁对病人的抢救。门锁纹丝不动，就像是被焊接到了铁框上一样，我大声呼叫，但是三层楼的居民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事实上也不可能注意到我，因为我发现，我只是张口却说不出话来，就像鱼一样。梦境中的惊恐的顶点是我头脑中突然浮现的这个念头，我不仅无法打开门救人，而且还失声了。经常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自己的尖叫声吓醒，然后打开灯，努力控制自己醒来之后剧烈的喘息。在我们卧室里摆放的依旧是那些熟悉的家具，在我们的床头上挂着家族先人的肖像，他们身上穿着巴洛克或比德麦雅式风格的匈牙利传统服装，全是笔挺的高领和饰有荷叶边的外套。我全知全能的先人啊，他们一同见证了我多少次在晚上冲到楼下去给医疗人员和救护车开门，多少次默然地伫立在那里，静候沙沙作响的树叶声以及透过门缝传来的野猫叫声打破清晨街上的寂静，我无数次思忖，倘若我和钥匙的斗智斗勇失败了，最终也没能打开门，那又会怎样。

这些肖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也知道我宁愿忘记的事情根本不是梦境。有一次，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不是在睡眠时脑缺血的状态下，而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一扇门在我眼前打开，那扇门从来就不曾打开过，屋里的人守着自己的孤独和无助的痛楚，哪怕头上的屋顶在噼啪作响地燃烧。这个门锁只有我才有权利打开：那个转动钥匙的人，要比信任神还要信任我，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就是神：睿智、谨慎、善良、理性。可我们都错了：信赖我的那个人也错了，自视过高的我也错了。当然，现在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早已无从补救。所以穿着鞋底增厚的医用工鞋、戴着悲剧假面和急救人员制服的复仇三女神厄里倪厄斯啊，请你们经常光顾我的梦乡吧，手执双刃宝剑，围在我的床边。每天晚上我熄灯的时候，心里就静静地等候她们，并且盘算着，在入睡的耳畔突然响起门铃，把难以名状的恐惧卷进声音的旋涡，把我带到那扇从未开启的门前。

我的信仰不相信神父所说的那种个人忏悔，他们一遍遍地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应该被谴责，因为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违反戒律。我们这样就能获得宽恕，神既不需要我们做出解释，也不要求我们告诉详情。

现在我要做出解释，并告知详情。

神洞悉我的五脏六腑，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写给他的；它也不是写给那些见证一切的亡灵的，在我惊醒和沉睡的每时每刻，他们都密切地注视着我。这本书是我写给大家的。我勇敢地活到了今天，我希望也能够这样死去，勇敢而坦诚，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承认：是我杀死了艾梅兰兹。即便我原本是想救她，而不是毁灭她，那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 合约

当我们第一次交谈时，我就想端详她的面容，但是出于不安，她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她像一尊雕塑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不像是出于小心谨慎，倒像是遭受了某种挫折。从她的额头上我感觉不到什么，当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在她濒死的时候才看到她没戴头巾的样子，在那之前，她总是包着头巾出门，就像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或一位安息日的犹太女人，因为她们的信仰禁止她们裸露着额头靠近主。那时正值夏天，我们站在花园里，站在逐渐变紫的暮色下，没有理由做任何防护，根本就不需要。她格格不入地站在玫瑰花丛中。人们能够感觉到，假如我们生为植物，哪个人会是哪种花，而她显然不具备玫瑰的气质，那些胭脂红的花朵放浪地盛开，而且玫瑰也并非纯洁无瑕的花。我立刻感觉到，艾梅兰兹不是那样的花儿，虽然我对她还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总用头巾包住她的脑袋，投射下来的阴影正好遮住了她的眼睛，后来我发现她原来拥有一双蓝眼睛。我也想知道她头发的颜色，但头发总是遮着，仿佛头巾与她已合成了一个整体。

我们初见的那个傍晚颇为重要，因为我们要共同决定彼此能否接受对方。我先生和我是几个星期前才搬来新家的，比起之前我能够独自打理的那套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这里明显要大得多。之前我能够独自打理，不需要帮忙，是因为我的职业生涯被冻结了十年，现在一切都刚重新起步，我要在这个新的地方成为一名全职作家，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无数的事情，要么伏在写字台前，要么被从家里叫去完成任务。因此当我跟这位缄默不语的老妇人面对面地站在这个花园里时，我清楚地知道，假如没有人帮我接管家务的话，我就不太可能出版我在被禁言的那些年里创作的作品，也不可能表达我想说的话。搬完了那些图书馆藏书似的书以及那些需要小心照料、摇摇晃晃的家具，我便开始寻找能够帮我做家务的人。我问遍了身边的熟人，最后还是一位老同学帮我们解决了难题。她告诉我们，她的一位亲戚曾经雇过一位老太太料理家务很多年，久到她都记不清时间了。她特别诚心诚意地推荐，只是希望这位老妇人能有时间为我们的工作。老同学保证，这妇人绝不会吞云吐雾地抽烟，将整栋房子烧掉，也不会勾搭男人、不会手脚不干净。如果她喜欢我们的话，甚至会经常带来东西，因为她是一个狂热的礼物赠予者。她没有嫁过人，也没有孩子，只有一个侄子，还有一位警官会定期探望她，而且周围的人都很喜爱她。我那位老同学提到她时语调热情，充满敬重，还说艾梅兰兹是一位房屋管理员，差不多相当于公职人员。她希望这位老太太能接受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赢得她的喜爱的话，她不会为了钱而接受这份工作。

她像一尊雕塑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不像是出于小心谨慎，倒像是遭受了某种挫折。

事情的开头并不怎么鼓舞人心。在我邀请艾梅兰兹找时间来我家进行简短的交谈时，她表现得不太热情。我在她当房屋管理员的那幢公寓楼的庭院里找到了她。她住得离我们非常近，近得以至于我从自家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家。她正用式样陈旧的工具洗涤那些堆积如山的衣物；她把床上用品浸在一口大锅里煮，下面就是火焰，而她则手握一柄硕大的木勺，从本来就已经够折磨人的沸腾热气中捞着被单。火焰的光芒包围了她。她体格高大，骨感，虽然年纪很老，但是很强壮，不胖，肌肉发达，散发出的力量如同瓦尔基里一样；她头上包着头巾，看上去很像战士的头盔。我们约好时间，她上门来找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就站在这儿，站在这个暮色沉沉的花园之中。在我跟她交代要承担什么家务时，她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跟她说话时心里暗想，过去我很难相信上世纪的作家怎么会在小说里将一个人比作湖泊。我感到羞愧，就像以前许多次那样，我为自己居然会质疑经典而感到羞愧。艾梅兰兹的脸色除了平静别无其他，波澜不惊得宛如清晨时刻的水面。我全然不知她如何看待我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因为她的表现显然在说，她既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钱。看起来，她能否接下这份工作，显得对我来说才更加重要。她的面孔隐在那条庄重头巾投下的阴影里，仿佛平静如镜的湖水，没有泄露任何信息。当她最终回应我的时候，也没抬起头来，可能我们需要以后再谈。因为她现在服务的一家人令人失望：男女主人都酗酒，他们成年的儿子也堕落了，不愿供养他们。所以她不会继续在他们家工作。假设有人可以为我们作证，并且对她保证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打架闹事或者会酗酒，那么我们或许还可以再谈谈。我吃惊地站在这里，这是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被要求出示能担保自己为人的证明。“我不洗任何人的脏衣服。”她说。

她有着一副清亮、严肃的女高音嗓门。她肯定已在首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要不是我曾经受到语音学的训练，我都不会从她的元音中听出她来自外地。我问她是不是豪伊杜地区人，本以为她会为此感到高兴，但她只是点头表示承认，说她来自纳多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纳多里隔壁的小村庄——乔鲍杜尔。随后她马上岔开了话题，那方式表明她丝毫不想就此展开。就像其他很多我只在多年之后才弄明白的事情一样，她其实是感觉我的提问咄咄逼人，窥探隐私，而她并不愿意提起过去。艾梅兰兹从来没有学过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但她还是懂得比我多，我一有机会，就会返回昔日的村庄追寻逝去的岁月，追寻那些再也不可能重现的事物、曾经投在我脸上的老屋的阴影、那已经失去了的我过去的家。当然，我什么都没有找到，河流在哪里转弯呢？它裹挟着我的人生碎片席卷而去。艾梅兰兹比我更加睿智，明知不可能，仍会努力尝试，她是在为将来能为过去做些什么而积蓄力量，当然，她对这一切的理解一直深深隐藏在时间里。

在那天我就知道，当她第一次说出这两个地名：纳多里和乔鲍杜尔，她便不会旧事重提，出于某些原因，它们已经变成一种忌讳。算了，那我们就谈些现实的事情吧。我想，我们应该商量按小时付薪酬，这样对她来说会更有利。但是她并不急于做出决定，她说，等她了解了我们的情况，知道了我们的家到底有多邋遢、多凌乱，清楚了自己将承担多少工作之后，才能决定我们应该付多少钱给她。她还会向别人打听我们的情况——当然不会向

我的那位老同学打听，想来她很可能偏袒我的。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她都会告知我们。我怔怔地看着她平静地转过身，有那么一瞬间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位老太太真是稀奇古怪，如果她直接拒绝了我们或许对所有人都好。不过现在也为时未晚——我完全可以冲着她的背影嚷道，这件事情无效作废。但我没有叫嚷。

仅在一周之后，艾梅兰兹重新出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在街上和她碰过面，但她只是跟我们打一个招呼便走开了，仿佛既不想匆忙间做决定，也不想在尚未答应之前便把我们拒之门外。最后当她按响我们家门铃时，我一眼便注意到她是盛装而来。我立刻领会到她那身衣服的含义，不禁因自己身着露肩露背的夏日清凉连衣裙而局促不安地原地踏步。她穿着黑色的衣服，一身做工精细、布料柔软的长袖连衣裙以及一双系带的漆皮鞋。就如同我们还没有结束上次的对话一样，她宣布她会从第二天开始工作，并在本月末前后告知她每月的酬劳将会是多少，说话时，她目光犀利地盯着我裸露的肩膀。让我高兴的是，我丈夫倒是可以免于这种谴责，即使在酷暑中他也没有改变战前在英国养成的习惯，依旧打好了领带、穿着西装坐在这里。他们两个打扮得那么庄重，站在我的身边，仿佛在给一群原始人做文明示范，其中也包括我，他们想以此引导我们注意自己的仪表，要符合人类的尊严。假如在这个地球上某个人在某个时刻以某种形式与艾梅兰兹较为接近，那个人便是我先生。自然而然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真真正正地接近了对方。

她是在为将来能为过去做些什么而积蓄力量，当然，她对这一切的理解一直深深隐藏在时间里。

老妇人依次和我们握手，然而她跟我的肢体接触则是能避则避。若是我碰到她，她会立即拨开我的手指像是驱赶一只苍蝇。那天傍晚她并没有开始工作因为这样做并不合适，也很不礼貌。她只是来应聘的。临行前她这样和我先生告别：“祝愿主人晚安。”他怔怔地看着她。这个星球上，恐怕没有人比他更不切合这个美妙的词语了，但直到她逝世，她都是这样问候他。他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才适应了他的新称呼，并且能够做出回答了。

我们并没有达成正式的协议，既没有规定艾梅兰兹应该在我们的房子里工作多少个钟头，也没有具体规定她上门的时间。可以想象，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整天都看不见她人影，然后到了晚上十一点她又会出现。她也不会进里面的房间，而是打扫厨房和食品储藏室，一直持续到凌晨才结束。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连续一天半都无法使用浴室，因为我会把毛毯浸泡在浴缸里洗涤。她的工作时间是和效率相匹配的，这位老妇人就像机器人一样。搬动笨重的家具时，她也毫不考虑自己。从她的力量和工作承受力来看，仿佛在她的体内住着一个令人惊骇的超级人类，在她根本没必要承担这么多活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显而易见，艾梅兰兹陶醉在她的劳动当中。她酷爱劳动，一旦闲下来，反而会感到手足无措。无论做什么，她都做得无可挑剔，另外，她几乎悄然无声地在公寓里面活动——既不显得亲近，也不好奇，而是避免不必要的交谈。她提的要求比我想象中更多，但她也给予了我们许多。若是我提到要招待客人，或是客人不期而至，她都会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通常都会谢绝，因为我不想朋友们得知，我在自己的家中居然无名无姓。艾梅兰兹只给我先生找到了一个称呼，而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夫人”。在她最终弄清我在她的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之前，在她判定我在她的关系网里到底是谁、该怎么称呼并可以开口称呼我之前，她不会以任何方式称呼我。当然在这一点上，她是对的，任何没有理由的定义都是有失偏颇的。

很遗憾，无论在哪个方面，艾梅兰兹都无可挑剔，可有时也令人难以接受。对我小心谨慎地赞赏她的话，她并不禁止，但是不希望我们经常地回应她，不需要我们夸奖她，她对自己的成就了然于心。她时常穿着一身灰色衣服，在节假日或是特殊场合再换成黑色的。为了保护她的裙子，她会系围裙，而且每天都会更换。她对纸巾非常不屑一顾，而偏向使用雪白的上了浆的亚麻手帕。当我发现原来她也有一些弱点时，我真的感到心情舒畅。譬如说，有时她会大半天都毫无原由地不理睬我，无论我怎么询问她，她就是缄口不语。而且我可能注意不到，每当打雷或者闪电的时候，她都会对暴风雨很恐惧。无论手头在做什么活计，一旦雷阵雨快要降临，她就会停止干活，并且既不交代，也不解释就跑回家，躲在她的家里。“她毕竟上了年纪，”我跟我先生说道，“老太太，不可能没有狂躁症。”“她的这种恐惧既像是狂躁又不像，”他摇摇头说道，“肯定是因为什么事，只不过她觉得和我们无关罢了，究竟何时她才会跟我们透露一点她的实质性信息呢？”据我回忆，她从未透露过。艾梅兰兹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萨博·玛格达

匈牙利当代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诗人，当代重要的中欧女性作家之一，匈牙利头等文学奖约瑟夫·阿提拉奖和科苏特奖得主，作品曾获鲍姆加特纳奖、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奖等荣誉。她是当下被译介最多的匈牙利作家，作品已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Joanna Kosinska](#) on Unsplash

## 小说

# 绕到你的左边

菲奥娜·基德曼 | 新书试读

或许，每个女性的一生  
都是一场“无休止的叙述”

我很喜欢菲奥娜·基德曼小说中淡淡流露出的温柔的世故，一方面她歌颂爱情，一方面她并不留恋具体的“关系”。爱情不只属于年轻人，也不只属于女性，更不只属于作家，它属于感受过它出现，不害怕它重现且知道它厉害的每一个人。——张怡微

《一路到夏天》是为纪念新西兰女性主义文学领军人物菲奥娜·基德曼 80 岁生日而出版的精选短篇集，共收录 13 篇作品。这些故事主要聚焦于 20 世纪新西兰女性的小镇生活，也包含新西兰本土居民毛利人独特的文化风俗。小说被巧妙地分为四个部分，旨在模仿爱情的四个阶段：迂回、渴望、迷途和本色。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的《绕到你的左边》，分享给读者。



奇迹呵，奇迹。电话响时，爱丽丝坐在桌边，在为一个采访做准备。她在一家电台工作，主持一档生活方式类节目。爱丽丝本人很出名，人们遇上各种问题，都想找她拿主意。大家都说，她是女强人。她的确觉得自己既身强体健，又精力充沛。不过，她也到了更不遭受人打搅的年纪，儿女们开始担心，谁会为她修剪草坪，她会变成什么样。给她致电的人

名叫凯瑟琳·福克斯，带“K”和“Y”的那个“凯瑟琳”。她从奥克兰的一家保险公司打来。爱丽丝能看到，她坐在桌子后面，沉着、能干，穿着剪裁合宜的套装，纯棉衬衫的领子底下，精巧地系着一条低调而美丽的围巾；爱丽丝也能听见，她询问着客户名字的正确拼法，这是一种本能的谨慎，她也将这种谨慎带进了自己的生活——正是我：凯瑟琳，带“K”和“Y”的那个“凯瑟琳”，她补充道，凯瑟琳·福克斯太太。

“什么事，福克斯太太？”爱丽丝应道，打算跟她说，自己的寿险保额已经非常高，或者，今早没空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事关我父亲。”凯瑟琳·福克斯立刻说，“我想，您认识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与我母亲结婚之前。他叫道格拉斯·麦克诺特。”她声音小了，变得没那么有把握了，仿佛料想爱丽丝会一口否认，“我也没想到您也许会认识他。”

“你怎么发现的？”爱丽丝问道，就像在采访，但她感到自己的脉搏在跳动。

“唔，”凯瑟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次我在电台听到您的节目，您提到了菲殊洛。您说起在那里认识的一个人，他在自家的牛棚干活时，倘若奶牛要性子，不肯听话，他就会吼它们。‘我还不如去跟上帝说。’”

爱丽丝放下手中的笔：“尼尔·麦克诺特。”

“我祖父。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爱丽丝说，“我明白了。”

“我父亲病危时，我被送到了祖父母的农场，这样我母亲才能抽出更多时间照顾他，”凯瑟琳说话间，声音变得冷峻起来，“我当时还小。整个夏天，我每晚都坐在院子的围栏上，听祖父重复那句话。‘还不如去跟上帝说。’他说。而我明白，他这话不只是说给牛听的。之后我再也没听见谁这么说过。很快，他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我父亲也去世了。”

“这么说，你父亲不是在农场里离世的？”

“他曾远渡重洋，去马来亚打仗，”凯瑟琳说，“您知道的，现在那里叫马来西亚了。”这一点爱丽丝早已知晓，但她没有打断凯瑟琳。“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染上了某种丛林病。他回到了农场，却没法像从前那样干活了，于是和我母亲一起搬到了镇上。”

这些事，爱丽丝不知道。“后来他又开始工作了吗，在镇上？”菲殊洛人都知道“镇上”是什么意思。镇在北面，不如城市大，但有旅馆，旅馆的餐厅里铺着亚麻桌布，还有书店、电影院、仓库和采办站。你要是想看牙医，就会去那里。

“他去了采办站，一直工作到身体不允许。您的认识他们，对吧？我没弄错吧？”

“是的，我认识他们。”爱丽丝缓缓说道，思索着是否要帮电话另一头的女人，两人之间出现了一阵沉默。

凯瑟琳·福克斯似乎察觉到了她的犹豫，于是更进一步，坚定地说道：“告诉我，我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不是恳求，只是陈述，并且准备道出自己的故事。“我母亲又结了婚，她不明白父亲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母亲与继父在一起很幸福，继父对我和妹妹也很好。‘有什么好说的？’我向她打听父亲的事时，她总说，‘他病了，然后死了。’不管从前她为何为他着迷，她都已经忘了。哎，也许这些事您不清楚，但只要告诉我一点点就好，一点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请原谅，也许您根本想不起多少关于他的事了。”

“他是个爱热闹的人。”话音刚落，爱丽丝就后悔了。

“基佬？”凯瑟琳说道。

“不，不是那个意思。这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说法。语言变了，”爱丽丝意识到，她们之间、她们的年纪之间，以及在认不认识她父亲这一点上，存在着距离，“他的枪骑兵方块舞跳得很好。嗯，我们偶然在舞曲将尽时跳过一次。”

“等等，您是说，我父亲跳过方块舞？”

“是的。不止如此，他是个美人儿。我的意思是，他长得非常好看。”

凯瑟琳说：“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照片我母亲一张也没留。没人跟我说过他长得好看。”

爱丽丝想，也许凯瑟琳会后悔打这通电话，她会觉得，爱丽丝在为她描绘一个幻象，或许，爱丽丝根本不记得他。“你的母亲是叫罗达吗？”她问道。

“不是。”凯瑟琳说出了一个爱丽丝从未听过的名字，她说，父亲自从丛林回来后不久，就在医院结识了这个女人。他们几乎立刻结了婚。

这是个奇迹。一段爱丽丝未曾亲历的历史，在这个早上出现在她的眼前。此刻，风在楼宇间尖啸，五层楼之下，总水管爆炸交通因此瘫痪，隔壁大厦里，警报误响，人员被疏散殆尽。

爱丽丝毕业后，立刻去菲殊洛的布店上起了班。她从一群年轻女孩中脱颖而出，那些女孩觉得，在大街（这也是镇上唯一的街道）上工作一两年，顺便攒好自己的嫁妆，也许

会很有趣。她回绝了当护士或老师的建议。对其他女性来说，还可以选择投身天主教——当修女，但菲殊洛的长老会实在叫人难以想象，那是一个令人看不透的古怪谜团。她们扪心自问，谁会想生活在一群女人中间？

“你为什么想来我的布店上班？”店主麦克唐纳小姐问道。她是个高挑的女人，梳着大圆髻，一绺绺碎发从发髻里漏出来。她二十年没剪过头发，并为此自豪，尽管谁也没见过这一头长发披散下来的样子。

“我想赚点钱，同时想想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是指，直到某个人出现，向你求婚？我不希望有男孩在这里晃荡。”麦克唐纳小姐说。

爱丽丝觉得，最好还是别告诉未来的雇主，自己已经被道格拉斯·麦克诺特遗弃了，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某天他还会出现的。于是，她只说：“我父母的农场刚起步，我要是现在离开，他们会很辛苦。周末我还能帮忙挤奶。”

这番话打动了麦克唐纳小姐，因为她发现爱丽丝勤劳简朴，而且自己不必许诺长期雇用爱丽丝。“你可以先试上三个月，到时我们看看彼此是否合得来，你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

就这样，爱丽丝站到了菲殊洛布店的柜台后面，数纽扣：卖束腰和中国丝线；安排尖杯文胸的订单；向年轻女士推荐缝纫样式——一个月前，她还在跟她们一起上地理课；学做盘扣，然后向顾客演示；提醒麦克唐纳小姐，毛线区的三股线库存已经不多。与此同时，她呼吸着新衣服的清香，至今这个味道都会让她想起毛茛。

麦克唐纳小姐雇爱丽丝，起先只指望她清扫店面、泡泡茶——这些活儿她都干了。等爱丽丝提议店里可以订购一些束腰带，因为她听说镇上的女孩都穿束腰带（她自己也想拥有一条）时，她的雇主久久地端详了她一会儿，进了半打，第二天就卖光了。之后，麦克唐纳小姐抽出时间去镇上采购，留爱丽丝看店。

新货一到，营业额便涨了，爱丽丝的薪水也涨了。

她会觉得，爱丽丝在为她描绘一个幻象，或许，爱丽丝根本不记得他。

菲殊洛现在由一连串的商店组成，这些商店被一条主干道一分为二。邮局早已倒闭。大家都去镇上买衣服，布店不见了。方形白色教堂坐落在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博物馆里陈列着村中先祖的严肃面孔，社区礼堂已显出岁月的痕迹，菲殊洛阵亡将士纪念碑立在路边，由一根沉重的铁链围住。道格拉斯·麦克诺特的名字不在上面。

道格拉斯不是在战场上倒下的，而且，他参与的只是一场小小的丛林冲突战。他赴战，不是为了响应席卷全国的征兵号召，只是一个年轻人面对生命中没法回答的问题时做出的反应。他的名字被刻在一块墓碑上，在安静的海滨墓地里，起风时，沙子在墓碑上扬起又落下，干草齐齐弯了腰。伞兵道格拉斯·麦克诺特，英国特种空勤团，马来亚。没写妻子的名字。这就是爱丽丝所知道的全部。

她父母的农场与麦克诺特家毗邻。麦克诺特家族在这里定居已久，埃默里一家则是新来的，他们的土地不及邻居家的几分之一，除了河边那三片郁郁葱葱的小农场，其他地方都无人照料，长满了金雀花。一个夏日午后，临近挤奶的时间，他们一家驱车来到这个山谷。奶牛挤在后面的车厢里，乳房都快撑破了。你好，站在路边的人们说。你好，爱丽丝的父亲说着，走进农场上摇摇欲坠的棚屋，一边把奶牛卸下卡车，一边给它们挤奶。

一个看客跟了上来。“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开口。”那人说道。他，就是道格拉斯。他肤色黝黑，黑色棉汗衫上露出结实的颈子，破旧的灰毡帽下是一头鬈发，短而壮的小臂遍布蜷曲的汗毛。他点烟时，会先用舌尖和上唇轻轻压住香烟，让它保持平衡，然后才将它衔入口中。

爱丽丝的父亲悉心打理着自己的农场。他是个爱梦想的家伙，干农活时一手拿着教材，一手拿着铁锹，邻居们议论纷纷，却很感兴趣。他安了电篱，草坪能铺得更远。他家的乳脂含量慢慢上升，超过了周围的农场。你与其告诉我那几个儿子该怎么做，还不如去跟上帝说。他的邻居尼尔·麦克诺特说道。尼尔的声音里没有嫉妒。他的钱够用。他的三个儿子毕业后一直留在农场干活儿。老大马尔科姆结了婚，住所跟父母家只隔一个农场。二儿子和三儿子还住在旧农舍。艾伦总是懒洋洋地冲人微笑，干活时话不多。他爱喝酒，爱丽丝的父亲跟她母亲说，不过他不会伤害别人。道格拉斯二十八岁了，家里人依然惯着他。

麦克诺特家的老房子门口有一条走廊，两侧镶着精致的木栅栏。早上，这里炙热无比，连路边泥地里的天竺葵都被烤得垂头丧气。到了下午，狗会跑到那里睡觉。

屋里的陈设叫人很难看穿麦克诺特一家的殷实。餐边柜上摆着旧报纸和成堆的账单，烟灰缸满了才倒。起居室里随意地摆放了一套棕绒布艺家具。墙上挂着从当地商店里买来的挂历，以及两张尼尔父母的照片，照片装裱华丽，里面的人物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

摆出庄重的姿势，他母亲穿的是一条黑色高领长裙。两张肖像下方，有一架旧钢琴。礼拜六晚上，朋友们过来喝酒唱歌，麦克诺特一家会弹奏这架钢琴。艾伦一直弹到断片，然后蒂莉——他们的母亲——会接着弹。他们会唱《啤酒桶波尔卡》《带着一线希望飞来》《她将绕山而来》，‘她来时，她来时，会穿起粉红睡衣’。他们说，也许自己曾是长老会教徒，但现在已焕然一新。他们不说那些陈词滥调。“喏，”尼尔对爱丽丝的父亲说，“倘若我们念叨那些陈词滥调，孩子们就不乐意待在这儿了，不是吗？”道格拉斯和艾伦还睡在那间睡了一辈子的房间里，就在父母卧室的对面，里面像宿舍那样，摆了三张床，他俩各占一张。

“他们很有钱。”爱丽丝的父亲对她母亲说。如果你知道该往哪里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门前的农场上悠悠跑着一匹赛马，屋旁的车库里停着两辆加长美国轿车。在马尔科姆的新居，他的妻子诺艾琳布置了一个柜子，里面满是水晶酒瓶和画着三叶草的奶黄色贝尔里克虹彩陶瓷。她还在窗前挂上了蕾丝窗帘。

麦克诺特夫妇和爱丽丝的父母接纳彼此的差异。在满溢的烟灰缸和散乱的报纸旁边，蒂莉将木板擦得干干净净，壁炉也闪闪发光。打从一开始，爱丽丝的父亲就很喜欢麦克诺特家的男孩。他们让他觉得，自己已融入了人群，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爱丽丝认为，她的父母在那里过得很快乐。他们的婚姻本已变得单薄脆弱，却在麦克诺特一家的和煦阳光下重新绽放。

至于爱丽丝，麦克诺特一家对她很宽容。

现在她回想往事，发觉自己曾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傲慢女孩，总想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在上一所学校，她做到了，但她讨厌自己的新学校。农民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镇上的寄宿学校——倘若他们觉得这钱值得花。其余的孩子都进了菲殊洛中学，开始筹谋毕业与婚姻。克洛弗·约翰斯顿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她比爱丽丝聪明，却不爱显摆。她是个谦逊的漂亮女孩，父母在这个区的另一头务农。爱丽丝和克洛弗成了朋友，但出了学校，彼此就相隔遥远。

蒂莉已经没兴趣招呼青少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诺艾琳？”复活节前后的一个下午，爱丽丝到她家门口寻找玩伴时，蒂莉这样说道。她把头歪向一边，拼命摇晃：“我往耳朵里倒了双氧水，去耳垢的，”她解释道，“让它起泡，你懂的。喏，把这碗鸡蛋带给诺艾琳，省得我跑一趟了。”

诺艾琳快生孩子了。爱丽丝在客厅里找到了她，她在给婴儿服的前襟绣花，看起来急躁又成熟。

“你打算给宝宝起什么名字？”爱丽丝问道，试图吸引她的注意。

“我还没想好，”诺艾琳答，“如果是女孩，叫帕梅拉，如果是男孩，叫托德，你觉得怎样？”

“不好听。”爱丽丝说。

“夏尔曼呢？”

“不好，”爱丽丝说，准备弄丢一番，“男孩的话，就叫荷马，怎么样？”

诺艾琳看上去已饱受磨难：“你能把戒指举到我肚子上面吗？”

“干吗？”爱丽丝退了一步，问道。

“测测生男生女。上次蒂莉测出是个女孩，但我觉得不可能，当时戒指是往下移动的。我确定这是个男孩。她边说边褪下戒指。她拿起一卷线轴，拉出一截线头，将它系在戒指上。

“我要怎么做？”爱丽丝问道。诺艾琳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喏，你提着线，把它放到我肚子上方，观察戒指是怎么动的。如果转圈，说明这是个女孩，如果上下晃动，说明是个男孩。你不知道这个办法吗？”

“不知道。”

“如果停在了中间，那就是个灾星。”诺艾琳打了个寒战，掀起自己的孕妇服，露出大肚子。她躺在那里，腹部光滑洁白，像山一样，突然，肚子的侧面出现了一个牡蛎状的隆起。

“看，是宝宝的手。”诺艾琳说。

爱丽丝感到一阵恶心。

“来吧，快。”

现在她回想往事，发觉自己曾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傲慢女孩

爱丽丝拿起戒指，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是道格拉斯，诺艾琳的小叔子。

“哦，”他说，“你的儿子兼继承人怎么样了？”他的声音有点古怪。

“是个女孩，”爱丽丝说，“诺艾琳打算叫她吉娜薇。”

一阵短暂的沉默。“亚瑟在船上缓缓答道。”道格拉斯说。爱丽丝吃了一惊，戒指险些从手中滑落。

“一坨狗屎。”道格拉斯说着，转身走了。爱丽丝不知道，他说的是孩子，是戒指，还是自己引用的诗篇。但她意识到，他本该去菲殊洛中学念书的。

“你知道，我本可以嫁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他走后，艾琳说。她指的是麦克诺特兄弟。爱丽丝没作声，诺艾琳又说：“我得赶在别人前面生个男孩。你明白吗？”

“道格拉斯喜欢跳舞，他每两周去一次。”蒂莉咬着缝衣针，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她很同情爱丽丝，后者在尝试用姨妈寄来的布料裁制衣服。爱丽丝的母亲在农场忙碌，没时间帮她。

“他都去哪里跳舞？”爱丽丝问道。礼堂里会举行公共舞会，但次数稀少，间隔也久。学校里的女孩大多去过。她们十四岁开始参加舞会，在菲殊洛，这个年纪已接近成年。爱丽丝的父母不让她独自参加舞会。她跟父母一起去过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小孩。

“你不知道方块舞吗？”蒂莉说，“俱乐部的人在礼堂碰头，不是公开的舞会，只有三四十人参加。”爱丽丝看得出来，蒂莉刚说完就后悔了。她瞥了爱丽丝一眼，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你是个大姑娘了，”她说，“你长大成大姑娘了。你开始存嫁妆了吗？”

当道格拉斯再次开着别克汽车，停在麦克诺特家门口时，爱丽丝已经等在那里。她从奶站后面冲出来，为他打开大门。

“这是哪一出啊？”她关上大门，他探出车窗问道。

“拜托了，可以载我去跳方块舞吗？”

他叹了口气，看向另一侧的车窗。“当然可以，”最终他说，“要是你父母答应的话。”

从此之后，爱丽丝与道格拉斯麦克诺特有了来往。他的年纪几乎比她长一倍。现在想来，她还是有些吃惊，父母竟会同意她跟他外出，不过她也已经明白个中缘由：他们觉得这两人一定不会坠入爱河，他们就像一个和气可靠的大人和一个孩子。有很长一段时间，爱丽丝也只把道格拉斯当成带自己出门的工具。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虽然莽撞，却实在天真。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看她的？爱丽丝后来一直思索着这些问题。

克洛弗有几个好哥哥，有时她也被允许参加舞会。这也许是爱丽丝获准跟道格拉斯一起出门的原因。

有天，克洛弗满脸震惊，将她拉到一边。“我得知了性的另一种说法。”她说。是表哥告诉她（亲哥哥们绝对不会跟她说这些，他们家一直呵护女性）。操。这就是那个词。

她们惊恐地看着彼此。猪在灌木丛中互操。这个词粗俗野蛮得不可思议。她们知道性是一根烧得通红的火钳，但她们难以想象自己会被烧伤或灼瞎。如果性是这样的，她们可不想沾染分毫。那个礼拜，毕业一年多的女孩玛丽说，自己同时在约会两个男人，每晚都会和其中一个去墓地：她还在考验他俩谁的家伙——这是她的说法——更好。这事传得沸沸扬扬，也传到了学校。克洛弗和爱丽丝瞠目结舌，不知传言是否可信。与此同时，在麦克诺特家，诺艾琳生了个女儿，她称其为最可爱的小东西，等伤口愈合，她就会尝试再怀一个。

爱丽丝去舞会时，总会投入地跳起那套舞步，抓住一只手，扭腰，移到下一个舞伴跟前：满脸通红的老男人道格拉斯，或是克洛弗的哥哥，又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给他们伴奏的是一位钢琴师和一位手风琴手。领舞人将一头金发梳成了大背头，穿格子衬衫，戴领巾。他拍着手，踩着脚，踏着《红河谷》的节奏：“哦，我们要去下一个山谷 / 你绕到你的左边，又绕到你的右边 / 你从山谷里挑选你的女孩 / 哦，你挑选你的红河女孩。”

往返途中，道格拉斯几乎一言不发。爱丽丝并不介意，不过，她偶尔会跟他说话。有天晚上，他们驱车回家，在绿草茵茵的山坡间穿行，月亮像是漂在天上，一时停下，一时浮起，在夜空中缓缓流淌。

“月亮是魔鬼的帆船。”爱丽丝说。

“天哪。狗屎。”他紧紧地攥着方向盘，说道。她想，他不打算让自己再次醉心诗歌了。

一到埃默里农场对面的麦克诺特家门口，爱丽丝就跳下车，为他打开大门。他招呼也不打，飞快地驶了进去。她在他身后关上大门，目送汽车穿过沾上露水的土路。一种幸福降临在她身上，降临在毕业前的那几个星期、几个月。

直到罗达·奥凯特出现。又一个跳方块舞的晚上，爱丽丝像往常一样换好衣服，站在邮筒旁边等候。道格拉斯没来。她回到屋里，给他家打电话。她在脑中想象电话铃声如摩斯电码，响在麦克诺特家的厨房里。代表“S”的三下“滴”声过去，蒂莉接起了电话。时间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他没告诉你吗？他挤完奶就会直接去村里。”她说。爱丽丝听得出来，蒂莉并不意外。

待她回答，没有，他没告诉她，蒂莉只说：“他一定是忘了，对吧？”

“他不会再回来接我了吗？”

蒂莉没法再推脱了：“他要去接罗达。她住在旅馆里。你知道罗达的事，对不？”

“哦，是的，当然了，我知道罗达。”

“唔，那么，那就好。”蒂莉似乎松了口气。

爱丽丝的母亲踱进房间。

“道格拉斯迟到了？”

“迟了一小会儿。他要去接一个叫罗达的人。”

“哦，对，罗达，”她含糊地说，“我听说过她。”似乎每个人都听说过罗达。

“我去路边等，”爱丽丝撒了个谎，“他来的时候肯定要赶时间。”她在母亲再次开口发问前冲出了家门。

去菲殊洛要走两公里的路。爱丽斯满心怒火，抵达舞会时已经九点，舞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她刚刚沿着黑漆漆的大街匆匆赶路，经过了那家她很快就会去上班的布店。泡茶的妇人坐在礼堂的角落里闲聊。她们从不跳舞。她们穿上了伞裙，把胸脯裹在亮晶晶的绸缎衬衣里，却不是来跳舞的。一面影壁隔开了厨房与舞厅，盛着晚餐的盘子就摆在附近。水快烧开了，爱丽丝关掉炉子，给水壶加满水。最后一曲终了，她拉开挡板，用尽力气喊道：“来拿吧。”就像那些妇人一样。

角落里一阵骚动，跳舞的人群中也闪过一丝惊讶。爱丽丝一动不动地站着，刻意咧嘴微笑。

“哦，”一个老妇说，“她不就是那个小助手吗？”她的语气非常和善，不过，她和她的朋友显然对爱丽丝的举动漠不关心。

道格拉斯朝她走来，有个女人挽着他的手。她穿一条浅蓝色的压花丝绒长裙。爱丽丝立刻发觉，他爱这个皮肤黝黑丝滑的女子。

“你好啊，孩子，”他说，“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这一刻她明白了，他从没好好瞧过自己。

他向罗达·奥凯特介绍了爱丽丝，罗达脸上闪过灿烂的笑容。爱丽丝爬上后座，准备搭车回家时，罗达似乎并不介意，道格拉斯却朝她剜了一眼。

一种幸福降临在她身上，降临在毕业前的那几个星期、几个月。

爱丽丝后来得知，道格拉斯是在镇上的赛马场结识罗达的，她是那里的售票员。为了离他近一些，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到酒吧当起了服务员。慢慢地，爱丽丝开始了解这个女人。有些周末她留宿农场，蒂莉会打发她过来，借上一杯糖或一包烟，正如爱丽丝的父母有时向他们借东西那样。罗达不是每个周末都来，时不时就像消失了似的。她母亲估摸罗达有二十六七岁了。“待嫁好久啦。”她对丈夫说。罗达浑身散发着浓香，皮肤仿佛被花瓣浸泡过。她有一双椭圆形的乳房，沉甸甸地悬在细细的腰肢上方。

大部分时候是罗达在说话，她像猫咪一样轻轻咕哝着，关于她自己、道格拉斯与麦克诺特夫妇的闲谈如水流出。挤牛奶是当道格拉斯女友的痛苦代价，但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干这个活儿，而且她想，等时候到了，她得重新习惯这项劳动。人类的粪便与牛的粪便，大差不差。她在酒吧里看到的那些事，准会让爱丽丝大吃一惊。爱丽丝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样的，哦，你不会知道的，你不会知道的，她说。爱丽丝突然心惊胆战起来，想着，也许自己真的不会知道，而不知道比知道更糟糕。酒吧的老板和老板娘舍不得提供多少热水，罗达说。爱丽丝呼吸着萦绕在身边的自然香气，倒是想象不出这一点。不过，罗达周末每天冲三次澡，虽然这样来一来，道格拉斯从牛棚回来后，只能省着点用水。罗达·奥凯特，她继续说，有点拗口，不过这不会困扰她太久，等她成为罗达·麦克诺特，就不会了。她觉得爱丽丝某天也会结婚的。她和诺艾琳相处得如何？她不确定诺艾琳是否喜欢自己，不过，这会让她有点不自在，有另一个女人要分家产，诺艾琳给自己的小女儿起名为洛林，爱丽丝觉得这名字如何？“她大概担心我会生个儿子。”罗达说。然后她咬了咬嘴唇，仿佛说错了话，仿佛有什么事令她烦心。爱丽丝长大后想生孩子吗？罗达话锋一转，这样问道。

罗达·奥凯特突然消失了，就像她出现时一样突然。起先爱丽丝没发觉罗达走了，因为她已经不去麦克诺特家了，除非父母叫她去传话。不过，有个周末，道格拉斯过来借用埃默里家的电话，因为他们家的电话坏了一至少他是这么说的。爱丽丝好奇他为什么不找马尔科姆和诺艾琳借电话。爱丽丝听到他对她父亲说，他会付电话费的。

“没事，孩子，”她父亲说，“你尽管打，打多少电话都行。我知道你会给我钱的。”

道格拉斯关上门，讲了很长时间电话。爱丽丝听到他抬高了嗓门，她把脑袋贴在门上。“对不起，罗达，我没办法。”他说。她听见他在哭泣。罗达竟会如此不近人情，这让她心碎。她难以想象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竟让罗达有这般反应。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才发觉，罗达好几个礼拜没来农场了，远远久于她平时到访的间隔。显然，这不是导火索，她听到这番争吵时，一切已成定局。

“她不会回来了。”爱丽丝的母亲隐晦地说道。她和丈夫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

没过多久，道格拉斯又来了，神情古怪，几近狡猾与欣喜，就像一个搭了树屋并且确信不会被人发现的小男孩。他能让人把一封信寄到这里吗？

他和爱丽丝的父亲走到屋外交谈。她父亲焦虑地将手插进稀疏的头发，摇了一两下头。最后，她看到他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每天晚上，道格拉斯挤完牛奶，就会来这里，查看那封信到了没。爱丽丝留心着罗达写来的信。在她的想象中，罗达的笔迹应该是飘逸的，有潦草的圆圈，夸张地倾斜着，像托在手心的脑袋，带着顽皮的微笑。

那封信终于寄到了，可它根本不是罗达写来的。道格拉斯取信时爱丽丝也在场，是从惠灵顿寄来的公函，信封上的字是打印的。

“谢谢你，伙计。”他对她父亲说。她父亲局促地站着，显然跟道格拉斯一样渴望知晓信上的内容。爱丽丝依然记得当时他们的样子，两个男人站在一起，道格拉斯几乎像她父亲的儿子。他把信翻了个面，为了她父亲，他当场拆开了信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它递给她父亲，眼睛闪闪发亮。他们看着对方，既兴奋又惊讶。

“他们录取你了，”她父亲说，“哦，好家伙，我就知道他们会录取你。”

“我得跟老头子说一声。”道格拉斯说道，孩子气地咬着嘴唇，不太像平时的他。他掏出一根香烟，放进嘴里，没像平时那样轻轻压一下。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道格拉斯穿着军装出现了。当然，当时她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他被英国特种空勤团录取了，成了一名伞兵，将赶赴马来亚作战。他的制服是橄榄绿的，衬衫与领带则是棕绿色。他头戴一顶栗色贝雷帽，帽子上印着一把飞刀和一句格言“勇者必胜。”

那时爱丽丝还没法想象丛林是什么样子，不过现在她知道了。在那个更名为“马来西亚”的国度，她站在丛林里，巨大的蝴蝶扑腾着翅膀，把风扇在她脸上，风里混杂着肉豆蔻油和兰花的味道，以及切开的榴莲那厕所般的恶臭。那种水果，她听说，要是跟酒精一起食用，能将人毒死。她见过蟒蛇、飞蛙和食鸟蜘蛛。致命、危险，却诱人。她站在那里时，想起了道格拉斯·麦克诺特。

他出发前在怀乌鲁受训，中间有过几次假期。最后那次假期里，不景气的方块舞俱乐部临时举办了一次舞会。爱丽丝至少有六个月没参加舞会了，自罗达·奥凯特第一次露面，她就没去过。道格拉斯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埃默里家门口。他已经与大家正式道过别，很郑重，致了辞，还在礼堂里专门摆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爱丽丝的父亲眼含热泪，送给他一支威士忌钢笔，这只钢笔花了他好大一笔钱。此刻道格拉斯站在门口，穿着军装，光芒四射。

“想去转上几圈吗，孩子？”他问。

爱丽丝的母亲在厨房忙活，听到这话，她抬起头来，仿佛第一次打算说点什么，叫爱丽丝别出门，之后却又改了主意。她抿紧了嘴唇。

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气息。虽然俱乐部没落了，但到场的人比往常多。人们再次赶来跟他道别。老伯们穿着宽松的灰裤子和格子衬衫，跟后勤一起来了，他们靠墙坐下，只是观看。晚饭时分，他们抓着道格拉斯的手，眼里闪着光，握了很长时间。

“把那些混蛋赶出林子，孩子，那些小鬼子，把他们打跑。”

爱丽丝听见一个人这样说道。

她见过蟒蛇、飞蛙和食鸟蜘蛛。致命、危险，却诱人。她站在那里时，想起了道格拉斯·麦克诺特。

“孩子，我用十块钱买你这顶帽子。”另一个人说。道格拉斯只是微笑，显然，在他脑中，新生活已经展开。他跟所有的女性跳舞，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他还把后勤从角落里拉了出来。他们唱起《红河谷》——“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 我们会想念你明亮的眼睛和嘴角的微扬……”

回家的路上，空气清冽。天上一轮新月，爱丽丝不禁透过车窗望向它。她拨弄着口袋里的零钱，往道格拉斯身边移了移。他似乎没注意，于是她直接挪到了他身边。他的身体在制服里晃动了一下。车开出去不远，他便将别克停在路边，把手放在她的手上。

该跟他的女儿说什么呢，爱丽丝一边回忆，一边思索。没什么。一个吻，只是一个吻。

这就是他们之间发生的事，仅此而已。等他把她按在座位上，她压低声音问道——虽然在被月光照亮的广阔农场里，不会有人看到或听见他们——“你要操我吗？”

“不，”他说，他没有停止亲吻她，“没事的，我还不打算让你生孩子。我会照顾你的。”他把她的舌头吸入口中，用自己的舌尖挑逗她的舌尖。她曾注视过那飞快跳动的舌头，它比想象中更热、更甜，训练开始后，它再没碰过香烟。他亲吻她的脖子，从手臂一直吻到指尖，他把她的手翻过来，亲吻手掌，然后又一路吻回手肘。他把衬衫从她肩上褪下，用舌头在她的乳头上打圈。

他一直在深深地呼吸，仿佛想把她身上的味道吸进自己体内。她感受到了罗达·奥凯特曾感受到的。她闻到一种熟悉的气味，花朵般的娇嫩气味：她的身体——就像曾经罗达的身体那样——在他的抚摸下绽放。他分开她的双腿，手掌短暂地停留在两腿之间。

“好的。”爱丽丝说。

“不，”他边说边帮她整理好裙子，“不。”

他发动汽车引擎，握住她的手。“我不会忘记这一刻。”

他说。

她以为他选择了自己，而不是罗达，虽然未免太晚了。

麦克唐纳小姐对爱丽丝的进步深感满意，她给店里想出了一个新点子。每次进了新衣服，她就会逐件评估，然后列一个清单，给一些农妇打电话：“我在店里找到了一件适合你的衣服，”她对每个人都这么说，“我用乡村快递寄给你试试，好吗？”

这项新服务令顾客又惊又喜。一件衣服也没被退回来。一天早晨，麦克唐纳小姐对爱丽丝说，爱丽丝不妨跟她一起去镇上的仓库进货。她会请一个以前的老帮手看店。

她们在一排排衣服中间逛了一上午。麦克唐纳小姐结账时，让爱丽丝去商店里转转。爱丽丝看得出来，她对自己依然满意。

她在街上看到了罗达·奥凯特。罗达走在街上，微微含胸。她没看到爱丽丝，因为她的全副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孩子身上，一个无精打采、迷迷糊糊的四五岁男孩。爱丽丝立刻发觉，那是罗达的孩子。她说不清自己是怎样发现的，但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加上他与她酷肖的长相，向她说明了一切。她站在一家商店门口望着他们，望着她转头冲他微笑的样子。罗达·奥凯特身上的某种特质已消磨殆尽，但她依然在微笑，那孩子也看向她，脸上满是毫无保留的信任，这张脸依然相信一切皆有原因，消失只是暂时的。

“我今天在镇上遇到罗达·奥凯特了。”当晚她回到家，跟母亲说道。

“她跟她的孩子一起吗？”

“你怎么知道的？”

她疑惑地看着爱丽丝：“哦，蒂莉跟我说的。她发现之后，跟每个人都说了。”她母亲似乎忘了爱丽丝才刚刚跨越那条横亘在女学生和职业妇女之间的秘密鸿沟，也忘了有多少事情还瞒着她。一切的边缘都模糊了。克洛弗·约瑟夫的父母会送她去寄宿学校再读一年。她眼前似乎是无尽的童年，爱丽丝为她遗憾。

她没问母亲的是，蒂莉知不知道，道格拉斯告诉罗达她不能把孩子带来农场时，他哭了。她现在明白了，这就是打电话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爱丽丝离开布店前，还发生了一件事。道格拉斯给她寄来一张明信片，当时他离家六个多月了。爱丽丝不知道丛林已经要了他的命。不会立刻致死，但是那病会盘踞他的余生。她觉得，他寄那张明信片时并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重；她确定，他以为自己回到农场后，就会恢复健康，毕竟农场里草坪宽广，树木修成了篱笆，而最危险的鸟儿不过是一只盘旋的老鹰。

他把明信片寄到了店里，她猜这是他的又一个小伎俩，这样他的计划就不会被旁人知道。她意识到，他一定听说了她的近况：她如今在布店工作，长大了，工作也顺利。她希望他已经得知，现在没人觉得她不好相处了。他的卡片上只写着：“我要回来了。”这句话，以及他的名字。

爱丽丝看过一个形容女性一生的短语，她一直记着它：无休止的叙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她这样采访自己。这些采访并不总是跟道格拉斯·麦克诺特有关，甚至不会经常跟他相关，因为后来在她身上又发生了许多别的事。但他是叙述的一部分。

爱丽丝记得，明信片一度是生活的缩影：一张图片加十来个字，你就了解了一切。从某种程度来说，道格拉斯的明信片也是如此，虽然上面没有图片，话也写得更简短。然而，明信片寄到时，发生了一件事，她至今无法解释那是怎么回事。麦克唐纳小姐从邮局取完

信件，把那张明信片带到了店里，当时爱丽丝在叠一卷薄纱。她将明信片放在柜台上，没什么。爱丽丝一眼便读完了。接着她把布料放在柜台上，拿起卡片，走到门外，沿着马路走到村子的中央，走向绿草茵茵的山丘。狭窄的山谷在她眼前蔓延，头顶的天空无垠而空旷，包围她的是深秋的空气，它像音符一般，被阳光照得透亮。她父亲也许终于能拥有自己渴望的儿子了。两个农场会合并为一番景气的事业，它们血脉相连。她想蹲在地上，仿佛要生出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她又闻到了欲望的气味。

然后，她转身往回走。她不知道，他的卡片是在提醒她做好准备，还是给她提供了一个离开的机会。已经领略过山谷外面的世界，但选择回到家里——这是一回事；从未有过离开的机会，于是只得待在这里——这是另一回事。这一层，他可能已经明白了。

另外，罗达·奥凯特毕竟存在过。

这些事，爱丽丝桩桩件件都可以告诉凯瑟琳，但她没有。爱丽丝也许会告诉她，如果她是爱丽丝的女儿，那么她的名字可能会是带“C”和“L”的那个“凯瑟琳”，或是根本不叫“凯瑟琳”。但她只是说，她想不起太多了，因为她毕业后不久便离开了“山谷”，当时出现了一个当广播员的机会，于是她来到了这座南方的城市。之后她只途经菲殊洛一两次。她去过道格拉斯的墓地，为他的遭遇遗憾。爱丽丝也许会，但并没有，告诉他的女儿，当她打来电话，说出自己的身份时，爱丽丝感到一阵战栗，如同紫罗兰迎来了春风的吹拂。她温柔地回忆着凯瑟琳的父亲，就像回忆其他男人时一样。



菲奥娜·基德曼

新西兰女性主义作家，也是新西兰备受尊敬的小说家之一。她的作品曾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等奖项。基德曼的小说以诗意律动的语言及现实主义的风格刻画了不同时代下性格各异的新西兰女性，讲述这些女性的人生际遇及其中暗涌的情感流动，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被称作“新西兰的艾丽丝·门罗”。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Yiran Ding](#)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温州人林先生的故事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①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个故事有两个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柴博士高屋建瓴，万事万物冥冥之中以“三”为大。凡事必有三，这是根基。过去几十年间，致富之人也有三种：

- 一是勤劳加官商结合的。
- 二是有知识的。1980年代改革开放，通过读书精英拼搏，知识型的精英。
- 三是官二代和红二代，他们继承了父母的关系网而发财。

第一种面目模糊，柴博士说有些人致富靠勤劳，但也就是中小富，大富的人光有勤劳不够，总是官商结合，红顶商人，“身份是商，资源是官”，这个类型。第二种，是他自己这个类型，我一直暗中揣摩他的身家，不像他那样敢下结论，不过不管财富多少，他是标准的“中产阶层”，这个类型中的人，如他五十几岁将满六十这个年龄，一般尘埃落定，人生不会有太大的危机；再小十岁二十来岁的人，同样是中产阶层，即使致富完成，但也不敢掉以轻心。第三种，似乎世人皆知，近于传说。

柴博士是个喜欢给万事万物下结论的人。讲过三种致富人生，很快就被我忘掉了。直到写父辈的财富人生，富足的长辈们与冷冷打量他们的年轻一代。这其中包含诸多复杂的关系：互视对方为丛林法则信奉者，优绩主义的价值观，机会的有无以及演化出来的代际间的零和博弈，犬儒主义……种种生态和心态，很丰富。父辈希望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来树立子辈的进取心，子辈则以“你们年轻的时候……”宣告你们充其量是赶上巨大历史风口的猪。虽然各自都有千言万语，但简单一点说，挣钱的是父辈，他们抢走了所有的机会，到子辈一代机会稀缺，所以啃老也理所当然，所以躺平也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均贫富也理所当然。失去的只是锁链，为什么不呢？就更要梳理一下父辈财富是怎么回事了。

在对父辈的采访中，我们找了其中三个人。他们都称得上白手起家，在他们的父辈，也就是年轻一代的祖父辈那一代，普通职员或者农民阶层，他们各自通过自己的路径获得了财富意义上的成功。

林先生，温州人，出生于1977年，儿子13岁（在采访的2020年），也就是出生在2007年。

温女士，有一个2003年出生的儿子。在她家族中，哥哥是新一代的中心，有话语权，但实际上财富布局与真正的资源积累来自于他们的父亲。

柴博士，安徽人，八十年代留学法国，作为首批Emba学位获得者，九十年代初出任大学教职，身为正处级、副教授，后因为理念及性格种种原因，放弃教职，成为法国阿尔斯通驻中国公司代表处一员。我们很难看到他的财富轨迹。但他无疑接触到了所有的机会。柴博士有个儿子，柴子亮。

确认了这三个人之后，详细去看柴博士的采访记录，再度看到他总结的三种致富之路，发现大体上与他讲的三种情况近似。柴博士与第三种真正叱咤风云的二代致富能力相去甚远，但你会发现路径和方法竟然极其相似，只不过它规模要小上几个量级，或可视为一个小型标本，近乎一次“举例说明”。

### 林先生的四次上海之旅

林先生的身份标签，从大的分类上看应该是地产商：他拿地，以自己的资金买或者租下一块地，然后，在上面做商业地产运营。往小里说，是二房东：你有一块还不错的老厂房或者旧写字楼，你没有能力或者精力去把它做火爆，但林先生能，你把房子交给他运营，虽然让一部分利给他，但你有稳定收益，如果你是国有地块，可能还属于盘活不良资产、火爆了算政绩、置换出的资源没准可以大展宏图。标签是大是小不重要，林先生很少说自己是做地产商，记得以前他说他是生活方式的供应商。现在更前进了一步，他直接说他是“做内容”的。

总结下来，他的生意有这样几个特征：

一、他经营的是老房子。在上海，这是一个可以做出市场来的资源。所以，他的地产经营范围大体上是在衡复风貌区和老静安地带，它对应的是过去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偶尔跨界到华界，但不会太远。

二、他以整租为主，然后重新装修为潮流街区。他的核心竞争力中至少有一半在于他对引进品牌的理解和敏锐，这东西能火，这东西单纯只是一个网红，这东西会带来消费的客流，持久而稳定。他有自己的判断。

三、所以他手中有一批与他的园区潮流相匹配的品牌，这些品牌或者由他代理，或者彼此信任，品牌不会甩开林先生自己胡乱去开店，对于这些品牌来说，林先生选址能力是信得过的。

四、当然，要有好时机。林先生的好时机属于城市更新的潮流，属于从大拆大建传统街区建筑替换成高楼大厦的潮流退去，现在只迁人不拆房，把旧生意迁走，我来做新生意。从园区角度看，这是新国营的一个策略。林先生扮演的是招商引资或者承包商的角色。

五、他核心竞争力的另一大半当然是拿下一个街区的能力。他的谈判对手如今大多是地方政府——街道，偶尔还会有残留在城区里的几百上千平方米的旧厂房，它们还保留在企业手里的，不管是谁，他们都知道自己手中的筹码是什么，也知道这些东西稀缺而不可再生，有些才俊型官员还会觉得自己才是既懂生意又懂潮流的杰出人士，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给你？会不会利益输送？会不会国有资产流失？思前想后不做都好过给眼前这位林先生。林先生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凭他的定位能力、对城市更新的理解、过去过得硬的园区实绩、还有他的天分，拿下。

到2020年夏秋之际，疫情开始了大半年，对上海影响渐小，而且因为限制了出国，上海空前得益，林先生对自己业务充满自信：需求仍然在，而且更多了；与他做生意的人的权力也更大了；城市更新的步伐也更加迅速更加有力了；生活方式的小众品牌越来越多，林先生可选择的合作越来越多，而它们也越来越需要咨询服务以及引领……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正在修正。比如涨见识这事，以往他会结合温州人的闯荡全球四方的能力来强调出去看看的重要性，在他来上海之前，这甚至是他生活目标之一。现在他不这么看，觉得他的前搭档、设计师、法国人托马斯现在格局小了，当时他回法国的时候应该搞个小米专卖店在巴黎，应该发展很不错，现在就一般。视野很

重要；本来他认为网红意味着品牌向下迁就，他现在觉得高品质的网红也有了机会，并不会伤害到他的园区品位。

林先生很少说自己是做地产商，记得以前他说他是生活方式的供应商。

林先生说他是做内容的，这里有一种对自己的期许在里面，他喜欢自己的生意。他的“内容包”中有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品牌。代表性的内容曾经有过 seesaw，咖啡在上海是必须要有的种类，一般一个有品质的新写字楼、Shopping Mall 落成招商，总是第一个想到星巴克，用来作为招商的基础，林先生认为星巴克品牌对于他的园区来说意义不大，seesaw 更有个性、咖啡可选种类和口感调性更胜一筹。当然，这也与时间有关，seesaw 后来商业化，开店节奏加快，它就不再是林先生的首选合作伙伴，这时你会看到 aunn，一个应该读作“阿温”的北欧咖啡馆，aunn 是升级版的咖啡馆，与它在一起的不仅是咖啡，也有户外露营装备，也有 snow peak，也有自行车小布——Brompton 布朗普顿，这些都是林先生在三四年以前内容架构中的配置……到了 2023 年，露营和自行车成为流行风向标，它们无疑还占据着上海最潮流的位置。他在静安寺运营的那个楼，现在大部分让给了宜家城市店，说明他在选址上眼光也不错。

做内容就要不断升级。他正在张罗着把意大利的吃穿住行平移过来，他用了一个似乎是生造的词，storitaly，不知道是故事性，还是意大利的故事性，意大利去了几次，没谈拢，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品牌的知识产权，没有形成共识，双方共同拥有一个品牌，在中国成长起来，全球品牌不会和我们分享，但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新品牌应该是共有的；二是他希望有更长久的使用权限，二十年三十年，但对方只肯免费五年，也谈不拢；三是美学市场还有差异，不管是板形还是色系审美，都要一个审美本土化的问题。这说的是我们碰面的 2020 年的事，其后两年可能连谈的机会都没有，未来就不好说。林先生当时自信，相信他磨下来合作只是早晚的事，“它有 15 万家企业，皮具协会、服装、家具、美食，各种协会很多，我可以把这些小众品牌都带进来”。

他说的做内容还包括了一些理念，比如，“做内容要有长周期”，就像前面说跟意大利人的合作一定要二十年起，语气中暗含对一夜之间试图纳各路网红于一地的莽撞的不屑；他还习惯于说“表达”这个词，“你招这个店进来，到底要表达什么？”“你表达的东西是不是你的消费群体能理解的”之类；还没完，他还会说到“创新”，“我们做城市更新，刷新吗，update，当时说没用的存量的老房子，怎么用得更好，这是一种创新”。听起来就像我们的选题会。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通过物理空间的载体，把某一种生态长出来。”我们做内容的人反倒不怎么说这种理想主义的废话了。他拿武康路做了例子，这条路所属的湖南街道曾经找他咨询，为什么只有网红而没有实际的有品质的叫得响的业态。他和所有人一样都看出来这条最网红街路天生丽质随波逐流，与他的“内容”思路完全无关了。

**星巴克**是内容的一个保障，对于业主来说，把星巴克作为招商基础并没有问题，它们通常会给星巴克一个漫长的免租期，星巴克作为示范，吸引更多的商业形态进来。在林先生这里扮演这个角色的是 seesaw，林先生借此说明“长周期”的重要性。“2008 年 2009 年开始，第一家做，seesaw 就在，我一直给它最低的租金，一直没涨。我可以很轻松地用自己的咖啡厅把它取代，多赚好多钱。我们一是对自己的要求，另外是，有些园区星巴克过来，那时园区有星巴克是品质保证，它进驻之后对其他商家进入也有帮助。无论是星巴克也好，罗森也好，他们进驻一些园区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它可以很客气地说，你们的流量不够，你们体量不够，你们网点交通不是我们选的方向，或者我们很喜欢你的园区，但今年开定计划已经完成了，我们明年进去。但园区招商服务是要靠前的，明年进我的整个计划都完成得差不多了。再进去，我的意义就打折扣了嘛。选择 seesaw，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觉得从那个时候，城市更新的一个小的例子。咖啡的一个配套引进开始。”

林先生是我们过去做商业报道时的一个采访对象。温州人，以温州人方式闯荡上海，没上过大学，高中都没念完，说话时喜欢夹杂英文（说起他的早期从商经历的时候会说到他曾经抓 Beatles 来卖），他不介意他的背景，但你要夸他选址眼光多精到，

他就表现出不以为然的劲头来，他更喜欢说他的 Business Model，眼光这种竞争力属于世纪初的他。那时他刚来上海，作为一个温州人，他是跟着炒房团来的。

**温州人**这个名词，在中国包含了对经商能力的承认，对于林先生来说也是如此，可以视为他的“天分”的一部分。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前穷，公认的说法是此地属于“前线”，没有人会投资，担心成为炮灰。自然条件又不好，没有多少值得种的地，所以温州人很早就要跑出去，国外或者国内，都有，即使是在物资和资本都严格由国家机构掌控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坚持要出去，比如做裁缝。因为类似于这样的职业，一旦物资流通行业打开，他们很容易就进入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例如服装、面料这类东西的批发零售环节，北京“浙江村”就是典型。在八十年代前后，流通领域是没有几个闲钱的小本生意个体户能触摸得到的大生意，服装又没有太多门槛，东拼西凑些钱就可以进场，温州人穷、没什么太多活路、家族意识强所以能够抱团，以北京“浙江村”为代表的、散在各地的各种服装批发市场，温州人就成了一个存在。

他们卖的服装鞋帽也因此而被当成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比如“礼拜鞋”，在已经落了下风的北方人看来尤其如此，其实本地人生产的东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但在开放搞活的早期，本地货一般还控制在国营厂手里，他们竞争不过温州货，就会编排他们的不是，无非就是这几条：一是外来者其心必异，二是个体户想挣钱难免包藏祸心，三是南方人能算计，而我对算计的理解无外乎就是缺斤少两，所以他们一定会用缺斤少两来算计我……所以温州货的名声并不好。

与温州大多数家庭一样，林先生家中条件一般，只是他们家不在服装领域，他们家买了印刷机自己接活，印工作证、小本本之类，因为工作证的小本子中间要压一条细线，所以林先生认为这印刷业务也是他妈妈裁缝身份的本行。他在读初二初三，也就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开始介入家族生意，“我初中还充当黑社会的角色，别人欠我们家钱，我去把钱要回来。”他担心我不信，解释说他发育早，小学时就已经长到现在一样高，一米七多一点的样子。他说收钱有秘诀，要“找到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观察他们，“比如说他是不是还需要用我们家的纸，如果不需要的话，他是不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如果爱面子，就要看他们家什么时候人多，这个时候去要钱”。

他更喜欢说他的 Business Model，眼光这种竞争力属于世纪初的他

林生长得高，在上学时有点孤立，“气场还可以”，资以证明的线索是以前喜欢打架，基本上，是我们学校的都被我们揍一顿。高兴了，天天玩，就揍嘛，听起来阳光灿烂，“我不会主动去欺负人家，”他说上学时总是会有“坏学生”，收人家钱，脱人家鞋，他说他不会，不过，他还是认为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打架会训练社会经验。当你知道从学校回家放学路上，会有社会上的人在外面等着你，这是一个危机。你要想着怎么解除这个危机啊。”

林先生并不认为这种能力有什么不妥当，说这东西无师自通，他爸妈不会教他如何去收欠款，妹妹也不会去做这件事，“女孩子怎么可能出去要钱呢？”潜台词是这是一种社会能力，是一种男人属性，是成长，是江湖历练。然后说到他的儿子，没有危机感，生活在温室里，他们不大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对外界没有感知触角，虽然也到了青春期，也叛逆，但“他现在睡觉有的时候还要陪他，洗澡还要陪他洗”。

**黑社会**是一直存在的词汇。只不过在九十年代前后，它更多的是民间的词汇，官方提及时往往只说简称，比如“扫黄打黑”，不愿意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会有“黑社会”，顶多是有“黑社会性质”，现在民间肉眼可见的黑社会实际上要少得多，相反倒是官方更愿意提及，这东西终归是个武器，上访的维权的不怎么听话的有自己主意的都有可能成为黑社会一员，当然这也只是揣测。也可能只是对“黑社会保护伞”更有兴趣，还是一个武器。

他值得记录的四次上海之旅的第一次是 13 岁时一个人来上海，推算应该是在 1990 年左右。此次旅行重要意义在于“一个人”和“13 岁”。当时他舅舅在川沙，他一个人坐船，一天一夜，这件事发生在他小学毕业或者读初一那一年。他是在说到他要陪同样是 13 岁的儿子洗澡的时候说到这事的。虽然他对儿子有父亲的宠爱和信任——“他电子产品用得少，心智虽然还是小朋友”，“他也玩游戏，不太看抖音，有

游戏群，无聊的东西也有，但也会跑出去跟邻居小朋友去玩”，“有缺失，我们自己可以到处走，他就是每天司机送学校，回家”……“大人和小孩都有原子化的。大人因为有工作关联，小朋友就没有，只能用社交网络弥补他的社群缺失，他的人际关系是在互联网上完成的”，时代变了，我们感受到他表现出对世界控制力不足的担忧，他很少会这样。更多的时候，他像他 13 岁那年一样，一个人闯荡世界，充满自信。

13 岁的林先生，除了让人慨叹的长途旅行，那时候他已经在妈妈的指导下钻研成功学了。他记得至少两本书，一本讲丰田精益管理模式的，另一本书名似乎叫“把干毛巾拧出一点水来”，听起来就很励志。

**成功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若干个概念相连：日本人的管理模式；台湾人作为桥梁和中介大量介绍；出版图书概念，也有几本经营类杂志做相同的事——是经营，而非财经。

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有经济动物之称，美国人视为洪水猛兽，觉得日本人会买下整个美国，中国人开放之初，看日本电器、汽车全球市场高踞榜首，更觉得日本经济十分了得。

那时候能让中国人看懂的多半还只是制造业，制造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落后或者先进的制造业有相通之处，所以看到日本人做得好，中国人会拿来比。质量、设计、材料有形无形的都可以作为比较，但最容易上手的还是看人家的工作态度和管理方式。制造业本身也需要从管理环节上抠更多利润，所以但凡制造、加工、特别是初级的来料加工业为经济主导的时候，管理能力会被特别重视，一个“拉长”——生产线上的管理者——的能力都会成为企业竞争力。

从日本，到台湾，都是以制造业见长，中国经济刚刚启动，能抢到制造业的生意就已经是改革成功的象征，也同样要有人讲管理。

成功学就是这样成为经济界、企业界各种人士启动自己腾飞之路的基础。

代表性的书箱，大约可以分成几个流派。

特别值得企业家借鉴，恨不得拿来直接用的、几乎圣经一样的存在，大都来自日本企业界。他们被称为经营之神。最知名者是松下幸之助，余波一直荡漾到华为时代；丰田章男的父亲丰田章一郎，买下“711”的日本零售商铃木敏文等等。

美国人有诸多大王，这也是林先生的启蒙读物，“当时美国有十大成功人士，娱乐大王迪士尼，金融大鳄贾尼尼，十几本吧，铁路大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飞机大王休斯，挺鼓舞的。以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应该是小学就开始看的。”但鼓舞超过实用价值，中国人对市场机会的理解要再过十几年才会有深切领会。

美国伪装成心理学的成功学著作，诸如《人性的弱点》《你的误区》之类。这种读物更有利于纸上谈兵，特别受初入职场的企业理想家们的热爱，“把干毛巾拧出一点水来”，应该属于此种类型。

成功学在 2000 年前后逐渐式微，一方面它进入到类似于传销一样的玄学范畴，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重心从制造业向更多的市场机会型转化，李嘉诚对房地产的理解和机会把握显然更激动人心，互联网创造真正大企业家的能力更波澜壮阔，而这些不是生产线上能管理出来的、甚至都不是精益模式所能创造出来的机会。

接下来大风大浪，不是成功学所能涵盖。成功学作为洗脑的一种方式，散见于传销课程、微商培训等领域，声名不彰，逐渐没落。

林先生总体上算作是成功学的受益者。说对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跟其他身边的温州人不一样。“温州人都觉得要赚钱，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个数字，我脑子里始终有个画面，上市，把公司弄上市，做上市公司老板。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画面。”

“很荒谬的，但它也很客观。你现在会想，你现金流如果很好，为什么要上市？那时候没有概念，上市意味着它很‘大’，这才是成功。有很多人到现在也是这么以为。一个公司，如果它盈利很好，现金流也很好，上市以后，自持股份超过 90%，也没有融资计划，单纯为了上市而上市，你说这不是很扯的吗？但是花了很多钱，满足一个虚荣心。”

时代变了，我们感受到他表现出对世界控制力不足的担忧，他很少会这样

为了论证它的荒谬，他特意再提温州人的思维，“温州人嘛，能避税么，合理避税，一定要避的。你说他为什么要上市？”去接受严格审计监管显然是不合算的。

**上市**，如果只看它的实际意义，它就是一种融资手段。IPO，首次公开募股，到资本市场拿公众的钱，出让自己的股份，本质上很简单。在中国它各个时期各有一些不同意义。

从 1990 年代初，国企转制，是指国营企业变身为国有企业，继而国有企业转化为股份多元，普通公众可以成为某个国有公司的股份拥有者，形成了金融市场。

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来说，相当一部分作为包袱被甩掉，这是一个私有化的过程，但这个私有化并不是在公开的资本市场完成的，总体上是内部人交易的形式。公开的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是为了有资质、有价值的国有企业提供融资准备的。国家在出让少部分股份的情况下，获得民间资本进入。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从拨款到贷款之外，开辟了新的融资路径。

上市之后，企业可以在一级市场获得大量的融资。

因为上市指标是被计划和被控制的，所以它是稀缺的，上市公司成为一个企业成功的标志。它是得到监管部门认可的、治理结构上是现代的、财务是健康的、可以随时从一级市场增发等手段获得持续资本进入的……最重要的，它得到了一年里某省或某个部委下面不多的上市指标，所以它是一个有办法的、成功的、在政商界游刃有余的公司。

而公司的实际运营者，不管它的所有制如何，毫无疑问是位成功的企业家。

国有企业之外的民营企业和所有权身份不清晰的一些企业逐渐也获得少部分上市配额。其所有者自然更是成功的企业家。

在 2000 年前后，新技术公司，特别是互联网相关产业的新技术公司崛起。它们的特点是：民营企业；创业者的高学历背景；闻所未闻的风险投资；以美元计的纳斯达克上市。

2000 年之后的知识创业持续至今，从未衰减。

所以，以敲钟、红围脖为标志，上市至今还是可以被视为人生巅峰。

第二个值得写入史册的上海之旅，发生在他的高中时代。这一次他的交通工具是长途大巴车，开始不是太顺，赶上学校放假，差一点没有买到票。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此次来上海的雄心：引进肯德基。为此高中生林先生借了一部“大哥大”，买了一件二手风衣，西司黎牌，气宇轩昂。

林先生的高中时代，大体上是在 1992 年到 1995 年间。林先生在此之前来上海看初中同学，这位同学在吴淞那里当水兵，请他去外滩吃了人生第一次肯德基。“这东西怎么这么好吃？”自此他爱上肯德基——对于一个刚上高中的人来说，爱的方式首选是吃，但温州人林先生不一样，他爱的方式是加盟。

他知道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快餐店是特许经营的加盟模式，想来早年间美国各种商业大王的书中少不了有一本“快餐大王”这样的书，关键时刻发挥了战略性的指导作用。他想得自己睡不着，“我都想到了加盟店做多之后，我把肯德基翻盘做成自己的品牌……怎么种土豆，想得很远……”把肯德基引进到温州，店址已经想好了，“白鹭电影院，我家就在附近，门面正好要租出来，我也问了大概要多少钱”。打电话问到了肯德基在上海的办公地址，大概是在新华路一带，约好了，闭门羹，在外面等很久才终于见上面，没谈成，因为门面不是他的，“我不可能租下来再跟他们谈嘛”，肯德基的人对林先生说不能加盟，“当时他们回复说他们要考察一次，作为一个学生，我还是不懂，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位置很好。他们发现我不是房东，也没租下来房子，他们就不需要我了，我也没跟他们谈居间，我不是中介……后来他们在温州的第一家店就是我选的那个店址。”他强调。

林先生后来跟肯德基那个经办人又通了一次电话，“我生气了，笨蛋嘛，我摔了电话。”

**肯德基** 林先生第一次吃肯德基的地方，在东风饭店，肯德基那时叫“美国肯德基家乡鸡”。东风饭店就是现在的华尔道夫酒店，在外滩 2 号。1989 年 12 月 8 日开业。中国第一家肯德基是北京前门大街店，正式开业时间是 1987 年 11 月。当时它的经典套餐菜单是：两块原味炸鸡，一份卷心菜沙拉，一个鸡汁土豆泥，一个小圆面包，一杯百事可乐或美年达。肯德基出现在中国是一件大事，首先是颠覆性的味道，好吃；其次是西餐，虽然是快餐西餐，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西餐经验，这也算是入门级消费；第三是消费处在核心位置的是小孩。其中第三条最为颠覆，因为以往吃饭下馆子的核心是男人社交，与小朋友无关。肯德基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与传统饭店消费无关，平等，民主化。至于价格，当年十块钱一位起，并不便宜。

所以，如果选一个最重要的社会标签与它关联，那么应该是独生子女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先生大局观和商业嗅觉在高中时就不同凡响。

2022年4月，上海封控，报界江砚先生写打油诗一首：

东风饭店初识伊  
拍案惊奇土豆泥  
未料三十五年后  
珍馐仍数肯德基

江砚先生记忆稍有偏差，如果从东风饭店算起，到2020年应该是三十三年。他至今还念念不忘“拍案惊奇土豆泥”，可见对于当时人的感官轰炸之巨。土豆寻常、难吃又“没品”，没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神奇味道。林先生心心念念的“种土豆”，应该也不是为了后来更广泛更为人所熟知的薯条提供原料，而是为了眼下一坨土豆泥。

不过，林先生的梦想与后来都市传说中的“马云逆袭”倒是可以结合起来。都市传说中马云当年应聘肯德基未果，过了近三十年，百胜集团剥离中国业务至百胜中国，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入股其中。林先生当年畅想炸鸡事业大获成功，翻盘为自己的品牌，有相近之处。

这是林先生一次“正经的大生意”，这是他自己对此的定位。我们问他经此一役，有什么心得，他说没有什么心得，就是想了就做。这大概率是他的风格，可能也是温州人风格的一种。

林先生的父亲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角色，在林先生的描述中，父亲觉得儿子引进肯德基的想法不错，好啊，支持，你去吧。这事没成，好啊，那你继续收钱吧。林先生记忆中他父亲对他明确寄予希望的就是继承家族生意。林先生显然拒绝了，家族生意至今还在，只是与他无关。

林先生继续收账，做他的黑社会。但林先生已经到了叛逆期，觉得他辛辛苦苦收上来的钱，转眼间父母又把钱放给同样的人，耳根软，人家说几句好话，就又把钱借出去了。“就是无视我的劳动。坏账收回，这是成就嘛。他们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见，当我是童工。”林先生开始质疑他的父亲，“他这种性格是做不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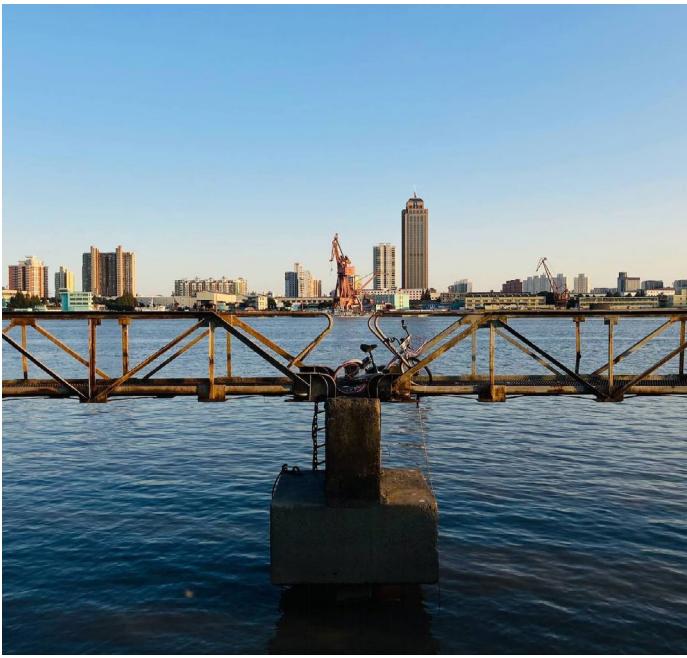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Icarus Chu](#)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温州人林先生的故事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②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一个从高中就开始观察市场的人，  
如何把生意乐观地做到现在。

林先生在替家族生意收账和拿着“大哥大”去上海谈大生意之间，还有一个叛逆期。这个叛逆期的初始原由就是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这一点似乎与各个时代的叛逆青春期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地方。不同的是他还思考了自由、地位与自由的关系，得出一个结论：有钱才有自由。

“向爸妈要钱的时候，他们会提出很多理由和要求。你会觉得好烦啊，我不就是要点钱吗？自己想办法不行吗？”他说他从小就会赚钱，“夏天抓一些 beatles，摆在幼儿园门口去卖。再大一点暑假进些冰激凌西瓜啊这些都可以赚钱。”他甚至还做过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到工地剪铜线钢筋什么的，卖给收废品的。猫啊狗啊，卖到花鸟市场”，最大的单笔生意他说也有几百块钱，花掉了。

肯德基是所有这些生意的一个结果。这个让他睡不着的生意结束，接下来他谋划出国。

“我没有读大学，高中都没有毕业，我本来是想留学的，”这是温州人的一个特别的逻辑，“读书了就不一定要出去了。”九十年代，出国是一件大事，留学是手段，获得居留的手段，目的是在国外生活——这意味着赚大钱、发财，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高中时出国机会很多。我们高中与洛杉矶一所学校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体育好，喜欢说英文，有一些人胆子小，成绩比我好，但不太敢说，我就跟他们一起玩。有一个人的爸爸还是迪士尼的股东，他给我看他们的钱，印着 Micky 和 Donald 的钱。本来我也要去洛杉矶的，去的话就住在他们家里。我们英语水平挺好，温州市第十中学。”

“我当时是上了报纸的。护照办好了，签证还没签，被拒了。原因是当时温州医

院有一个去美国交流的项目，那些人到了当地机场就被人接走了，逃了。以医学院交流的名义，堂而皇之地飞过去，就被人接走了，消失了。我们这事儿就黄掉了。我们有三四个人，大家都没去成。”

这件意外对林先生没有长久的影响，我们问他会不会想象如果当年去了洛杉矶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人生，他想了想说好像也不会有太大区别。不过，他觉得他可以了解更真实的世界。“新闻报道里看他们，娱乐信息里看他们，通过很多渠道来看，HBO, CNN, 通过娱乐电影报纸杂志了解的东西，和身边的人，扎扎实实的人，是有区别的。了解客观事实更多渠道一些。我们了解到的客观事实不是百分百的客观事实。你可能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90%，我可能是 60%，但总是会更接近一些。”

温州人的视野 对于温州人来说，出国不是学习，不是涨见识，是生活本身。林先生说，当时福建、浙江一些地区出国特别容易被拒签。因为他们偷渡的多，滞留不归的多。温州人和福建一些地方的人有出国传统，这与他们早年去中国各地做裁缝做木匠做流通贸易比较相近，是寻找出路的一个必然结果。

温州人至今仍然是在意大利、法国的中国移民中占据相当比例。当地的新闻网站中说到温州人占了华侨在意大利移民的 90%。

林先生因为对美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具备新一代移民特征。“看了很多跟美国有关的书，”他说，“自由，很多片子，录像带，铁血战士，施瓦辛格啊，都是美国。”

“人应该扩大他的视野。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每个人了解的信息准确率应该更高一些，不管是被滤镜滤过，但你总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大象不是一个犀牛，”以往我们都是用“生存问题”来解释温州人为什么那么爱出国，林先生用的是自由，“人应该扩大他的视野，原来华侨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90 年代，2000 年代初还是有的。现在信息都差不多了。”温州的华侨多是一个优势，而且华侨也确实是个优势。

林先生认为温州优势的衰减也与华侨不再具有信息上的优势有关。温州人因而没有太多领风气之先的条件了。

同理，林先生认为国内的信息优势正在超过国外。原来在欧洲的同乡们不如在国内的。他们现在要反过来了解他的先进之处。这个时候他提到他的搭档托马斯在法国的遗憾。

之后林先生患了心肌炎，不能搞体育了，也不认为高考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觉得当兵也没有什么不好，他的水兵同学回来分配个工作还不错。父亲还是过去的意见，怎么都好。母亲说是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他继续做家族生意。

不同的是他开始教英语，为他带来的新的到上海的机会——第三个值得记录的上海之旅。

他还是想出国。自学了一段英文，报了个复旦大学的自学考试，想再练习口语。这个时候出现了李阳疯狂英语，他感觉这种教学方式适合他。“我觉得英语就是交流，跟考个驾照一样，早晚会用到。我去个没有人的地方，玩，自己看书，虚拟碰到老外说些什么东西，有想表达的事情怎么去跟人家说。教材就是背字典，买录像带去看去听，还有美国之音，英语九百句，自由切换。”他还带着朋友亲戚家的孩子参加训练夏令营，跑到阳朔，居然被他搞出一点名堂出来。他去给人家表演这种学英语的方式，结果真的有温州的外语学校认同了他，请他去做了英语老师。

1999 年到 2000 年左右。先是在温州假期学习班做老师，有的时候给中学口语课代课，温州还有出国留学中心，两个月左右培训班性质的突击教学，各种人都有。他自己也带学生，不是那种大课，“我虚拟老外给他们打电话，我是初创。我一个一个打电话，自己研究出来的，需求撒气。今天模仿美国人跟他讲话，明天模仿黑人，几十个学生，抽查性质的，一个电话聊作业加固，对话当中穿插那些作业。我引导他们把这些句子都用上。”

“那个时候，我顺便帮朋友忙，开课，开放课，第一节免费的，讲得好，才能有人报名，招生的时候我替他们做示范的，一两节收尾的课我来讲。”林先生轻描淡写他在朋友的外语学校里的重要性。“也不错，二十出头，明星老师嘛，这样讲讲就拿两三千块钱，”他记得来上海招生——我把它标记为他的第三次值得记录的上海之旅——在福州路，阶梯教室，来的都是同济复旦财大这些学生，“他们都是哑巴英语，英语水平可能比我好多了，但不会说。得让他们开窍，跟他们交流。他们崇拜敢说英语的人。”

他说他跟明星一样，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他的高中英语老师也来看过他讲课，家

里人也觉得自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跟我们感慨，“我比较狂嘛”，看起来像是人生巅峰。

但林先生给自己定位的职业还是做生意。英语老师不是他的理想。第四个值得记录的上海之旅就此发生。

2001年，温州炒房团登场了。

“我就去买房了。时间多嘛。我看当时的《房地产时报》，一周一次。就想，我买两百套房子，十年二十年之后，还完贷款了，房子就完全属于我自己了，也不错。”标准的温州炒房团思维。我们把这次上海之旅视为他值得记录的第四次，从此他就留在上海。

林先生的第一套房子在常熟路，总价19.6万。林先生拼凑了一些钱，付了三成首付，6万多。当时一万块钱每月还66.21元，贷了十几万，这是林先生身上所有的钱。

差不多同一时间，林先生的父母也以林先生的名义买了一套嘉里不夜城的房子，在上海火车站太平洋百货边上，开始他住在这里。后来贷款还不上，把嘉里的房子租掉，他搬到常熟路小房子里。当时大房子能租到一万块钱，常熟路只能租到三两千块钱。

“从最开始投资老房子，一套房子买进来，装修好，租掉，以租金来还贷款按揭，差价很大的。一套房子改好了，租金可以付好几套按揭。很多人都是投机。我跟其他温州人炒房不一样，我要用租金保底来cover我的成本。他们也可以出租，但他们能打平就不错。我买老房子地段好，租金要高一些，而且房子小，总价低，我当时就觉得老房子的价值被低估，最开始做的时候，老房子几千块钱一万块钱都可以买到。不是贪多。我有一个扎实的数据基础。刚好有趁上这一波房地产往上快速增长，这是享受到了这一波的红利。这是投资基础。”

林先生没想到中国的房子会涨得那么快。如果涨得慢一点，他觉得可能还会赚更多一些，“因为突然有大幅跳跃性涨幅的时候，你就会犹豫，你就要谨慎地看看它的趋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先生也会跟着犹豫，当然，实际上房价并没有回头，“有些人犹豫一下就再也进不去了。一万三的时候犹豫一下，它涨到一万八、两万一，他就进不去了，这样的人有很多。”

迟至2019年左右的时候，还有人会问起，[温州炒房团](#)怎么不见踪迹了？温州炒房团与林先生总结的温州人最早进入流通领域、最早开始做各种小生意一样，受益于眼光。他们以一种“个体户”的精神进入到一个庞大的资本行业中，使用的手段同样是个体户的手段。当资本需求额越来越大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市场的变化超过他们的承受力（包括心理承受力）的时候，他们逐渐如林先生所说，“犹豫一下”“踩空”就再也进不去了。随着回报增加，进场的资本越发雄厚，香港台湾的炒家也在进入，“有人觉得涨得很多了，赚怕了，就快速兑现，万一跌下来呢？100万卖到1000万，赚得挺多了，就怕了。再想进就1500万了。怎么可能再买回来呢？就踩空离开了。”

而一个对资本规模要求越来越高的市场，他们为数不多的金融工具、省吃俭用、互助型的融资手段也渐渐力不从心。更何况这还是一个高度依赖政策或者说受制于政策的市场。通常来说，政策左右的权重不断加大，势必会为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相关利益人士带来机会，而温州人在这一点上也不占有任何优势。

温州人的优势终归是个体经营者所具备的草根优势，不管是从哪里学来的，都来自于风气之先，源自于赚钱的欲望，是胆量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就像现在不会再有个体户的传说，炒房者的传说也渐渐消失。

最后一次大家津津乐道于炒房团，似乎应该在2018年的丹东，据称朝鲜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个与朝鲜隔江相望的口岸城市经历了一次莫名其妙的涨幅。这同样是一个个体户时代才会有的那种民间资本的聚集。就像温州炒房团在世纪初期，深圳股权认购证狂潮的1990年代初。

“当时中介抽的点是1%到3%，上家2.5%，下家1%。但是信息不对称，你不知道中介虚开了多少，签约都是分开的，佣金可能还要多付一点。我帮你争取到了，110万谈个105万，房东要价可能只有90万，最后你谈到100万。”的确有一股莽气。如果不能控制房屋购买的流程，他就会任人摆布。“我就自己做中介，品牌要过硬，选中了21世纪不动产。当时号称全球最大，比较容易说服别人。”加盟费用

并不贵，押金十万，不用付电费，他当时请了三个人，挨家挨户去敲门。很快问题又来了，中介业务要持续招募，持续培训，人员在流动。他开了四家之后，发现精力完全在管理中介店面上面，即使这样，还是很容易飞单，再往大做很难。

“后来就不再需要了，做老房子的中介我自己都熟，我就把我的业务送给我的店长了。中介公司不要了，象征性地收一点钱，退出。”

一门心思做老房子，做到2008年前后。

“这波红利是买下来就能赚钱。别买太差太偏的东西，都能做上这个浪潮。当然，从数据来讲的话，所有房子留到现在，我的房子可能值50个亿。现在我的园区里我自己持有的这些房子，卖掉能值多少钱呢？七个亿五个亿三个亿？财富差很多。做老房子交易比现在这种做园区赚钱要多，净资产要更高，而且要高很多。那又怎么样？很多人觉得为你不值。觉得你做多亏多。什么也不要，天天打高尔夫球，米其林，全球旅游这多好啊。对他来说可能是有意义，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对于他来说这是对的。就是说人活着就是不需要那么多钱，给你一百个亿，几十个亿，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多持有几栋楼，就是这样。也是这样生活。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林先生对财富采取了一种达观的态度。这个时间点大约是在2006年，标志是他开始做园区，而不再单纯炒房，2008年他完全停止了炒房业务。这也是政策让温州炒房团逐渐销声匿迹的时间节点，各地开始限购，林先生说：“我总觉得用别人的名字不妥，人家要买房子怎么办呢？”

他用很现实的很小的一个原因，解释他业务的巨大转型。林先生始终有一个小小的虚荣心，他转向园区运营，去“做内容”，让他收入规模巨减，他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经济头脑的人——我可是温州人，很早就开始做生意的温州人，脑子很灵活的温州人——所以，他总是想解释这件事，时而为他的财富观做辩解，时而为他的园区生意隐藏的能量辩解，更重要的是，他的审美和由此打开的世界。

“很多房子几个亿的几千万的，卖掉了，我们都经历过，就算了。”

“投资多了就会想兑现一些。你赚得多，2000块涨到1万块，憋到3万块的时候就觉得该出手了。”“但园区，300倍或1000倍也都可以。”

在他的叙述版本中是这样水到渠成的：“一方面现金流还可以，另外一方面自己越来越有兴趣。老洋房买下来，新式里弄，石库门，老公寓买下来，你的改造空间很有限，无非是以旧复旧，或者新老结合。但你同时又可以很自我，我喜欢做什么（内容）就做出来。自己有想法，知道怎么做好卖。你既迎合市场，又卖个好价钱。一个很自我，一个很商业，卖最高价。”

另外还有的可能性是，“砸在手里的老房子”，他的第一个园区在康定路，离同乐坊不远，但拿下没多久就被证实即将拆迁，卖不出去，他开始做小酒馆，没想到火爆起来。他开始琢磨这里的门道。那时候上海有新天地模式、同乐坊、M50等等，规模都不小，他想的是一些独立的小区域如何运营。

他有意而为之更主动的项目是“屋顶农场”，也是在2006年开始，“当时很有挑战，边上就是垃圾房，交通不方便，苏州河边上，没有配套。当时请Wagas来，还是我们朋友呢，免费给他们不要”，他做了共享办公的设计，友好的咖啡厅，做了屋顶的小农场，租户可以领养番茄之类来种植……林先生说改造好之后，那是他当年最赚钱的项目。现在，这个地方连同它身后的普济桥，成为网红，据说是东京最昭和时代工业风的角落。

有一个东西开始发挥作用：审美。它也影响了林先生以后所有的生意。

它同样可以算来自视野的一部分，我们后来曾经问到他如何培养了自己的审美，他说就像你一直去看美术馆，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印象，但看久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看，什么东西耐看，什么东西昙花一现。你看一个地方的发达，你就“知道自己国家的很多东西都要提高”，“我在上海做这个东西，给更多的人感觉来上海是有内容有惊喜或者更有意思，然后，你觉得这里太穿越，不像上海。但它就是上海”。

接下来的十五年，那些我们熟悉的公司走马灯一样林先生周围出现消失，有时以竞争对手的名义，有时是合作伙伴，有时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有时他也弄不清楚到底算不算竞争对手，只好再度拿出温州人的态度——价格好就给他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先生与那些挂在他嘴边的各种身份的公司一样成为上海风格的诠释者，他们也被上海重塑。

“我没发现什么竞争对手。如果物业当成竞争对手的话，那就都是你竞争对手。”

从持有房产、招商运营的角度看，物业确实是他的竞争对手。我们从竞争对手这个话题进来，请他描述他的生意。

“陈启宗只买不卖，见过大世面。他见过香港的房子一路涨，他现金又够多，随便买。”陈启宗是恒隆地产的老板，在上海以收老房子著称。在收房这个环节，他们是竞争对手，“他也是投资，就跟买画一样。除了他，还有几个大咖，谢太，他们几个大都买进不卖出，手里好房子很多。我们有一度赶过他们，他们不做园区，所以我们不会直面竞争。”

“物理空间的竞争对手，就比较多。有时候我们没拿到，竞争对手也没拿到，但被如家全季拿去了。他们的触角也是无处不在。他们是加盟体系嘛。”

他觉得像素然、话梅这种品牌未来倒是有可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它们是做内容的，它们也是我的内容，素然离开兴业太古汇跑到胶州路，话梅做各种化妆品集合店，背后也有化妆品投资商……”本来它们可以成为他的内容，现在不但人家自己做，而且还跟他抢起了地盘。“以后商业地产，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样一块地方，别人做四块我能做十块八块钱，我有议价能力。我愿意把议价能力跟业主分享，我觉得他没啥理由不跟我合作。”与其说这是林先生的自信，不如说这是他的灵活。

同样跟他在抢地盘，他的灵活会让他后撤一步，所以他会成为宜家、WeWork 这样公司的房东。“WeWork 刚进来的时候，我的朋友提醒我说，你怎么可以把房子租给他呢。他是你的竞争敌人啊。竞争对手嘛，我说不是。根本不是。我要尽快拿到房子，尽快把房子租给他。趁他人傻钱多的时候。”他还真的就把手里在威海路的房子租给了 WeWork，他与他们两个全球合伙人谈的，他不喜欢他们又是犹太人又像特种兵的那种志在必得的劲头，“他们有他们的故事，议价能力越来越强。广元路（徐家汇）那么好的房子，新洪基现在给他七块钱，我威海路那么破的房子，给他十一块钱，所以它们议价能力越来越强。”

“房地产最准确的是租金。租金支撑不起来，再豪华也没有用。”

这是他对商业地产的总结。他观察 WeWork 很久，一直以为它们在下一盘大棋， he 以为它们要从自己的租客当中发现下一个独角兽，后来发现不是，继而就对他们的业务怀疑起来。“中国有那么多创业小公司吗？”他反问我们。

林先生没有给自己蓬勃的未来安排目标，100 万平方米？200 万？“我在宝山区做 100 万还不如在静安做 10 万，数量不是问题。”他相信还是内容为王，未来会有更多房子空出来。

他总是相信未来。

有些问题可能是杞人忧天，还可能会让大踏步前进的行动者们视为“小人常戚戚”，但我们还是忍不住去问了。“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疑问，”我们在他的兴头上小心翼翼地提出来，“略高于一般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做内容，这是你的生意，它有一个存在前提：这样一个人群，相对处于一个消费欲望比较高的群体。你租给品牌或者工作室，这些品牌和工作室存在的前提也是得有足够的客户。中国要有足够的能力，一直把这个人群维持在稳定、安全、正常的可能还要不断增加、一直往前走的状态上。这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状态。你是参与这个状态的一分子，当然你也创造了这个状态。万一以后不在了，或者，万一不是那么高速发展了，这个生意接下来往下滚动，依赖的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如果未来没有扩大怎么办？”

他早就预计到了我们的问题，几次准备提前启动回答问题的程序。“第一个，我们是租赁业务，绝大部分业主是国企，只要我的内容是好的，符合政策导向的、名片作用的，他们不至于把我怎么样。第二个，全世界都不好的时候，都跌 20% 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做。如果愿意我们就 OK，如果不愿意，没关系，我相对来说在市场上是最好的。我就挪地方，搬家嘛。我还能找到便宜的地方。我做内容，最终还是内容为王。”

我们表示没有太听懂。

“租金还贷能撑得起。现在是低于 3%，租金收入，1000 万的资产，原来能租 100 万，现在 30 万。低于 3% 的时候理论上是有风险的。但我一直看多。房价涨到 3 万多的时候大家觉得夸张。10 万多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了。我逐步卖掉。”他突然转换频道说起了内容之外的租售比，“我是一直蛮乐观的。很多恐惧是怕失去，我不怕。我装修风格好，租金比别人高，跌一半，我还是赚的。”

然后他说：“国家政策之类，宏观，跟美国打仗，很多行业都不会好，你不会独善其身，你不会随手拎着一桶金在那等着。”

“你是说宏观到一定程度，你做什么准备都没什么用，你根本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2008 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开始还分析还思考这里面的事，后来发现了，这完全跟我没有关系，想多了。”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JuniperPhoton](#)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温女士， 一个家族创富标本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③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而她自己浑然不觉。

2000年，温女士花15万接手上海浦东一家酒吧。酒吧原来的主人是一位美容师，温女士是她的客户，同时也是酒吧的客人。美容师不会喝酒，也不喜欢应酬，就跟温女士商量，要不酒吧兑给你？温女士想了想，觉得也不错，就成了酒吧的老板娘。

那时浦东荒凉，除了陆家嘴，没什么人，下班之后街上是空的。酒吧那一带不太一样，那里有一片涉外公寓，涉外公寓里住着不少磁悬浮的德国专家，上海当时正在修一条从龙阳路地铁站到浦东机场的磁悬浮试验线，用的是德国人的技术，德国人爱喝啤酒，支撑了温女士的生意。

德国人有一位中国同事，酒喝得好，会说话逗人开心，举止得体，年少多金，前店主还在位的时候，曾经指点给温女士，如今温女士接手酒吧，长袖善舞，与重点老客人互动增加，更加熟络，时间久了，走在一起，结婚了。温女士漂泊多年，没想到这个看来不是太上道的生意居然让她找到了一个优质男人，父母也特别喜欢，他们是知识分子，总担心女儿的江湖气不知道找回来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看到这留学背景的知识精英，正是天上掉下来的喜悦。

那个酒吧，见证了爱情，见证了儿子出生，一直到六岁，儿子要上学了，温女士忙活不过来了，最终把酒吧关掉。开了九年。

在另一个同样来自温女士的自嘲版本中，温女士会说酒吧是被老板娘喝垮的。她江湖气，豪爽，一喝多就不让人家埋单，她喝多了看着跟正常人一样，客人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她爱喝酒，年轻时喝多少都不会断片，现在岁数大了，会断片，断得越来越多，但她似乎也没有想节制一下的愿望。“开心了就喝呗，没有量，也不会特别控制，高兴了想咋来就咋来。”

我们与温女士约在杨浦五角场一间茶餐厅。温女士送儿子补课，“他自己来也行，但晃晃悠悠坐公交车得一个半点，我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可能她总借这接送的机会多点和青春期的儿子共处时间，但她的说法是：“我没什么事，正好跟你们聊天。”很无缝连接的样子。

温女士，简单点说是这样的传奇：1980年代她是一个洛阳问题少女，1990年代的时候她已经成为香港人，2000年代，她在上海经营一个酒吧，2010年代之后，她做投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会做一点，大多数时候是个母亲，在儿子的学校做家委会工委员会的主管。

她自己最喜欢的那部分传奇还是开酒吧的几年。茶餐厅里讲她喜欢坐在那里看乐队演出，讲她与陌生的或者相熟的客人聊天，讲初见她先生时他们风华正茂，讲浦东到处乱糟糟，讲房价，前一年周围还是荒草，转眼房价就涨了一百万，讲每一个人都有一点心事，“越是陌生人可能越容易说，安全吧。每个人都有一点心事。”她说她可以跟人随便聊上几句，“我就是居委会大妈。”然后哈哈大笑，她会制造点文艺的气氛，然后再用江湖风打乱。

我们起初认识她的儿子，儿子正准备上高三，我们觉得不应该破坏他的专注、影响他的学业，他就推荐了他的妈妈与我们聊天，由此我们认识了温女士，然后我们发现她的家族故事，特别是跟财富有关的那一部分，我们或者可以视为某种类型家庭的一个标本。

这种家庭一般是这样的：家中有一位强势的成员，掌握一定资源，这资源可能是权力也可能是钱，他会成为这个家庭中一言九鼎的人物，强势和中心地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如果他的财富或者可控的资源更强大，有能力和足够的宽度和深度容纳更多的生意，那么家中的其它成员会组成一个松散我们姑且称之为家庭经济组织。它跟互助型的或互补型的那些家庭共同体不一样，它就是一种生意集合。

比如，我们在郭星的故事里看到的，他的祖辈中，四爷爷率先做房地产，并获得成功，建立起人脉关系，煤老板、同档次的富人、政府官员、其他掌握一些稀缺资源的人等等，四爷爷渐渐在家中成为中心，他的三哥、也就是郭星的爷爷会成为他的合伙人，也能获得丰厚回报，而利用四爷爷建立的资源，他们家会分到煤老板的车队保险业务。郭星的爸爸在因为赌博入狱之后这个生意随之丢掉，说明它是一个稀缺资源。

还有一种成为家中核心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视野，比如海外背景——特别是在海外资源稀缺的时候，它可能意味着：致富机会的捕捉能力更超前，不同市场的套利空间，更不要说信息处理能力。前面提到的林先生说温州人早年间走南闯北肯创业吃苦背后的优势，大体上也算得视野上的优势：信息不对称本身产生的优势。当他们家族中某一位赚钱能力超出普通人数倍时，他们会吸引更多的钱，这一般可以视为温州民间金融的力量；如果他的生意更大，这个人的生意就会成为资源中心——权力或者钱的支配者所建立的这种中心，类似于郭星，或者我们马上要说到温女士家中的局面。

在温女士家中扮演这个角色的是她的父亲。关于温女士的财富人生，某种程度上要从她的父辈的人生开始讲起，由此我们才能看到一条相对还算清晰的轨迹。

温女士的外公1949年前在香港，外公的哥哥创办了后来还很有些名气的电影公司，外公在那里做财务，1950年代初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事——在上海做电影的人很多来自广东，随着共产党进入上海，他们大都回到香港发展，外婆不想去，把本来在香港的外公从香港叫了回来。温女士爸爸那一支，爷爷家兄弟几个做纺织厂，爷爷开绸缎庄，店在虹口，他们家在虹口有很大的房子，温女士对爷爷家有印象，十六七平方米的房子有六七间，她看到时这房子里已经住进了许多无产阶级，1990年代拆掉了……讲这些是要说明，温女士的父母到了这个社会开始讲出身的时候不会太沾光。

出身决定人生走向：当初她爸爸想学物理，出身不好，只能去同济；在中国的姓制度中，像他们这种出身的人可以考大学，但会有一些奇怪的限制，比如没有资格挑选更好的专业，所以即使到了同济，他也只能学工民建；同样这个原因，毕业分配只能去四川；没资格留在大城市，再往下就到了德阳；你这种出身凭什么去设

计院啊，最终就只能到达县，两个人，温女士爸爸妈妈是大学同班同学。

温女士就出生在达县。她有一个哥哥，是妈妈探亲时在上海出生的。她哥哥上学时就送到了上海，跟爷爷奶奶一起在上海长大，这是她和哥哥最大的不同，听起来她与父母在一起，应该得到更多宠爱，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她说从她记忆开始到1996年妈妈退休回到上海，一家人在上海团聚，二十几年间，父母都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两年。工民建，全称叫工业和民用建筑，总的来说都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开始盖房子，盖好了另换个地方再盖，总是换来换去。父母虽然在一个大单位里，但单位大项目多，实际上没有太多交集。

温女士记忆中，家里总是在不断搬迁。1976年，从四川到洛阳，这是大搬家，她有记忆，但爸爸在唐山，他并没有出现在搬家现场，妈妈一个人搬，“破家，一个板凳腿儿都得带着，舍不得扔，不像现在重新置办。感觉最贵重的东西是从上海带到乡下的两个樟木箱子。”

那对樟木箱子在温女士的叙述中后来又出现过一次：1990年代他们家搬到北京的时候，这箱子还在。她家还曾经搬到过北京，只是那时候她已经独立，这事儿跟她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

1977年上学，因为爸爸在唐山，妈妈上班忙不过来，她被送到上海上小学。但没过两年，因为与爷爷奶奶相处不愉快，回洛阳。之后可能是温女士生活最稳定的一段时间了。

1984年1985年左右，初三那年跟着父亲去了南京，建扬子石化。高一在南京读了一年，又回到洛阳，读到高中毕业，念了一个卫校。

这段颠沛流离、支离破碎的生活与一个叫“一〇三”的机构有关。简单点说，全球五百强里有个中建，中建下面有若干局，每个局下面有若干个公司，其中一个被叫做一〇三。温女士最初关于家庭和童年的记忆是在四川的“一〇三”：一个建筑公司本来没有资格有这种来历不凡的代号加持，当时它们承建了大三线某个代号一〇三的神秘工程，公司为这个项目运转了十来年，建设者也被叫成一〇三。项目结束，公司从四川迁往洛阳做下一个项目，到了新地方，他们还是习惯上叫自己为一〇三。在洛阳的时候——从1976年到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一〇三的鼎盛时期，连职工带家属有一万多人，小学初中高中，医院派出所，都是一〇三自己的。温女士说一〇三在洛阳当地是一个小山头，呼啸聚首在洛阳邙山一带，跟山匪一样。

如今一〇三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了。洛阳太闭塞，公司总部后来迁到郑州，年轻一代离职的离职，创业的创业，原来中心变成老年人留守的墓地一样。

温女士在讲到她的早年一〇三生活时提到若干特征：

全家吃食堂，虽然也会做饭，她父亲做饭也很好吃，但最直接的方式是吃食堂。

这是企业办社会最典型最基本的一个供应。

一〇三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温女士还没有提到的，大体上还应该包括影视剧场俱乐部、工会各种福利相关的门市部、菜店等服务。这被称为“企业办社会”，在经典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描述中，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大家都喜欢用从摇篮到坟墓”来概括。

她还提到建筑公司里最多的是四川人和东北人，通用语言是普通话，这种语言飞地是企业办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在一个更大的方言区里，语言被用来识别各种小型共同体。

企业办社会总是会被认为是一种很公有制为特点的企业模式，实际上它只是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被刻意放大而已，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生产、工人的稳定性而提供薪水之外的服务并不鲜见，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工人村大都是企业提供支持，现代企业中也不乏提供社会服务的案例。

人们往往会以为这种企业办社会的鼎盛时期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实际上改革开放前企业可以掌控的资产调动能力相当弱，那时被诟病的是一个工厂要建一个厕所都要由国家主管工业部批准，厂长没有实际指挥生产的能力，当然也没有“办社会”的能力。“社会”是建在单位之前的，在规划一个单位的时候，所有学校医院等服务机构一并规划出来，理论上它的主语不是这个“单位”，而是建立这个单位的上级部门。

实际上的鼎盛时期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半段的一个窗口期。当时企业的规模和架子都在，也不怎么为利润产值之类的事操心——反正都是上面安排下来的订单，自然也不用去想产品是否适销对路之类，总之没有市场这个说法，同时企业改革松动，下放一些权利给企业，市场供应也较之从前供销社体系要更灵活

更市场化，企业自主空间加大，同时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比如住房问题也放权给企业来通过自建房等方式解决，企业在单位职工个人生活中的地位在抬升。

这个鼎盛时期很快因为“抓大放小”、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而终止。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国企以步履维艰、“三年脱困”等标签存于世。

在二十岁之前，温女士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与爸爸，与妈妈，与爷爷奶奶，与欺负她的同学——她会因为各种理由被欺负：说上海话，知识分子家庭，爱美……

“我们在四川备受欺凌，父母出身不好，上海人，知识分子，这必须歧视啊。”

“不是不跟我们玩，是打我们，成天挨打。上小学时还成天打呢。我特别女汉子，是打出来的啊。”

“这是军转工的企业，领导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子女也那样。有知识是受歧视的，我从小就觉得读书没有用。”

这是她与父母最大的分歧。

“我那时候讨厌他们这种知识分子，让我读书。我妈打我，连打带挠。”

“父母教育方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人盯着。两个人都上班，哪有时间盯着你？就检查一下成绩，成绩不好就打呗。”

“眼睛一睁开，可能两人都上班了，晚上回来一个，另一个人就是出差了，一走就是很久。我们都吃食堂，父母也不做饭啊。”

“礼拜天，爸爸起床很早，做饭，我赖床上，找我妈讲故事。这事儿有过。偶尔，很少有。”

“上海男人都会做饭，我爸爸做饭很好吃。”

“本来可以在上海上小学，已经去了，但我感觉我爷爷奶奶歧视我。上海人么，说话做事斯文，他们觉得我是疯跑的野丫头，又不听话，就回来了。”

“那时候我去跳舞，不知道怎么被我爸知道了。把我捉溜回来了，直接一剪刀把我头发剪没了。你知道吗？他给我剪成清朝人刚剪完辫子时那种发型。你不觉得美吗，这回让你丑。你丑就出不了门了。”

“我不，我脸皮厚，我照样出门，我把头发剃光了，他们更崩溃。”温女士认为那是难得一次胜仗。

“高中在南京念了一年，然后回洛阳，八七年我上了一个卫校，我妈帮我选的。两年制那种中专，我不爱去。”

“我想赚钱去了。不想读书。我对钱有概念。知识没有用，读书没有用，知识分子没有用。”

她用三个“没用”来总结自己。

你可以理解成这是温女士的青春叛逆期，父母的知识分子身份让她吃透苦头，天然的青春期敌意，让她更希望走不一样的道路；你也可以理解成是那个时间段里对知识和赚钱的态度，那正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它们并非是矛盾的，一位美发师多赚一些钱并不会妨碍一个外科医生的收入，但在那个时间段里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零和游戏，1989年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节点，与社会几乎每个阶层里都心中不满有关，与前一年价格闯关失败有关……至少，温女士和与她差不多同龄，急迫地想进入社会并担心再不进入社会就晚了的人都会这么想。

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1989年，温女士来到海口，这是她工作的开始，也做好了独立面对生活的准备。那是海南成为特区的第二年，她并非因为改革前沿阵地的风口而来，而是因为海口在建机场——一〇三的新业务。

很快，她发现虽然同为改革开放最前线，但深圳似乎比海口环境更好一些，于是又去了深圳——她跟父母说想上学了：念自考，深圳大学，一科一科考，想弄个文凭。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什么让她在短短一年不到时间里，从“知识无用论”者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渴求知识的人。这种情况发生有几种可能：一是叛逆期就此结束，宣称能理解她的父母；二是幡然悔悟，接受知识有用；三是世故心机，发现父母身上蕴藏的能量……或者只是某个人指点，这样跟她的父母提去深圳的想法，可能更容易得到父母的认可。

显然是父母在发挥作用，在深圳落脚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来自一〇三。她入职

一〇三在深圳的派出机构，或者叫窗口单位。温女士没干几天，她发现父母的眼线似乎比父母还有更强的责任感来管理她的一举一动。于是辞了职，自己找了一份在大亚湾核电站的文员工作，一家港资专家服务公司——那时候像这种管车管司机提供保姆这样的服务都是由香港背景的公司来完成的。

这一年温女士二十岁了，见识了新鲜世界，更重要的是终于可以摆脱父母——妈妈那时候在厦门建机场，爸爸则调去了北京，她独立了。真的是这样？如果用未来的视角回望温女士的人生，会发现这个选择、选择的这个时刻、这个时刻的世界呈现出诡异一面：她貌似选择了独立闯荡，实际上这恰好是回归家族的开始。

温女士父母这一代文革前毕业生，大都出生在 1940 年左右，因为年轻，没有来得及树敌，如果没有参与到很严重的派系斗争里，一般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太多伤害，当然人生因此耽误十年到十五年时间不等，但还不至于就此荒芜。文革结束后，他们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说不上年轻，但老一辈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还有一批站错了队再无职场前程，国家这个时候又开始要求知识化和革命化——年轻一代有文凭的工农兵学员”没有专业能力，恢复高考之后的更年轻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即使毕业也没有根基，他们大规模人生启动要在九十年代之后……总之，在文革结束的这段时间，温女士父母这一代人，面前陡然间腾出一片上升空间，他们赶上了文革之后“拨乱反正”的好机会。

按温女士的说法，“到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其实就已经开始，他们技术出身的人在公司里地位有变化，”温女士是事隔多年才会发现这一点的，“那时候企业不像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了，都已经是有能力才能接到活儿了。你接到活儿，公司里的人才能活下去，那时候技术的人已经吃香了。父亲的技术在行业里绝对是领先的……”

父母分别出任了不同级别的公司的总工程师，妈妈的总工程师成色要差一些。但无疑，他们拥有更强的自主力量了。

这力量超出了一年前还是洛阳姑娘的温女士的梦想。

她说：“不用深圳，到海口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沿海城市的不一样，洛阳土啊，再也回不去了。到了深圳，更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高级。那时候就想，深圳都这么好，那香港得什么样啊？”

没想到的是，香港也来了。

“一〇三在香港办事处，窗口公司，没有什么特别的。”温女士解释，“不是成天想着我要去香港那种，但有机会，一定要去的。”

公司找好了房子，油麻地边上。“当时不懂是九龙最热闹的地方。但这场景在电影里看到过啊，没有陌生感。”

那时她也焕发出了学习的热情，学广东话，在深圳三个月就学会了。“天天跟着录音机，不会说广东话，人家会看不起你，欺负你。卖菜的都看不起你。”温女士说她有语言天分，三个月，地道白话，就是天天听录音机，大声说，跟着磁带学，走哪儿都跟人说，认识不认识就跟人说。到香港的时候已经说得很好了。

“香港话和粤语没有什么区别，语音语调有点区别，温柔一点。就像上海和川沙话。上海话很柔和。本地话有高有低。有棱角。香港话很温柔，棱角磨圆了。”

1990 年到 1996 年，她在香港深圳来回跑，那时候只有罗湖一个地方能过关。开始时她是内地去香港，工作到第七年的时候，她可以办香港身份了。1996 年温女士回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个香港人了。

温女士所供职的深圳第一家公司和香港公司的“上级”单位都是一〇三，它们一般被称为“窗口公司”。窗口公司本来是专有名词，有一定级别的大公司和地方政府在香港成立的官方公司，而且需要得到批准，才允许叫这个名字——可以作为证明的是，2003 年中国入世之后，商务部曾经专门发文件特意取消了“窗口公司”这种说法。

但在民间，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在香港成立自己的下属公司，也会被称为窗口公司。有的时候它是业务需要，有的时候是行使办事处的功能，为的是工作或者出行方便。这类公司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是香港与内地的巨大差异。

就如温女士所说的大亚湾核电站的专家服务公司，无非是提供一些诸如保姆、司机的服务，但这也需要有香港公司来做。其实细想一下也很简单，内地之所以没有公司能提供这类服务，是因为内地几乎没有会讲外语的蓝领服务人员。

在 1990 年代，不止是香港，深圳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1980 年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开始时分为“关内”和“关外”，关外与内地其它地区无异，“关内”需要当地户籍或者边防证（内地人士去深圳出差之前，需要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签发的一种证件）才可以进入“关内”。关外与关内之间有 84.6 公里的隔离铁丝网，进入关内被称为进入“二线关”，与“一线”的港深交界关口相对应。它从 2000 年代初开始放松检查，但它完全撤除要到 2015 年。

在香港或者深圳的窗口企业工作的人，因为可以更早一步接触到更城市化更优越的生活，所以通常都会有一些背景和资质。温女士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仰赖父母的余荫。

温女士在香港工作的六年里，获得了香港身份。我们并没有深入去了解获得这一身份的细节。通常内地出生人士，取得香港身份的前提是中国移民局提供一个“前往港澳通行证”的证件，俗称“单程证”，意思是不用“往来”，就此“定居”。温女士在 1990 年代获得这一证件也相当不容易。

因为她的香港身份，她的儿子出生在香港，自动获得香港身份，其后先生也成为香港人。

所以她儿子可以以港生的身份在内地参加高考。这是所余不多的福利。

1996 年 10 月，温女士的妈妈退休。公司有政策，上海出去的人，退休之后可以回上海。哥哥在上海，爸爸迟早也会回来，温女士觉得是回来的时候了。赶上浦东大开发，出于建筑行业的本能，他们家落户在浦东。

“回上海的时候，我哥他们已经在上海买了五六套房子了。”他们家的经济重心正在转向年轻一代的哥哥。我们说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人出人头地，就很容易形成为一个中心。他哥哥逐渐取代父亲的角色。

“我哥哥大学毕业之后在国企，呆了没两年，就自己出来跟私人老板做，”她没具体说哥哥在哪一家国企，但从其后的职业路径上看，至少在工作的起始和积累阶段，还是依赖父亲的资源和人脉，“私人老板做一段后，他开始自己做，建筑材料，砂石之类的。”哥哥的客户里包括几家上海说得上名字的地产商，在陆家嘴、在浦东塘桥都有项目，1990 年代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完全启动，房子不好卖，难免会有拖欠款，开发商就会作价把房子卖给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温女士的哥哥这样攒下了五六套。温女士自己在回上海之前，也买了两套。

“爸爸回上海后我买了房子，后来我又买了一套。都在浦东。”

“我们家人没有你和我。给你不给我。不分的。”

“后来做投资，二级市场。合伙人最早是证券公司的经理，后来离开证券公司自己做，有专业团队看项目，所以一级市场也做起来了。PE 也做。基金合伙人也做。好几个公司都上市了。我们小公司跟着他们。他们投五千万，我们跟个五百万这种。我哥哥公司上市，也是他们扶持一路。天使投资啊，都是他找来的。他是从公司一开始就这样陪伴。不是我找项目，我们跟着一个更大的。”

温女士的投资生意跟哥哥的公司似乎也有一点关联。哥哥的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哥哥的公司做得很大。

有多大？哥哥在成为家族财富中心和引擎之后，会把一些业务交给亲戚朋友来做，很快它就外溢到温女士的先生这一脉上，其中一笔建筑工程机械的保险业务卖给了温女士的小姑子——先生的妹妹。三年，保费 1000 万。“我们认为保费的提成已经做到保价里了，因为保价压得很低，就认为不会有提成了。”温女士没想到，小姑子拿了 500 万提成。不过小姑子跟公司说，这是温女士要的。“山东的保险公司，跑到上海来做生意，我哥哥后来理赔就很困难，有几笔根本就没赔到。人家说，你们拿了一半的回扣，还理什么赔啊？”

这事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贪婪的人类总是希望自己才是胜出者。小姑子保险公司的同事跳槽到另一家保险公司，跑来找温女士说你原来什么条件，我一样给你，“他认为我拿了好处，他说我给你更好的条件。我说我一毛钱也没拿到的。他说没拿到？钱都是我这里领走的。他后来给我算了一下，三年，500 万。把我气疯了嘛。我哥以为我拿了，全世界都以为是我拿了。”温女士说她要被气疯了，“以为我拿了，不就是觉得我哥拿了吗？我先生打死也不认这个事，他认为他妹妹不会这么做，到现在也死不承认。后来撕破脸了，我不理他们家了。结果小姑子拿一万美元到我们家来，没拿的话，她拿这一万美元干嘛？”

这笔钱我们称之为“肮脏的五百万”。温女士的儿子以前就知道这件事，我问他怎么看，他似乎很游移，有一次他说这是“大人世界里的破事儿”，还有一次他说他能接受这个东西，但他会保持相对干净一些，“如果你看到脏都没办法适应，肯定不行”，他似乎想说商业社会就是这么赤裸裸的，好像还试图劝我看开一点，“它不是肮脏的五百万，它是要到我手里的五百万”——如果这么想是不是会简单一些？他又说，“那你看我妈跟商界大佬打麻将，得到内部消息都会伤及普通股东的利益，割散户的韭菜，不创造任何价值，说起来也挺肮脏……”

嗯，都是肮脏，似乎也没有太高下之分，温女士的儿子很快把这“大人世界的破事儿”放在一边，是不是与肮脏保持距离，想这个问题似乎还有点早。我了解这是他惯的态度，他不喜欢他的家庭，不喜欢他们家财富背后的那些肮脏，但他不反对他的生活，他的补课费，他的零花钱，可能也包括未来还要花的更多的钱。

温女士讲她少年时，跟妈妈要三十块钱去闯荡世界，从洛阳到北京玩一个礼拜，行走江湖从来不怵。别人挤不上车，她以她的微笑和爽朗征服列车员，不但挤上了车，而且一路跟列车员混在一起，从吃饭到座位一应俱全，以后列车员每周经过洛阳，还会给她带各种小礼物。她说她有魅力，见谁都一直笑着，长个笑脸很重要。相由心生，这是善良。但另一方面，跟她儿子游移的态度一样，我对她说的每一步财富增长都要在心里质疑一下：合适吗？

她自己浑然不觉。她说现在她有两个圈子，一个是打牌，麻友是部队出来的，现在做 IT，半导体行业——这是她儿子说到的“商界大佬”的圈子，也是她投资各种“消息”的圈子。另一个圈子负责吃吃喝喝，都来自以前酒吧的客人，能聊到一起的客人，每年都聚，没有利益冲突，比较纯粹，但总归是“经济地位也有一点，事业也有一点”，否则哪里有心情在外面混呢？温女士把它视为天然前提。细想也是。

温女士总结自己人生，从来没有规划，想去海口就去了，深圳、香港都是想去就去。其实论及温女士的一生安稳，背后忧心忡忡拼命把她拉向有序人生的父母功不可没。温女士说，她人生里重要的两个决定都是“主动”的：第一个是去深圳工作读书，第二个是回上海。

“这都是重要的决定。”

温女士说得没有错，这是两个重要的决定。不过还有两个特点，一是都与她的父母有关，二是她恰好踩在两轮改革开放的节点上：1990 年代上海蓄势待发但还没有完全展现魅力的时候，她体验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同时抓住了香港；1990 年代后期上海表现出更多的后劲时，她已经自认为改革潮流中的一分子了。

“九六年上海不好比香港的，上海脏啊，修高架，到处都是灰，有一年下雪，路上脏死了，服务质量也差，还歧视外地人。”

“浦东好像突然有一天，变化那么大。一天一天不会觉得有什么变化的，但时间久了，突然发现变化很大。仁济医院旁边那条路，原来都是荒草啊，一夜之间，有一条南泉路，就连到八佰伴后面了。”

一切都是时代使然。温女士的父母最终都回到了上海，甚至全家又陆陆续续地回到了浦西——也许这才算是从他们超过四十年的工地生涯中真正走出来，温女士说她爸爸很厉害，回到上海还工作了几年才退休，退休之后继续给一些企业做技术——不是顾问，是技术负责人，他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正式歇下来不过三四年的时间。

温女士有了房子，不止一套，有了酒吧，有了儿子，她不再是洛阳那个愤怒的女儿，随时准备着炸裂，准备着离家出走，跟着哪个哥哥浪迹天涯，她现在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带着儿子补课，帮儿子参谋未来的学业和人生，她还曾经是浦东一家很有名气的公立学校的家委会成员——这也是她的高光时刻。“我每天都去学校上班的，早上去，晚上回，我有自己的办公室，我忙我自己的事。所有小朋友我是能叫出名字来的。”温女士在家委会里负责义工组织，那个学校真是希望家长要参与管理，从儿子进学校开始，九年一贯制，她做了九年。

与她做酒吧的时间一样长。

又一个九年过去了。

我们在想温女士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想到一些关键词，比如江湖，比如磁悬浮客人酒吧，比如圈子，比如对家庭的反抗与投降，比如叛逆，比如个人的抗争，比如沆瀣一气，比如肮脏，比如知识分子如何创造财富，比如一个官员的灰色空间……在这一章开头，我们还说过，温女士家族的财富还有一种简配版“官二代”的特色，

所以这些概念都会混杂在一起。

如果换个温女士的儿子这一代人来看，我们又会看到，大人世界里的破事儿，机会，资本，韭菜，每个机会都属于他们，甚至他们可以浪费掉一些机会……

有一度，我还会想到孙悟空，开始时大闹天宫，后来有了金箍咒，再后来从了主流价值观，最终成了主流价值的正果。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Rafael Banha](#) on Unsplash

# 非虚构 柴博士 曾经不可言说的未来？ | 三个人的改革开放史④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在他功成名就衣食无忧之后，

博士会慨叹自己的命运，觉得它有种种神奇之处。

1993年，巴黎。柴博士面临人生重大选择：回国还是继续留在巴黎。

留下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八年，一口气到手了三个文凭，法国高等电力学院的能源管理硕士、巴黎第六大学电力工程博士，英国华威大学的EMBA，单纯从职场角度，这些文凭与巴黎本地精英竞争也不逊色，更不要说他还积累了一堆社会资源，同学，老师，朋友，（在巴黎还是很讲究人脉的，否则为什么巴黎会诞生布尔迪厄呢？）还有，他现在是工作签证了，三年前的政治事件让博士和他的同学们成为“受益者”，法国人视他们为中国政府的潜在清洗对象，回国就要面对政治迫害，所以一股脑儿地给了工作签证。

最重要的是，他结婚了——太太是在巴黎认识的——同为中国留学生，太太有一个法国本地工作。太太不想回国。

回去，政治事件造成的创伤还在，不知道会不会被清算，博士出国时只有22岁，除了优秀毕业生、天之骄子之类的虚荣，资源与根基一无所有。

“那时候很少有人回来，”柴博士说，“大家觉得国家没救了，我们当时在法国有136个留学生，只有5个人拿了中国护照，回国的大概有十来个，在国外的，拿到工作身份的人也不多，国外护照方便。”

但博士还是纠结。那年他虚岁三十，出国之前，他信誓旦旦要报效祖国，三十而立，可是要回到国家立的……巴黎生活日趋稳定，与大学城隔一条马路他租了一个大房子，两室一厅，足够大了，楼下就是一个体育场。博士出国的时候中国甚至没有单元房的概念。每天生活在国外难以想象的生活中……还是想回国，承诺八年回

国，在来法国的飞机上，是要做政治家的，法国干好万好，哪里有他从政的机会……他想起上初中的时候，给自己树立一个发明创造的理想，目标锚定为居里夫人，不能忘了发明先进仪器的初心啊……但是，现在对面这个楼就叫居里夫人楼，不是更接近科学家理想吗……老师说回国可以去南京，做教授，大展宏图……回国会被认为很傻，一定是在法国混不下去了找不到工作才会回国……老师从德国回国就没有人认为很傻……但她的机会可以复制吗……现在参赞大使馆一秘也都来劝他回国，国内改革开放，需要人才……

\*\*\*

柴博士七岁的时候，家里鱼塘的鱼不知什么原因全部死掉了，家里没吃的，活不下去，他要出门讨饭，有村民不仅让他吃了顿饱饭，还让他带饭回家。

八九岁的时候，柴博士跟着一帮盲人，在河水里摸鱼。“披着军大衣，生着火，对着胸烤。烤好了，身上发烫，拿一个大笼子，倒扣着，鱼进去出不来的。河面有的时候不结冰，钻到河底下，冬天，鱼会往你身上靠，因为你身上热。”“夏天的鱼有劲，冬天的鱼没劲的。你骑在笼子上，是用你的热气来抓鱼。这是高级的抓鱼方式。低级的就是抽水，那不厉害。河底下不冷，你求的就是冰。烤多了以后，胸前都是红疤。”瞎子？那些人是说书的。过去说。用石灰把眼睛搞瞎了。我们也搞不清楚是啥情况。”

“挺好玩的，”博士说现在的小孩子们没有机会经历这样的事了，“我五年级才开始上学。”那时候他已经十二岁了。他父亲拎了二十斤鱼给校长。他得以直接从五年级开始学起。

所以初中的时候，会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跟他们一起上学。博士小，不懂，有些大男孩已经学会调情，跟女生打来打去的。

博士的爸爸那时跟着一起搞船队，搞船队的人的家里，孩子上学都晚。学校里像他这种情况，也有。

博士说这跟时代有关，上学不是最重要的事，甚至不算出路。家里来过一个算命的，觉得他是可造之材，这样才有学上。否则，为什么要上学？做鱼塘做船队都很好啊。

这里也有他们家庭特别的原因。特别的原因是他爸爸本来有公职，但五八年九月的时候被人举报偷粮食，他用的词是“陷害”“污告”，结果他爸爸一气之下离开老家，开始南迁。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自然灾害”或者是“困难时期”。

博士有一套福祸相依的理论，他说他爷爷是有钱的，到他爸爸这一代就破落了，否则他们家的阶级成分就会打成地主。

他爸爸每两三年搬一次家，最后落脚在青阳。青阳县，最著名的是九华山。那个意外闯入生活的算命先生，可能与九华山的大背景有关，也可能无关。总之，到九华山稳定下来之后，柴博士有了上学的可能性。

没想到博士大概也算得上是学业上的神童。数学第一次考试25分，第二次100，自此不可收。数理化，按他的说法，他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之所以要低调地考六七十分，是因为班上有些坏同学嫉妒他学习好。关键时刻考满分就够了——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他都是班上和学校里的第一名。

这种所向披靡持续到西安交通大学，大一大二他继续创记录——数学满分。1984年他报考研究生，1985年博士得到了公派法国进修的机会。然后，一去八年。//

他说到自己跟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他还试图去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在他的记忆里，这件事似乎有所成——“像我那年，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我证明的结果跟我的同学在美国证明的结果是一样的，他拿到了一个奖，叫菲尔兹奖。我没有拿奖，我奋斗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纸张写了很多很多。我们得出差不多的一个结论，他得了奖。这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时代，一束光芒，自己，我像疯子一样，晚上到一点多钟，早上四五点钟，我就写这些东西，我又不是搞数学的，人家得奖的人家就是数学家。”

哥德巴赫猜想后来是中国“民科”的一个经典题目。1978年1月《人民文学》刊登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报道数学家陈景润的事迹。这篇热情洋溢的报告文学被视为中共改变对知识分子态度的开端和信号。当年3月18日到31日北京召开有5586名科学工作者参会的“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发表的开幕式讲话中提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更改为人们更熟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几乎公认：自此，中国进入到一个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理性的轨道上来。郭沫若在这次会

议的闭幕式上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它成为时代的代名词。哥德巴赫猜想也成为所有有志于在科学的春天里播点种收获点什么的人响应时代号角的切实行动。

一句话随着春天到来而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们认为过去十年的混乱局面是一群来自上海滩的文人造成的混乱（与任何时代一样，转换成身份攻击和地域歧视为家所喜闻乐见），现在需要做实事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理工科的、动手而不是动嘴皮子的、讷于言如陈景润这样的人来代表一个新时代。1978年应该是柴博士初中升高中的年份，正是心高气傲，奔着天之骄子一骑绝尘而去的时候，也是他所说的“数理化”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数学甚至科学王冠上的明珠会让他心动。

我们后来问柴子亮，你相信你爸爸证明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吗？他说可能没有证明出整个的猜想，但可能证明了某个环节。

他是真心崇拜他的爸爸。

\*\*\*

柴博士还是纠结。

“科学的春天”毕竟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知识分子被落实了政策，过去几十年间的被迫害者补偿了工资，得到了礼遇，分了房子，有很多人甚至当了官——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四化”要求中，知识化和专业化虽然排名靠后，但是硬指标，让过去单纯的革命化干部小小地丧失了一些优势——知识分子扬眉吐气了一回……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总是有一点失落。

现在需要做实事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理工科的、动手而不是动嘴皮子的、讷于言如陈景润这样的人来代表一个新时代。

在这十五年间，社会各方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各种尝试，蠢蠢欲动之中释放出来的机会总是与知识分子的路径无关：比如搞流通，做批发零售，知识分子既拉不下脸面又吃不得太多肌肤劳碌之苦；比如搞承包或者双轨制，那归属于有资源的人类，这好事轮不到他们。知识分子总是木讷，反应不够快。

一定是哪里不对。那十几年间，刚刚打开眼界的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审视自己的不足之处，几十年后，会被郭星这样的新一代人视为“看自己什么都不好”“什么东西都是美国西方的好”“河殇派，公知的鼻祖”……有一点郭星忽略了，那时候虽然看自己总是苛刻，但好在他们总是有热情，当时的逻辑是：我们得改变它。

所以，有了八十年代让人回忆之处：与意识形态无关，与生活的种种粗陋和贫穷无关，甚至与道德水准和热情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时代有价值之处就在于身处其中的人都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来改变这个社会。所以，有了八十年代末的社会割裂——原来社会的改变与否竟然与我无关啊！

1993年这个时节，中国从八十年代末的社会割裂中正复苏，标志是前一年的南巡讲话，被视为重启改革。这一次继承了八十年代乱糟糟的启动方式——人们看到的是官员和精英阶层的下海，他们被冠以九二派的名头，九三年春天北京大学打破南墙，拥抱市场（后来它成了网吧一条街），相距不远北京林业大学的崔万增老师（副教授，党总支书记）在五道口街头烙起了馅饼。

柴博士的老师访问欧洲，到了法国，给他带来的消息：回国，到东南大学任教。如果单纯看斯文扫地的乱象，其实更像是一个提醒：这并不是他八年前离开中国时，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的气象。但诱惑从来都是虚幻甚至是魔幻的，它并不许诺真实，只是许诺可能性。谁都不会否认，重启的改革之路、东方风来满眼春，蕴含了无数种可能性。

更何况书生意气的柴博士，去国太久，还心存侥幸：或许可以改变社会。

如果我们从三十年后向那个九三年望去，我们更能看出诱惑的真实性那一面。1991年，朱镕基入阁成为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确实重启了改革，乱糟糟的开始只是表象，在其后的十年里，市场经济的明确提出、建立围绕市场经济的所有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建设、分税制、加入WTO……中国进入一个真正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北京大学的南墙后来又重新砌起来了，这不重要，中国高校的市场化持续了几十年，从学校企业、经费制度、学术界与企业界、政府之间的合作，都远远大于一堵墙所承载的。

与过眼烟云崔万增相比，更久远的是“九二派”，它是一个时代的概括。

“[九二派](#)”是那一年及前后下海企业家的总称。当然，前提是下海前有一定的精英阶层背景，下海后确实有所成就。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改革催生的经商热情，让不安于清贫的精英阶层选择了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生活。他们普遍相信实业救国（或者准确地说是“兴国”）的主张，商业会让中国走向普适价值为代表的现代社会。

探究深层心理原因，人们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八十年代的“第三梯队”建设，比较早期地锚定了一些进入“梯队”的候选人，他们被政策倾斜、被特殊培养，而与之资质相差不多，但晚了一步的精英则丧失了被提拔和晋升的机会。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个逆淘汰的过程。第二，是八十年代末的社会割裂，让试图改变社会的精英阶层心灰意冷，如果不能改变社会，让中国走向更好，如果国家并不需要他们的热情和才智，那么自己经商赚钱更像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陈海，一位作家，与“九二派”的几位代表性企业家和他们的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他在2012年出版了《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一书，热情洋溢地为他们树碑立传。

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评价‘九二派’多为投机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他们不仅情商高、智商高，也有胆识。事实上，金岩石本人也是那个年代政治上的失意者，三十出头就官至副局，但却早早断了自己在仕途上的念想，因为‘见不到头’。

“所以陈东升对外界的误解颇显无奈，‘有些人对我们有看法，觉得我们有一点像苏联体制改革时期体制内接了权力的人。其实我们没有权力，我后来办企业也都是靠校友、同学一起来张罗。因为我是来自县城的，北京谁都不认识，就是靠同学、校友帮助，这也是一张关系网……’

“这与陈东升的同学毛振华的总结异曲同工——‘我们胜在有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陈东升说：‘我太了解这个体制，离开体制创业，却又不能真正脱离体制，我不光知道这个创业点子对不对，这个点子怎么实现，还能把路径勾勒得一清二楚——这事该找谁，找谁再找谁，这个人什么风格，那个人什么风格？我们那个时候对体制太了解了，整天在里面混嘛。’

“所以把‘士大夫下海’放在整个改革开放这一宏观大背景下去观照，1992年并不是起因，而必须把它视为一个结果，一批忧国忧民的社会主流精英，有着良好的知识储备及体制积淀，受毛时代教育，大我情结深重——这注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包括冯仑、黄怒波在内，有人可能对‘九二派’企业家有一些误解，实际上，他们并不像有些人，通过改制挖了国家的墙脚，把属于国家的财富挖到自己名下。他们现在所创造的东西，有很多都是以前这个国家和社会所没有的。这些人下海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为有好的眼光，具有独到的观察力和发现力。”

\*\*\*

博士带着光环来到东南大学，发现自己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我想做的实现不了，我不想做的呢，给我加了很多帽子。这个头让你做，那个头也是你来做。”博士正式的名头是东南大学工培中心主任，副校长待遇，按副校长的级别配了三室两厅的房子。“对你很客气，待遇好。这是法国收入的百分之一，我在法国的时候三万块钱一个月，回来三百块钱。”

“我想做东大和南大教育资源共享，建共同宿舍，餐厅共享，分开管理，独立管理，人家就说你这东西是扯淡。保卫处的人、工程处的人、后勤处的人你不考虑吗？食堂都是谁谁谁的小舅子做的，人家肯给它拿出来吗？共享资源，那谁老大谁老二呢？”

“教学也一样。我说论文不要注重数量，要注重质量。读哲学的一个家伙一年写了52篇文章，一个礼拜一篇。我国外搞博士论文，几年才搞一篇，你这个我吃不消。往往是前面我想好的东西，后来是我自己给推翻了。哪有这么顺利的？”

更何况书生意气的柴博士，去国太久，还心存侥幸：或许可以改变社会。

“那时候我底气很足，因为我是要回国报效祖国施展抱负，谁挡我道不可行。我们中心派来了五个处长，我说要这么多干嘛？我要一个就够了，把这些人都变成了调研员。”

“我要做的事，也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希望我把企业政府和高校结合起来，建一

个真正有效的好的培训中心。EMI 培训，管理学。这事儿复杂在哪儿呢？我请这些人有外国老师，有中国顶级教授。按本科上课的待遇，一小时 20 块钱，这能请到人吗？所以我出到 500 块钱，半天。”

“这很高了，我一个月工资才三百。这事后来就犯法了。我有小金库，我收学员的费用，组织部给的，组织部给那些国营的厂长下达指令，每个上课的人，一周两周培训，三百或五百块钱学费。这钱你不能进学校的财务，一进学校就拿不出来了。你只能搞体外循环。”

“那时候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做 EMI、MBA 这种培训都赔钱。我们培训是有外国政府资助，赔的就是资助的钱。学员、老师是得到好处的。学员得到了知识啊，南京市、江苏省有成绩啊，参与课程老师赚到钱了。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事后也想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想赚钱的话，计算机培训、外语培训，赚疯掉了。计算机证、五笔字型、外语证，都不要什么精力。我不想这事，没上过学的人都能赚到很多钱，我一个留学回来的人，做这种事情就是大材小用。我把这业务划给我们的副处长，我说你去弄吧。后来他赚了好多钱。”

博士想法多，书生气，有想法就提，提上去之后上上下下依旧客气，“想法挺好，不现实。”这是博士在东南大学三年半时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他辞了职，到上海，做阿尔司通驻上海的首代。

博士没有讲这其中经过了怎样的权衡与抉择，在九十年代中期，放弃教职和级别，转到一个他说他自己并不是很在意的外企身份。“如果只是为了进一家外企，我是不会回国的。”

经过大约 30 年以后，人们记忆中和影视作品中关于“下岗”的描述，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忽略了它实际上发生在中国大部分拥有“工业基础”并实施了“转型”、也包括了“转型失败”的所有城市。上海在九十年代下岗职工生活的窘迫也超出想象，我们曾经与《上海人家》——记录了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上海市井生活的一本摄影画册——的作者胡杨交谈，他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上海人的生活质量、精神面貌这些与东北没有什么两样。

在官方的改革开放史的描述中，这段时间被描述成“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进入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是“抓大放小”，是下岗潮冲击每个工人村、老工业区和家庭。为什么上海避免了其它老工业基地的命运？除了它得天独厚的港口、历史上的金融中心的基础之外，更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的引入。当然，跨国公司来到上海而不是其它地区同样也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积累。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带来资金和就业机会，同时辐射到城市建设、基础服务对下岗职工的吸纳，使得上海可以一定程度上“脱困”成功。

大规模下岗潮普遍认为肇始于 1994 年，与上海浦东开放的时间相近。随后 1999 年上海“《财富》年会”召开，2001 年入世成功，上海渐渐远离国企改革造成的冲击。

柴博士大约是在 1997 年前后进入外企工作。他的身份是“首席代表”。严格来说，这个时候他进入的还不能叫“外企”，它不是企业，它是企业的一个代表处。外企，也就是跨国公司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是在 WTO 之后，之前正式运营在华企业，有部分以合资企业面目出现，更多的则是代表处形式：在没有正式业务的情况下，首席代表被授予与中方合作过程中行使技术许可、项目合作、业务拓展的审批等功能。首席代表是跨国公司的派出人员。

“首代”，首席代表的简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挣海外工资标准的高级人才的象征。有海外教育背景，懂跨国公司运营方式（真正理解“现代企业制度”），与中国各级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合作一些大项目，是招商引资的重点围堵对象……在中国的有钱人还有一些不明来历的“小老板”时代，他们是可以称为“金领”的那一群人。

在加入 WTO 之后，大部分市场领域开放，那些没有市场准入资格的公司、原来以代表处形式存在的跨国公司开始更多地以独资企业面目出现。首席代表这个跨国公司职位逐渐不重要以至于消失，首席执行官这样运营实体的职位炙手可热。

柴博士在前一轮改革开放的“科学的春天”中似乎只踩到了一个尾巴，这一次踩中了外企进入中国的黄金时代。

他还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地铁。这是阿尔司通的长项：电力及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当博士来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比任何时候都想证明自己还是一个国际

化的大都市，当政者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变大样”的城市建设扩容理想。

“那个时候是爆发期，上海的前几条地铁都有我们的业务，我们，德国的西门子，还有日本人的公司。法国总理访问上海是要到我办公室的，XXX、XXX 都打交道的，”他提了两个政治局里才会出现的名字，“以市场换技术，我们那时还是比较开放的。想想看，任何一个国家靠斗争靠战争，只能一败一伤的，它不可能是双赢的。这个社会发展靠的一定是互助互利。《易经》说得好，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是谁说的？”“《易经》说的。”“《易经》还说过这个？”“周易啊。”“它原文是什么？”“那谁知道，我不记得了。可以查一查。”博士不开心，认为我们扯远了。虽然我记得这是一个洗发水的广告语。）

博士说在八十年代，中国主要是买国外的东西，纯粹是买国外的技术，买东西；九十年代，朱镕基主导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加入了 WTO，以市场换技术，吸引投资，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中国制造，所有这些东西有机结合，紧密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方法是对的，”博士总结，“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和为贵，为什么要和，和气生财，和气发财。”

柴博士会讲“和为贵”了，柴博士琢磨怎么做生意了，柴博士开始看人脸色了，这差不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市场里深一脚浅一脚学习的过程，对于他们个人来说，也是他们获得财富积累的过程。

柴博士在前一轮改革开放的“科学的春天”中似乎只踩到了一个尾巴，这一次踩中了外企进入中国的黄金时代。

“一开始是抵触情绪。以前做教授，那是朝南的，现在做生意拉不下脸面，一下子变成求人家了。”柴博士对自己的生意历程其实谈得并不多，“很多东西需要学，头半年做生意我急死了，啥也做不成，被各种假相所蒙蔽。”出去谈业务，人家请他吃饭，他很高兴，他不知道这就完了，意思是我这生意不给你做了。“他要把生意给你，应该是你请他吃饭才对，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的客户是政府，政府官员打哈哈能力一流，他们也恭维柴博士，柴博士厉害，柴博士一流，后来他发现他们只是把自己当技术员，给他们讲技术，而且讲技术也只是做做样子，他们也听不懂。“他们只迷恋外国人，他们觉得大公司一定是外国人的。我见一个副县长，带着大使，他根本不相信我是首代，瞧都不瞧我。九十年代就是这个风气。”

博士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说好了当然是时机，什么时机你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现在回忆起来，他觉得做生意的时候没怎么看书，全靠他的“底子”，他一向自诩经历过国学熏陶，举重若轻，他说报纸报道过他，他讲了他的孙子兵法，讲他的道德经，讲他对儒家文化的研究，还有他的葵花宝典，总之这一并归入到他的“儒学经商”中去——做生意要仁义礼智信，要讲忠，要讲孝，他说他跟领导出去，从来不提生意，他又说了两个政治局里才会出现的名字，“我只跟他们谈哲学谈文化。他们把秘书赶下车，我们在车子里谈文化。”

“有效果，要不生意怎么从 5000 万美金做到 10 亿美金？”

这是博士唯一一次说到他的业务规模。他很谦逊，“我觉得主要是市场因素。但市场与你个人有关系，打开市场只是一方面。你要顺应这个规律，开始半年，我一点生意都没做。当时办事处有几十号人。我去的时候，阿尔卡特和阿尔司通还是一家。一年之后分家了，我去阿尔司通，也有一百号人，走的时候有五百人吧。”

他离开的时候，他主理的阿尔司通是“服务性的独资公司”。代表处还有，在北京。“办事处没有实质性经营权，有宣传，收集信息情报这些。处理当地关系、经营是底下的公司和子公司。投资技术转让这些是子公司做。”

博士要做自己的咨询公司了。1993 年选择的红利还在为他带来新的机会。他可以选择做教育，当得出“不适应”官僚化体制的结论之后，他可以去阿尔司通，职场到了天花板，他还可以选择自己创业做公司。

1993 年的选择是几十年改革叙事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有一个段子说北京一位赵先生，1984 年领风气之先，30 万卖掉自己祖上留下来的四合院去美国留学，30 年后回国养老，发现同样四合院现在值 8000 万。这是讲机会成本的问题。

柴博士的八年留学时间，如果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看，没有丢掉太多机会。无论是假设 1985 年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通常是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他可能遭遇下岗或者转制的危险，也可能真的走上仕途；或者是假设他在 1988 年或更晚

一点在国内读硕士或者博士之后参加工作，他会有更多的国内人脉和经验，也许能适应教育相关的职业，也可能与本科毕业一样进入企业或者政府……有很多不可测的结果。一个优绩主义者很容易夸大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强调自己选择的重要性和主动性——他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或者说战胜了自己从小就有的那个同位素一样的竞争者。

博士离开阿尔司通的时候，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他又恢复了知识分子那种生活。他利用过去的资源，提供咨询服务：中国人了解法国，或者法国人要了解中国。还是与他 1993 年的选择有关。柴子亮对他父亲的工作所知不多，说应该是那种“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这种服务。

他现在看起来像是那种在大公司里工作多年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那种优绩主义者，对这个世界有无数见解——当然，拥有财务自由的人有权对世界表达更多的看法，特别是财富。

“我看你们说要看‘富足的第二代’，有三类富足的人，”博士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帮我们总结财富流转和世界秘密的，“一种是勤劳加官商结合的，他的富足之源是什么，这个要考虑。二是有知识的，受益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通过读书成为精英，还有知识型精英的后代。三是官二代和红二代。他们是继承了父母的关系网而发财。”

一个优绩主义者很容易夸大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强调自己选择的重要性和主动性

显然他自视为第二类人，“我肯定是，读书那么好，工作那么好。本身应该就要好一点。”但真的富裕了吗？博士持一种怀疑态度。他摆弄着手里的万宝龙笔，“我这个万宝龙的笔，以前签字笔是乱用的，不珍惜，丢掉了就五块钱嘛。万宝龙几千块钱，我就要始终拿在手上。这种文化如果不建立起来，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贵族的国家，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不是你会说话，你懂几个字，而真正知道什么好什么是坏，这才叫懂文化。我一辈子用这种打火机，质量越差，越便宜，我富裕了，我富在哪里了呢，我没有享受到富裕带来的文化。我天天吃垃圾，天天吃掺假的食品，不干净的东西，我富裕了，富裕在哪里了呢。我不如到农村去吃更朴素的菜。更健康的菜。”

“所以我们要理解所谓的富裕，内涵是什么。”

嗯，愤世嫉俗的博士。

“像我在法国的同学，都算上层的吧？我们上学都是精英学校，就我一个中国人。现在他们有电力公司老总啊、议员啊、厂长啊，收入七八万块钱吧。但他们生活质量高，退休金高。我们现在存几个钱，退休以后就没什么钱了。他们退休以后还是能拿五万，社会福利啊、环境啊都挺好。不像我们宣传里说的那么差。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到我们中国来养老。我们到法国养老行吗？很难，不够用。还有医疗、生大病这种，我们不能光是比外表……”

他在讲“市场换技术”的时候，我想起工业党人，比如郭星对此耿耿于怀。我们问博士怎么看，他继续支持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韬略和雄心，但也对未来表示忧心忡忡。

“谁是下个世纪的主宰？也许这次疫情就让这个时代提前到来，这个时代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制药。因为这很奇怪，你可以说我是迷信。在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开端出现这个问题。新的时代到来的话应该是新材料。”

“我原来以为主宰这个新时代的材料的，是日本人。如果新时代是生物医药时代的话，那主宰未来的可能就是印度了。三十年之后，主宰世界的是可能是印度。印度医药和它的神学有关系。”

“你要主宰这个时代，一定有相应的新的技术。你像英国主宰，那得有蒸汽机车啊内燃机车啊，你得主宰这个。像美国，一定是靠信息时代。我们想进入他主宰的信息时代，半导体，我们差得远。人家有一百年了，我们没有很深的东西。阿尔卡特当时有自动售票系统，插在里面过闸机的。上海仪器公司，他们搞三年，搞不出来。泰山核电站，我们做那种柜子，防震，防腐，花的钱是我们从法国买东西花钱的三倍，模具还是我们送给他们的，但质量还是搞不定。这些东西，但是后来我们中国售票系统反而变得很好。后来我们换了个思路，不再用接触的磁条，而是用无线接触，无线卡，卡上带无线的，碰一下就行。澳洲的技术，近场通讯，就改变了，不需要精密接触了，改无线传递了。我们跟德国比，精密机械相差四十年。没有精密机械，

精密加工就上不去，没有精密加工，精工系统就上不去。驱动系统，导弹，一定要很精确，光精确不行……传输这东西，卫星收款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搞，大学生都会搞，paypal，大学生就能搞出来，软的东西，不需要硬的东西，不需要驱动性。”

我想到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那部电影《毕业生》，一位语重心长的大叔扳过 Ben 的肩膀：“你就记住一个词，塑料。未来塑料行业很有前途”。

这是我们遇到的另一个经典场面。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担忧。工业党人对“以市场换技术”的诟病，是觉得市场并没有换来核心技术，只换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点竟然与热情拥抱过去的改革开放的博士相差不远。最后他们总是会回到同样的地方。

十一岁时，柴博士还没上学，在江上帮他爸爸抓鱼谋生。有一天，江边冒出来一个人要过江。博士说我帮你摆渡过去。那人看着他，说小孩，我到你家去看看。博士的妈妈在家，那人说，你把你儿子八字给我，博士八字简单，属龙，正月初一中午出生。那人看过，跟博士的妈妈说，你这儿子了不起，十八岁时吃公家饭穿公家衣，二十一岁漂洋过海走，三十岁漂洋过海回。

那是 1974 年或者 1975 年，那时他们家没有人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生活中没有考大学这个说法，吃公家饭穿公家衣被理解成是当兵，漂洋过海自然理解成是当了个水兵。

未来世界难以想象。在他功成名就衣食无忧之后，博士会慨叹自己的命运，觉得它有种种神奇之处。对于很多出身于农家，尤其是在 1960 年代后期就开始有记忆的人来说，后来发生的所有事完全是梦一样的存在，那是不可言说的未来。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文内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第十二天  
进入平原；关于一个小站



## 非虚构

# 来自铁路的二十四封邮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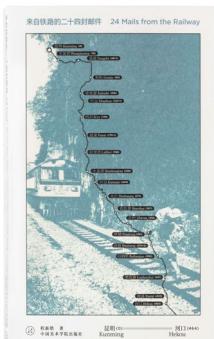
程新皓 | 新书试读

以身体为媒，让历史、土地与尺度开口低吟。

滇越铁路是法国殖民者在 20 世纪初修建的窄轨铁路，连接越南与程新皓的家乡中国云南。它从 1900 年开始由越南的港口城市海防开始建造，连通河内，再向西北延伸进入中国云南，直至省会昆明。整条铁路在 1910 年建成，并成为云南的第一条现代道路。程新皓童年时就住在滇越铁路沿线，而在得知它的尽头是一片大海之后，这条铁路就承载了他对海洋的梦想。

2019 年 12 月 1 日开始，程新皓从昆明出发，沿着滇越铁路向铁路尽头的海洋行走，每走一公里拾拾一块铁路上的砟石，每一天夜里也会从云南的不同角落给一位虚构的友人发一封邮件。最后，他用了 19 天，走完了铁路在云南省境中的 465 公里，身上的石头重量达到了 20 多公斤，已发送的邮件也积攒下了 24 封。

通过这些文字和影像，《来自铁路的二十四封邮件》讲述了这趟旅程的种种：关于铁路，关于云南的土地——在土地上渗透着的个人故事和两个亚洲国家被殖民的历史，关于东南亚山区的现代化，同时也关于程新皓的童年记忆和地理想象，关于他和故乡、和这片地域的联系。经出品方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两封邮件，分享给读者。



X:

今天算是正式进入了蒙自坝子。这是滇南地区最大的坝子之一，连续三十多公里都是山间小平原，一马平川。铁路在此又奢侈地走起了直线，从大庄出发，好几公里都没有一点拐弯，直直延伸到目不能及处。太阳从铁路尽头升起，阳光直刺，整个平原漂浮着逆光中特有的氤氲。亲切美妙，但却没什么变化。铁路两侧是两排夹竹桃，零星开着快颓败的红花。再远处则都是农田，有干枯在田间的玉米梗，以及几处因焚烧玉米梗而升起的烟。我思忖之前所说的氤氲有多少是来自这样的燃火。风向不对，烟就飘到铁道上来，逼人掩起口鼻快步而行。我开始盯着远处看，看远处铁路尽头升起的是什么——是火车，人，或者穿过铁道的动物？是向我行来，停滞不动，还是逐渐远去？看着那些似乎在逐渐变大的黑影，我猜测着他们的身份，以及踏上铁路的动机。光线折散下，这些人影仿佛在时时形变，于是我脑海中浮现出了贾柯梅蒂的行走人形。





没有了拐杖（到现在还难以相信竟然是被牛踩断的），今天腿又瘸了，两个膝盖交替着疼痛。幸好路程不长，只有 16 公里，我在中午一点就走到了终点碧色寨。踏入车站吓了一跳：到处都是穿着六十年代军装样式的男女，搔首弄姿，摆出各种莫名其妙的造型。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冯小刚的《芳华》在这里取过景，于是各种商家也就打着这个旗号出租服装给慕名而来的游客。可是，我还是没想明白，这些和这个沉寂了几十年忽然又喧闹的火车站到底有什么联系？



碧色寨之前不叫这个名字，最初的名字大概叫作壁虱寨，并不是说这里壁虱多，而是形容这个村庄之小，如同壁虱一样不起眼。不知是哪任官员嫌弃这个名字不雅，就给改成了碧色寨，似乎多了一点翠绿，郁郁葱葱。（正如盘溪原来叫婆兮，大概是当地土人的语言，久而久之失落了本义，只有一个指向地方的声音留下来。改成同音的盘溪后，则好像又使得这个名字获得了意义，南盘江在此弯弯绕绕。）碧色寨是当时滇越铁路上最大的几个车站之一（事实上，是唯一的一个特级站），也是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的交汇处。之前的邮件里我提到过，当时法国人为了个旧的锡矿，本打算把铁路沿红河修到蒙自，再连通个旧，但被清朝官员以沿途人口稠密，田亩众多，恐生民变为由而否决了。但毕竟个旧的锡矿需要运输，于是众多士绅资

本家们一合计，打算自己来修这条铁路，又担心法国人染指，于是决定选用六十厘米的轨距，这也就是云南人说的“寸轨”。这条铁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建成，连通石屏、建水、个旧和碧色寨，在碧色寨与滇越铁路进行转运。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碧色寨这个小村从 20 世纪初就逐渐变得繁忙，而在 30 年代时则近于鼎盛，美孚石油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在此设立了机构，各种转运公司也在此驻扎。海关来了，云南第一个电报局建立，还有云南最早的咖啡馆和网球场……据说，当年云南人称呼这个村子为“小巴黎”，可见其繁华一时。



但抗战以后，随着滇越铁路的停运，碧色寨站很快就衰落了——甚至比它起初的兴起还要迅速。数年之间，断壁残垣，只留下被各家占据、改变成仓库或者私宅的各式建筑。渐渐地，这里又变回了一个农业村落。我记得在 90 年代寸轨停运后，似乎还有一个火车头被放在这里的铁轨上生锈，但当我 2008 年开始拍摄滇越铁路时，这个火车头就已消失不见了。现在，突然有一个制作拙劣的仿制模型被放在了原来的位置上，作为某种旅游地标供人拍照。（同时被用围栏围起来，写着“禁止攀爬”！）不知说什么好。

我本计划今天在碧色寨过夜，但找遍了村子都没有旅馆，只好坐车进城，明早再坐车到碧色寨接着走下去。

买了新的登山杖，买了新安所的石榴，还吃了一大碗过桥米线，心满意足。  
希望你也吃好了。

D

2019.12.12



X:

今天从碧色寨离开，开始了新的旅程。这个“新”我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的——从碧色寨开始的路段，我之前从未踏足过。除了那些站名和诸如人字桥、白寨大桥之类的著名地点，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会进入什么情景中去。（本来我写的是“风景”，想了想，改成了“情景”。）

五点多起来，乘头班车回到碧色寨出发，刚好赶上天明，而此时快满的月亮还低垂在天空未亮的一角，遥遥沉下去。

我本以为今天的道路会和昨天一样从平原上穿过，殊不知才出碧色寨，铁路就沿着东边的山坡，切着等高线缓缓爬升，没几公里就已经在山腰，沿着山梁的凹凸而弯绕。铁路沿线时不时出现茂密的柏树林，尖尖指向天空，让我想起弗里德里希画中的森林（森林前的轻骑兵，还有那几张把森林比喻成十字架的画）。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用德国浪漫主义来为眼前的景物赋值，就像不知道之前为何本能地敲下“进入风景”……但这的确就是我在看到这些树林一瞬间联想到的东西。如果再想的话，那就还有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浮雕中的柏树，生命之树，以及那株挺立在伊朗南部原野中四千多岁的老柏树——近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活着的生命体。而此时在铁路两旁的柏树明显没那么古老，至少比这条不断被修整、同时不断在锈蚀陈腐的铁路更加年轻。我快步走着，随着铁路继续在山间盘旋，近处的景致变了又变，而在右手边的谷底，蒙自城兀自在曙色中，走了很久，看见的都是同样的几座高楼。那么一比较，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脚步以及里程碑上的数字。是啊，我走出来了十三天，

实际上也就走了区区 300 公里，相当于大巴车四个小时，或者高铁一个钟头的路程。时间变得漫长，道路却不见得更加遥远，念头更没有深到泥土底下去。

过了黑龙潭站，铁路突然向左拐弯，离开了蒙自坝子，进入群山中。而在今天的终点站芷村，它终于来到南溪河的源头芷村龙潭处。这条河流会陪伴我随后的几天，从高原上奔涌而下（这是我此刻的浪漫想象，而理智中知道这个季节它没有那么多水。好吧，是我希望自己奔涌而下……），直到中越边境，而那里也是整个云南省海拔的最低处（74 米）。从这个维度上说，那就是最接近大海的地方。

今天走得非常快，25 公里连走带拍只用了八个小时多一点。（在钢枕上行进，类似于在平地上踮着脚尖走路，你可以试试看或者至少想象一下……）快到终点时，我开始磨磨蹭蹭，用节省出来的时间尽情地拍着。看远处一帮小学生沿铁路过来，我便赶快架上脚架（这一路用快挂把脚架和相机分别挂在背包带的两边，这样，从起意到架好开拍只需要二十秒的时间），对着他们录了起来。结果他们一窝蜂冲到我面前，指着我的相机说，哇哦，高科技！又指着我昨天买的手杖说，看，他要去爬山。我纠正他们，说我是来走铁路的，从昆明走过来，十多天了。他们用小孩子特有的惊讶哇了起来，接着问我为啥要走铁路。我告诉他们，这是滇越铁路，你们知道它已经一百零九岁了吗？孩子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他们都招呼过来，指钢枕上的文字给他们：看，这是不列颠钢铁公司，1931 年的产品。我继续把这条铁路的历史简要说了一下，并终于讲出了那句我童年时的魔咒：“你们知道吗？这条铁路的尽头是一片大海。”我听到这句话时，年纪大概和他们一样，或许也正是



眼前他们这样的神情。二十多年过去了。你说，二十年后，这些孩子中还会有人记得这句话吗？会有人和我一样，试图沿着铁路走到大海吗？

明天是接下来这几天里最长的行程，32公里。据说，是像瑞士一样的山峦。（当初参与修建滇越铁路的法国铁路工程师妈尔薄特这样形容过。）

我想象一轮在薄云间晕染开的月亮。晚安。

D

2019.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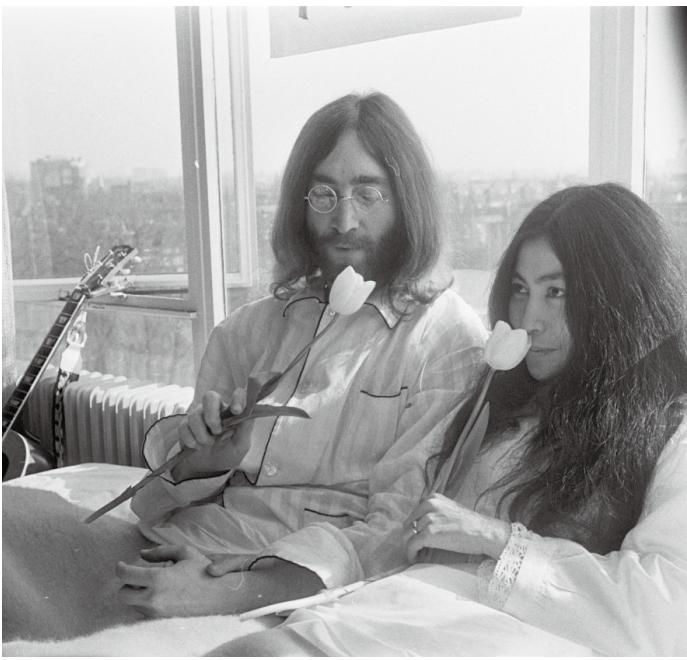


程新皓

1985年出生于云南。20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作为艺术家工作生活于云南昆明。他的作品通常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并均与故乡云南相关。通过身体在场的工作方式，程新皓使用录像、装置、摄影与文字等媒介，体察不同来源的逻辑、话语、知识与其背后自然、社会、历史，及镶嵌于其中的行动者们之间的复调链接。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Ilya Repin, (1887) Portrait of Lev Tolstoy*

## 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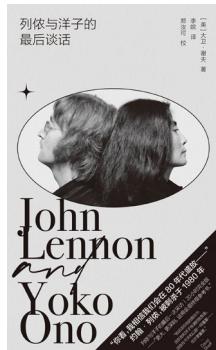
# 约翰·列侬： 小野洋子是我的老师

大卫·谢夫 | 新书试读

“如果你不那么怕，爱就会长驻”

1980年，列侬与洋子重返录音室。他们的爱与灵感凝结成最后一张合作专辑，《双重幻想》。为了推广这些音乐，洋子决定接受一次全面的双人专访：就是这一次——列侬与洋子的最后谈话。在长达三周的密集谈话之后，年轻的摇滚迷大卫·谢夫记录下这对伉俪丰富又多变的面向，坦诚而鲜活的话语：有愤怒与激进，也有诙谐和讽刺，有浓烈珍贵的浪漫精神，也有明朗坦诚的赤裸独白。

访谈见报的第三天，列侬被刺杀。然而，他还活在他的音乐中，活在他和洋子传递的信息里。四十多年以来，这对世界级的艺术夫妇已成了永恒的传奇；他们的爱在继续，他们的精神在启迪一代又一代人。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列侬与洋子的最后谈话》中两人聊起彼此的关系、初遇，以及爱的部分。



《花花公子》：你让你和洋子的关系听起来像是师生关系。

**列侬：**就是一种师生关系。这是人们所不理解的。她是老师而我是学生。我是个名人，一个应该通晓一切的人，可她是我老师的老师。她教了我应该知晓的一切。当我漂泊不定时，当我就是那个漂泊者时，是她在那儿。她是我的唐璜。这是人们不理解的。我与该死的唐璜结婚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是她教会我找个地方坐下来。唐璜不一定笑，唐璜不一定要有魅力，唐璜就是唐璜。唐璜周围发生的事与唐璜无关。

就像她叫我滚出去——唐·小野说“滚出去”，因为你没搞明白。唉，就像被送进沙漠一样。她不让我回来，是因为我还没准备好回来。而当我准备好回来的时候，她让我回来了。我就是这样生活的。

《花花公子》：洋子，做约翰的老师感觉如何？

**洋子：**哦，他在遇上我之前有很多经验，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经验，所以我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这是双向的。也许我有力量，女性的力量。因为女人会产生这种力量。在男女关系中，我认为女人真的拥有内在的智慧，她们带着这种东西，而男人有一种对付社会的智慧，毕竟他们创造了它。男人从不产生内在的智慧，他们没时间产生。所以大多数男人都依靠女性的内在智慧，不管他们表达与否。我认为约翰只是表达了这一点。他甚至说女性的内在智慧让他彻悟。人们认为这是句娘娘腔的话：“我从一个女人那儿学到了很多。”

《花花公子》：你追随洋子和追随其他领袖有什么不同？“不要追随领袖……”

**列侬：**唐璜和非唐璜有什么不同？幻觉和现实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么不同。自从我遇上她，她再也没找过其他人。

《花花公子》：但听起来像是洋子成了约翰的上师。

**列侬：**不，唐璜没有追随者。唐璜不在报纸上，没有门徒，不需要任何东西，也不给人改宗和传教。知道的人不说，说的人不知道。

在她印地卡画廊（Indica Gallery）的展览，我感觉就像是和唐璜见面。一开始我没意识到是和谁见面。然后，我加入了最初的游戏，我玩了最初的游戏，然后我们连接起来。

《花花公子》：你能详述一下神奇的神秘王子和唐·小野会面的故事吗？

**列侬：**那是1966年在英国。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活动”——

（外面传来一声刺耳尖叫）哦，又一起在达科他的凶杀案……（笑）——这个“活动”，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日本先锋艺术家办的。她很火。展览上有些黑袋子一类的东西，我以为一切都会跟性有关：艺术性的狂欢。太棒了！好吧，那展览的确很激进，但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所以我走了进去，那儿没人。那其实是开幕夜的前一晚。那个场所还没真的开放，但是老板约翰·邓巴（John Dunbar）非常紧张：“百万富翁来买货了！”他就像疯了一样飞来飞去。然后我开始看这玩意儿。一个塑料盒上有几颗钉子。我继续看过去，看到在架子上有一个苹果——一个新鲜苹果在架子上，一张便条上写着“苹果”。我想，你知道，这是玩笑，相当有趣。（想起那一天，洋子笑了）我开始看出其中的幽默。我说：“苹果多少钱？”“二百英镑？真的。哦，我明白了。那么这些弯曲的钉子多少钱？”所以我四处转，玩得很开心，然后下楼，那儿坐着几个穿牛仔裤的衣衫不整的人。我有点戒备，想，他们一定是些时髦人物。但是不，后来晓得他们只是帮她摆放东西的助手。但是我，怎么说呢，我是名人，富有的摇滚明星，而这些人肯定是知道那些钉子和苹果是什么的人。我看出了幽默，这些东西展现得很好，但我的反应有点像很多人对她的幽默的反应——生她的气，说她没幽默感。实际上，她是歇斯底里的好笑。

总之，这样过了一会儿，邓巴带她过来了，因为，你知道，毕竟百万富翁来了，对吧？

**洋子：**(邓巴) 什么都没对我说，就把我拖出来了。

**列侬：**我在等袋子。袋子里的人呢，你知道吧？我一直在想我是否有胆量和什么人一起进那袋子。你知道，你不知道谁会在袋子里。

于是他介绍了我，而因为应该有活动要举办，所以我问：“咦，是什么活动？”她给了我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呼吸”。我就说：“你是指（喘气）？”她说：“就是这样。你理解对了。”而我在想，我理解对了！（笑）但我已完全准备好要做点什么了。我想做点什么。

**洋子：**哦，你做到了。

**列侬：**我呼吸了，但我想要的不仅仅是，你知道，把我的意识放在呼吸上——这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说法。我看到了钉子，我懂得了那幽默——也许我没有体会到它的深度，但我从中得到了一种温暖的感觉。我想，这我能做到。我能把一个苹果放在架子上。我想要更多。

然后我看到了画上的这个梯子，它伸向天花板，那儿挂着一个小型望远镜。就是它让我留了下来。我爬上梯子，拿起望远镜，那儿写有非常小的字。你真得站在梯子顶端，就像这样。（约翰站起来比画着）你在这个梯子上——你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你随时可能摔倒——然后你通过望远镜看，上面写着“是的”。

哦，当时所有的所谓先锋艺术和所有人们认为有趣的东西都是负面的，用锤子砸钢琴，打碎雕塑，都是无聊的、负面的狗屎。一切都是反、反、反。反艺术，反权威。而仅仅那一句“是的”，就让我待在了一个满是苹果和钉子的画廊里，而不是走出去说：“我不买这些狗屎。”

接着我走到一个展品前，上面写着：“拿一颗钉子钉进去。”我说：“我能钉颗钉子进去吗？”她说不行，因为画廊其实第二天才开张。老板邓巴说：“让他钉。”那意思是“他是百万富翁，他可能会买”，你知道。她更希望开幕时它们看起来很好，漂亮、洁白。这就是为什么她从来没在这些东西上赚到钱；她总是忙于保护它们。（笑）

于是有了一个小小讨论，最后她说：“好吧，你可以花五先令钉颗钉子。”而我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说：“好吧，我给你一个想象中的五先令，然后钉进一颗想象中的钉子进去。”那就是我们真正相遇的时刻。就在那一刻我们锁住对方的眼睛，她明白了，我明白了，就那样。其他的，就像他们在那些采访中说的，都是历史了。

**《花花公子》：**后来那些展品呢？

**列侬：**我会给你看的。它们在屋子里。肖恩和我时不时放一个苹果在架子上，但是肖恩总是把它吃掉。

**洋子（微笑着）：**当然，当时我们各自都结婚了。但我们还在约会。

**列侬：**那就是事情起变化的时候。从那时起，我开始从“披头士”解脱出来了。而每个人都开始有点不高兴……

**洋子：**即使是在现在，我还读到保罗说过这样的话：“我理解他想和她在一起，但为什么他非要和她每时每刻都在一起？”

**列侬：**洋子，你还要背负那个罪名吗？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洋子：**不、不、不。那是他最近说的。实际上发生了的事是，我和这个我喜欢的家伙上了床，突然第二天早晨，我发现这三个人带着怨恨的眼神站在那里。

**《花花公子》：**你认为人们的那种态度也是嫉妒吗？

**列侬：**是一种嫉妒。人们无法忍受恋爱中的人。他们完全不能忍受。他们想把你拉进他们待的洞里。

**《花花公子》：**这种美妙的感觉不会感染他人吗？

**列侬：**哦，是的，但你总会有一刻不想和他们同处一室。你们彼此聚精会神，你们彼此心满意足，而人们无法忍受这些。他们当然会被你吸引，因为你的能量既正面又高昂——最高形式的。而能量吸引能量吸取者。无论他们乔装成朋友还是敌人都无关紧要。这会以许多神秘的形式显现。他们会把你吸干。这就是那个游戏的本质。很难让这种感觉留下来。

**《花花公子》：**就像汤姆罗宾斯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半真半假地问：“如何让爱长驻？”

**列侬：**试图占有它会让它消失。试图占有一个人会让他离开。每次你想搞明白一件事，它就会溜走。每次你打开显微镜的光，事物就会改变，因而你永远看不见它是什么。一旦你问出问题，它就消失了。这都是周边视觉。不能直接盯着它看。试着看太阳。你会变瞎，对吧？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专注于它。爱是一枝花，你必须给它浇水。

**洋子：**是的。我认为爱永远不会消逝。一旦你认识了某个人，你就再不可能不认识这个人。而相知就是爱。所以你永远无法摆脱爱。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会有误解和分离，但爱总在那里。在一起只是爱的一种形式。也许那是一种强烈的爱和爱的表达。但爱是灵魂的东西。它总是在那里。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对失恋感到不安。如果他们不害怕去爱，那么他们总是会爱。人人都有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想弄明白如何才能让爱持续。每个人都真的关心爱。这是最大的主题。爱让万物运转。它使万物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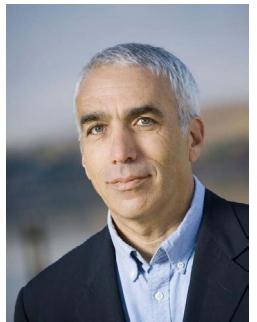
爱也很难。有时候我们有占有欲，这没什么。我们不应该为有这种感觉感到羞愧。没事的。我们因嫉妒而感到羞愧，因占有欲而感到羞愧。我们如此害怕有仇恨之类的情感。这都不必要。所有这些不过是不同形式的能量。能量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我们拥有的东西没有哪一样是丑的。出自我们的一切都是美的。我们被教导说唱歌是美的，但如果你唱走了调就不美了。我们被教导说你要以一种特定方式唱。但是我认为，出自我们的一切都是美的，因为我们是人。

我为人类感到惊叹。他们多有韧性啊！他们生来就没有保证可以存活。他们的保证只有父母，而父母也如此不安，他们自己也像孩子一样。而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在“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你不该这么做”中活下来了。一个人若没有这些成长中的不安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将是个有趣的设想，但即使有这些不安，我们还是活下来了。想象一下，我们真的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微笑着摇头）无论如何，人生是如此艰难。走下去需要极大勇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好好活着。（笑）我认为人生是美好的，我很享受人生。我正在享受。

也许直到最后，我都是一个无止境的乐观主义者。我有时会想到那些人的想法：啊，好吧，世界很快就要完蛋了，所以我不要孩子。哦，如果你害怕失去，你就会失去的。看看那些人。我们在谈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美——这是真的。

**列侬：**嗯，今天它是。昨天它糟透了。所以管它呢。（他和洋子笑了）

**洋子：**就是那样。没关系。如果你明白了，你就不会那么怕了。如果你不那么怕，爱就会长驻。



大卫·谢夫

美国作家、记者。曾为《纽约时报》《滚石》《花花公子》等报刊杂志撰稿。2009 年入选《时代》杂志百大人物。著有《漂亮男孩》。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大都会》(1927)剧照

## 非虚构

# “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你还有吗？

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 | 新书试读

一份写给当代人的睿智生存指南：

关于今天人的境况，关于我们当下的生活。

齐格蒙特·鲍曼去世前，曾与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交谈了几天，在他英国利兹的家中，就他毕生的工作进行了四次长谈。在这场谈话中，他继续以“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我们的时代，涉及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爱与亲密关系、身份、工作与休闲、家庭、犹太性、道德、幸福、社会、宗教、政治。从经济危机到新型穷人，从社会责任到公民权利，从战争阴影到幸福日常，从偶像作家到人格类型……并就这些话题，深入思考，为我们这代悬浮在不安全感的人提供对自己境况的新认知，改变了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思考方式。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将熟悉变为陌生》中《乌托邦与历史时间旅行：今天的“彼岸”在哪里》一章，分享给读者。



哈夫纳：今天有无数的反乌托邦，却几乎没有乌托邦。前者描绘地狱图景，后者则追求尘世天堂。大多数乌托邦计划仍是纸上谈兵，但您本人信仰的共产主义对世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鲍曼：我在英国的学术生涯中出版的头几部著作中的一本里提过：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未来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而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生活质量，也注定会沦为那种发展趋势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令人惋惜的连带受害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柏林墙倒塌后西方社会的故事回顾性地证实了这种古老的信念。）那个信息又引出了另一个信念：宣告任何形式的现状是“实现了的理念”这种做法，对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作用来说，可能是一记丧钟。更长期来看，这样的宣告将不可避免地使这种信念失去那个作用。对当前关于民主的思考来说也一样，因为纯粹的民主也是一个乌托邦，一种尚未建立的理想状况。

哈夫纳：抛开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不谈，在某种意义上，这么说也对：关于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也已经过时了。

鲍曼：的确，但现在离意识形态的终结比以往更远了。现代性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切都可以通过运用人的能力变得完美。但今天政治的口头禅是：别无选择。西方的掌权者就是这样告诉人民的：一切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都是在浪费时间。根据新的私有化意识形态，这样的思考对美好生活没有任何贡献。干更多的活，赚更多的钱，但别去思考社会，也不要为共同体做任何事——人们就是这样被告知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

哈夫纳：对年轻一代来说，别无选择的想法似乎是自然的。

鲍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他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这不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长期规划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我们没有能为我们指引方向的“北极星”。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一个不比当前社会糟糕的社会。像唐纳德·特朗普、欧尔班·维克托和玛丽娜·勒庞那样把自己包装为“强大领袖”的政客也不给人民提供选择了。他们声称自己就是另一种人格化的“选择”。

哈夫纳：您用猎场看守人、园丁和猎人的隐喻来描述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发展。前现代对世界的态度是猎场看守人的态度，现代则是园丁的态度。如今，在后现代，猎人的态度成为主流。这种乌托邦式思维方式和先前的现代态度有什么不同？

鲍曼：人们考虑的不再是保持和维护。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想要创造美丽的花园。今天，人们只关心装满自己的狩猎包，不在乎猎场的剩余供应。社会历史学家把这个转变称为“个体化”，政客将它包装为“去管制”。和以前的乌托邦不一样，猎人的乌托邦不会给生活注入任何真实的或虚假的意义。它只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把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赶出人们的脑袋。

我们没有能为我们指引方向的“北极星”。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

哈夫纳：这种乌托邦的基础是什么？毕竟，它理应为我们提供希望。

鲍曼：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两种相互补充的乌托邦：一是关于自由市场的奇妙复原力的乌托邦，二是关于技术修正的无限能力的乌托邦。它们都支持无政府主义。它们设想了一个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并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统治者的世界。它们反对一切计划，反对一切延迟满足，反对为未来利益做出牺牲。此处想象的这个世界的自发性使一切关于未来的考虑都变得无意义——唯一值得考虑的，是（怎样）摆脱一切关于未来的考虑，并因此得以在什么也不必考虑的情况下行动。

哈夫纳：即便我们对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没法有积极的想法，我们不是至少还能从历史中学习吗？就像西塞罗说的那样，历史是“生活的老师”。

鲍曼：普遍而言的未来和具体而言的进步越来越让我们沮丧。“Historia magistra vitae est”——历史是生活的老师——的想法也已经沦为这种日渐加重的沮丧的受害者了。大多数人已经发现自己的希望落空了。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甚至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也已经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了——承诺未能兑现，计划半途而废，希望以破灭告终。在我小时候，在我还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人们相信，未来会持续变好。每一年都会变得比上一年更好，我们会从历史中学到避免过去的错误。我们会发展出更好的技术、更好的手段和方式来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相信，未来会一路向上，而非向下。

哈夫纳：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情况恰恰相反：历史从黄金时代开始，然后一路向下——相继堕落为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直到迎来他们时代的灾难，即黑铁时代，一种衰落和腐朽的状态。

鲍曼：随着现代性的开启，人们开始相信，事情会变好，会进入新的黄金时代。他们梦想一个完美的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万能人”（uomo universale，或译为通才）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说，完美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其中，任何进一步的变革都只可能是一种退化。人们认为，从错误中汲取这么多教训，变得如此聪明，发展出如此精致的技术之后，我们终将创造出那种理想状况。完美意味着不可能进一步改进，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人们相信，在创造出那个完美社会后，人们终将能够放松下来，收获前几代人努力的成果。今天，没有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这么想了。但也许，我们应该少关注一些我们过去的错误，多关注一些旧日被忽视、被抛弃或干脆被忘记的理念。这些理念可能包含某种比我们今天拥有的更好的东西的种子。

哈夫纳：我们是否至少能对我们目前的困境有所了解？

鲍曼：我不相信有人能提出一种自洽的理论来解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我的新书也不是要准确地描述当下；它不试图捕捉当前的潮流或指出可能的结果。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它的书名是《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一个由时髦的词“复古”（retro）和“乌托邦”（utopia）这个词组成的合成词。乌托邦总是位于未来，但未来不再迷人。它充满了风险、危险和挑战。它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或当下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已经对进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进步不再令人振奋，反而会引发焦虑。它也让我焦虑。我可能会跟不上变化。我很可能会变得多余，我的专业也一样。那么多的行业和专业都已经自动化了。现在，汽车工厂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你听过那个关于未来工厂的笑话吗？

哈夫纳：没有。

鲍曼：在未来的工厂中，将只剩两种活物：人和狗。人的工作是喂狗，狗的工作是确保人什么也不碰。这个笑话捕捉到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工作一直在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是人类竞争者，而是计算机和机器人。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智识劳动也将自动化的。



哈夫纳：您说乌托邦位于未来。那么，您书名中的“怀旧”指的是什么？

鲍曼：今天，很多人认为稳定和安全的天堂在过去。那是他们渴望的家园。现在，人们在书写过去的乌托邦。但公众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分界线已被抹除。未来和过去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上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别。很久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未来是未知和自由的领域，而过去则是稳定和不自由的领域。

哈夫纳：虽然我们很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但总是还有充足的揣测空间。和关于未来的想法一样，关于过去的想法也或多或少是虚构出来的。

鲍曼：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过可以怎样在政治上利用这个事实。在他描述的极权主义国家，“真理部”为控制其臣民的思想而操纵过去。今天，这种操作被称为“历史的政治”或“记忆的政治”，在许多欧洲国家，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我怀疑，在政客那里流行的这个趋势——“历史的政治”——背后，是当下的不安全和未来的不确定。过去是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把碰巧符合你目的的东西挑出来，把其他的抛到一边。结果，同一段历史也就有了几十个版本。人们选择性地利用历史记忆来促进特定的党派利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这正好与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说法相反。兰克曾说，历史学家应该“直书”，把一切“按实际发生的那样”写下来。

哈夫纳：那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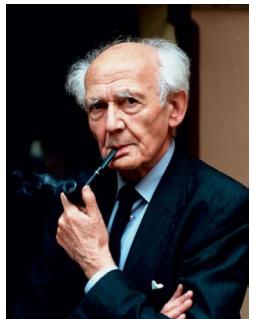
鲍曼：显然，如实写史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叙事都是选择性的，只能如此。你还记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吗？富内斯从马上摔下来，结果遭受了一场非常奇怪的折磨。他不能概括，不能做普遍陈述。

哈夫纳：但他记得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

鲍曼：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奔跑的狗和坐着的狗同属一个概念。结果，他没法讲故事，因为对他来说，讲故事要花费和事件本身一样长的时间。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在思考未来时，我们只能想象混乱，因为未来包含太多恐怖的可能性，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当我们回头看——因此也就有了我所说的“复古”——时，同样如此。有大量的东西可供我们任意取用。任何人，无论出于什么意图，只要沉浸于过去，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在《怀旧的乌托邦》中，我试图按某种顺序来整理这些想法。可那一点儿也不容易。关于这点，若泽·萨拉马戈写得很漂亮。他是我最欣赏的小说家之一，我认为，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的小说可以当哲学陈述来读。在一则日记中，他描述了一种我也有过的感觉。他写道，回头看——他当时八十六岁——他感到悲伤，因为他未能与其他人分享自己少数的明智的想法。他提出了那些想法，但没人采纳。它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对自己提出一个激进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思考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就像我们会出汗一样，我们也会思考。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忍不住要思考。这也是我思考的理由。我忍不住。它是一种长期的——毕生的——训练：的确，是一种练习。

哈夫纳：您最关注的想法是？

鲍曼：怎样把文字付诸行动——这是我无法摆脱的问题。怎样面对日趋严重的不平等——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齐格蒙特·鲍曼

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与思想家。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一生著有 57 本图书，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代表性的中译本有《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社会学之思》《立法与阐释者》《流动的现代性》《现代性与矛盾性》《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等。



彼得·哈夫纳

记者、作家。长年在美国、波兰和德国工作。他在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学位。之后，成为一名自由记者，为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媒体工作。1994 年获埃贡·欧文·基施奖、苏黎世新闻奖。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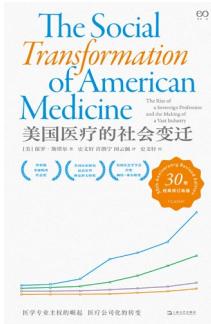
题图为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 第一季》(2005) 剧照

# 非虚构 医疗， 一个关于权力的世界

那么，  
它的权威来自于何处？

医学史是一部进步的史诗，但也是一个关于社会和经济冲突的故事，这些冲突围绕着新的权力和权威等级、新的市场，以及信仰和经验的新条件而出现。在《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与公共事务教授保罗·斯塔尔不仅追溯了美国医疗保健现行制度和政策的起源，还追问了那些在发展中或自行消亡，或遭到废除，或受到阻碍的制度和政策的命运。对于关切不同的读者，他兼具结构性与历史性的分析都有助于阐明美国当前医疗体系的困境，甚至是普遍的医疗困境。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引言《专业主权的社会起源》分享给读者。



理性之梦没有 把权力考慮在内。

在理性之梦中，理性以艺术和科学的形态把人类从匮乏和反复无常的自然、愚昧迷信、暴政，以及身体和精神的疾病中解放出来。但理性并不是一种不可阻挡地推

动人类走向位于历史终点的更大自由的抽象力量。理性的形式和用途是由男男女女更狭窄的目的所决定的，甚至连什么能被算作知识也是由人们的兴趣和理想决定的。虽然理性的善行已经让无数人免于饥饿和苦难，但它们也建立了一个新的权力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些人在知识和权力方面凌驾于另一些人，他们控制了为管理合理化的人类劳动及筹资而出现的庞大机构。

现代医疗是理性的非凡成就之一：一个具有专业知识、专业化程序和行为规则的复杂体系。这些绝不都是纯粹理性的，我们对疾病的观念和应对毫无疑问地显示了我们的文化的印记，特别是个人主义和积极治疗的心态。然而，不管它存在何种偏差——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偏差——现代科学已经成功地把人类从疾病的很大一部分重负下解放出来了。在发烧或者手臂骨折的时候，很少有文化相对主义者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去选择传统治疗师，而非现代医生。虽然人们仍在争辩不休，但是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经承认，在医学上，理性之梦已部分成真。

但是，毫无疑问，医疗也是一个关于权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可能获得理性的回报。医学已经从一个相对弱小、经济意义不大的传统行业，变成一个涵盖医院、诊所、医疗计划、保险公司和无数其他雇佣大量劳动力的组织的庞大系统，而推动这一转变的不仅仅是科学进步和人类需求。医学史被撰写为一部进步的史诗，但它也是一个关于社会和经济冲突的故事，这些冲突围绕着新的权力和权威等级、新市场，以及信仰和经验的新条件而出现。在美国，没有一个群体能像医学专业这样，在这个理性和权力的新世界中占据如此主导性的地位。本书的上部叙述了医学专业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崛起为主权专业的故事，而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科层制和公司制度则是下部的内容。

权力，在最基本的个人层面上，源于依赖，而专业人士的权力从根本上源于人们对其知识和能力的依赖。某些情况下，这种依赖可能完全是主观的，但这并不重要：心理依赖从其结果上来看，与其他依赖同样真实。事实上，今天我们对专业（the professions）的依赖如此独特，是因为它们的解释常常左右着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经验的理解。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权力似乎是合法的：当专业人士声称对现实的本质——无论这现实是原子结构、自我还是宇宙——拥有权威时，我们通常会遵从他们的判断。

医学专业对权威的主张尤其有说服力。不同于律师和神职人员，他们与现代科学联系紧密，而至少在 19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科学知识在信仰等次中都占据了特权地位。即使在各门科学间，医学也有着特别的地位。医学从业者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且密切地与人接触；他们在人类生存的所有关键过渡时刻都在场。他们充当科学与私人经验之间的中介者，用科学知识的抽象语言阐释个体的苦痛。对许多人而言，医学从业者是他们与某个世界的仅有联系，没有了这种联系，那个世界对他们来说便是遥不可及的。医生提供一种个体化的客观现实，提供一种私人的关系，还提供权威的建议。光是生病这种境况就能促使人们接受他们的判断。患者通常感到疼痛，惧怕死亡，所以特别渴望慰藉，容易听信。医学专业的作用被界定为疗愈，这也使它易于被人接受：它的力量被公开宣称仅用于促进健康——对客户与社会而言，这种价值的重要性通常明确无疑。基于此，医生在属于——以及有时不属于——他们管辖范围的事情上，对患者、医疗保健领域的其他同行，甚至整个公众都行使权威。

在临床关系中，这种权威往往对治疗过程至关重要。病人通常不能很好地判断自己的需要，那些在情感上和他们亲近的人也不能。除了专业知识，专业人士还在对情况的判断上具有优势。此外，有效的治疗措施往往不仅需要完成困难甚至是令人反感的任务，如破坏身体的完整性，而且还需要重新引导一些病人无意识产生的、想要继续生病并被照顾的冲动。他们的家人往往无法处理这样的冲动，甚至可能要为这些冲动负责，因此需要第三方来调解恢复。而专业人士是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因为他们可以拒绝放纵病人的这种倾向，而不会损害他们与病人的关系。因此，专业权威除了补偿病人经常受损且不足的判断力，还能促使病人在康复方面进行合作。

然而，医学专业的主导地位远远超出了这一合理基础。它的权威超越了其临床界限，进入为道德和政治行为的领域，而就这些领域而言，医学判断只是部分与之相关，而且常常对此并未做好准备。此外，医学专业还能够将其权威转化为社会特权、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在医疗报酬的分配中，作为社会中收入最高的职业，医学专业得到了极不成比例的份额。直到最近，它一直在对影响其利益的医药市场和组织行使着主导性的控制权。在管理这个体系的政治活动、政策和计划上，医学专业的利益也往往占据上风。在所有这些层面上，从个体关系到国家层面，专业主权的利益

模式都是明确无疑的。

医学专业是如何逐渐掌握文化权威、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它如何与其他强大的社会力量一起，塑造了医疗保健的制度结构；以及这个体系是如何演变为今天医学专业的自主权和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地步的——这些都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在美国，没有一个群体能像医学专业这样，在这个理性和权力的新世界中占据如此主导性的地位。

有些人可能认为，专业主权的来源过于明显而不值得深究。治疗者不总是被尊重和强有力吗？科学的发展不就必然使医学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地位吗？难道不正是美国的文化，尤其是我们对健康和幸福的关注，让我们特别倾向于给予医生很高的地位吗？

对以上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从第一个医生有幸在病人自然康复之前背诵了一段咒语以来，医生就一直享受荣誉和舒适的位置，这是完全不对的。历史上有无数相反的例子。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医生主要是奴隶、被释奴隶和外国人，行医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低级的职业。在18世纪的英国，虽然内科医师的地位高于地位较低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但也只处于士绅阶层的边缘，努力争取着富人的赞助，希望获得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地产和爵位。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法国，医生大多身无分文，哪怕是其中的成功者也意识到医学不足以让人获得优越地位，他们追求的是综合修养，而不仅仅是专业成就。

今天，并不是所有拥有先进医疗机构的社会都有强大的医学专业。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在苏联，医生的平均收入不到平均工业工资的四分之三。并非巧合的是，70%的医生都是女性。即使在与美国十分相似的西方社会，英国大多数普通医疗从业者的收入也只能算还好，而且他们是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工作，其预算和总体政策工作都不受他们控制。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医学专业中会有一支强大的高层顾问队伍，但如此尖锐的内部差异也让他们的医学专业不同于我们。在抵制全民保险和维持一个主要是私人的和自愿的资金体系方面，几乎没有哪个地方的医生能像美国医生那样成功。科学进步虽然对专业地位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并不能保证医生拥有像在美国这样广泛的文化权威、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力。

人们也无法从美国文化的任何根深蒂固的特性中找到对医学专业主权的解释。美国医生也并不总是一个像今天这样强大且有权威的职业。一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影响力、声望和收入都要低得多。1869年，一份专业杂志尖刻地评论道：“在所有的美国大学里，医学从来都是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期望进入的行业中最受鄙视的一种。”尽管医生群体中的少数佼佼者收入颇丰，但在1900年之前，大多数人还是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诚然，从托克维尔（Tocqueville）开始，许多观察者已经注意到美国人十分关心个人的幸福。自19世纪30年代，也就是托克维尔访问美国以来，美国一直有一波又一波通过饮食、锻炼、保持道德纯洁、积极思考和宗教信仰等方式改善健康的一系列民众运动。今天，如果托克维尔再次来到美国，看到美国人在公园里慢跑，在健康食品商店里购物，谈论心理呓语，阅读无穷无尽的关于保持身材、正确饮食和维护健康的指南时，他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事实上，美国人对健康的痴迷现在更加明显了。

但是，关心健康并不总能让人信任医生。相反，许多最倾向于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人对医生持怀疑态度。民众健康潮流的倡导者们（哪怕他们本人也是医生）经常发现自身与医学专业处在战争状态。对于地位稳固的教会来说，强烈的宗教情感并不总是有益，类似地，治疗上的大觉醒只会导致更多的医学宗派，而不是让人更为遵从医疗专业权威。

这些对医生崇高地位和权力的解释看似合理，然而错误，它们有着同样的总体问题。它们无法解释医学专业地位在其他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这些解释认为，大众的态度——无论面对治疗、科学还是健康——都会直接转化为地位和权力。在本书的分析中，我们先提出几个相反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美国医学的专业主权问题是历史性的；照顾病人的功能和社会结构没有必然而不变的关系。社会结构是历史进程的产物。要理解一种既定的结构安排，比如专业主权，我们必须辨认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追逐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从而使

这种结构得以存在的行为方式。在19世纪，医学专业普遍薄弱、分裂，地位和收入都没有保障，也不能控制执照授予条件或提高医学教育的标准。而在20世纪，医生不仅变成一个强大、有声望且富有的职业，他们还成功地塑造了美国医疗的基本组织和资金结构。最近，随着权力从医学会转移到医学院和医院、金融和监管机构、医疗保险公司、预付费医疗计划、医疗保健连锁企业、企业集团、控股公司和其他法人团体，这个体系开始脱离医生的控制。要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需要进行既是结构性，也是历史性的分析：结构性地找出能解释所观察到的事件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基本模式；历史性地追溯这些模式以及导致这些事件的人类行为。我不想否认不做结构分析的叙事史的价值，也不想否定没有历史的结构分析的价值（虽然前者肯定更引人入胜），但在我看来，将此二者结合起来远比以其中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叙述更加透彻和深入。

第二个前提是，我们不能仅就医学、医患关系，甚至是医疗卫生部门内部的各种力量，来理解医疗保健的组织架构。与其他机构制度一样，医疗保健机构的发展发生在更大的权力和社会结构领域中。这些外部力量在卫生和医疗保健的政治和经济冲突中特别明显。在20世纪，疾病和医疗成本已经成为政府和政党关注的关键问题，因为它们对社会福利、总体经济效率和政治冲突都会产生影响。在美国，私人基金会在资助医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雇主、工会和保险公司是作为中介机构集中为医疗服务提供资金的中心。在这些外部主体中，有一些主要关注狭义的利润。但是，政府、政党、基金会、雇主、工会和志愿机构往往希望通过提供医疗保健或支付相关费用而得到一些不同的好处：善意、感激、忠诚、团结和依赖。因为有望得到这些好处，医疗保健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舞台，不断上演着政治和经济冲突。

医生不仅变成一个强大、有声望且富有的职业，他们还成功地塑造了美国医疗的基本组织和资金结构

我的第三个前提是，理解专业主权问题需要一种既能包含文化又能包含制度的方法。因此，本书在观念与组织之间来回穿梭，试图了解医学专业的文化权威的增长，以及这种权威是如何转变为对市场、组织和政府政策的控制的。但这并不是认为文化分析或政治经济学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既然医疗保健领域还有那么多其他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运作，如果不考虑其文化权威，就不可能理解医学专业权力的起源；同样，如果不考虑物质生活和社会组织的潜在变化，我们也不可能理解医学专业文化权威的兴起。

## 01

### 权威的根源

#### 依赖与合法性

如果，像我论证的那样，医学专业的崛起取决于其权威的增长，那么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理解权威是什么。

权威，在其经典意义上，意味着拥有某种地位、素质或宣称，能让人信任或服从。作为这种让人信任或服从的能力的一部分，权威还包含着使用强力或说服的可能性，尽管悖谬的是，在这两者任一被公开使用时，权威就结束了。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使用强力意味着权威的失败；而诉诸说服同样如此，她指出：“说服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并且通过论证过程发挥作用。在使用论证时，权威就被搁置了。”权威要求人们自愿服从，但保留强制执行的权力。政治权威的背后最终是暴力或监禁的威胁；而管理权威的背后是解雇的威胁。这些保留权力使服从者在生命、自由和生计上依赖权威，它们为顺从提供了一个很强的基础，而不用管服从者到底对权威的服从要求是怎么想的。

因此，权威包含了有效控制的两种来源：合法性和依赖。前者取决于下属接受他们应当服从的声称，而后者建立在下属会对不服从的恶劣后果有所估计的基础上。

权威关系不是固定不变且一帆风顺的。这种关系也经常经历麻烦时期，比如孩子和父母吵架，学生和老师意见相左，工人抗议雇主的政策。在这样的时期，权威的合法性可能会被质疑，但是服从者的持续依赖可以继续维持权威。相反的情况下，

当权威者和权威机构出于某种原因变得软弱无力，无法执行后备威胁时，合法性则可以确保其控制的连续性。因此，依赖和合法性的双重支持给权威关系带来了稳定性：当其中一个较弱时，另一个就可以接管。因此，作为一种控制模式，权威比单独的强力或说服都更强大，也更可靠。

同一个权威也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从不同的人群那里得到顺从。例如，在一家公司中，所有者和董事的权威在公司高层得到遵从的原因是经理们认同所有权，并且对企业承担有义务；通常情况下，工人也会遵从权威。然而，在一些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党的国家，工人可能不大承认公司的合法性，但在工作上却非常依赖公司。他们遵从管理权威的可能性仍然很大。类似地，社会的上层阶级可能会支持执政的政治权威，因为他们认为其代表的是最高级的价值观；而下层的种姓或阶级、种族或宗教团体遵从权威的基础可能只是法律方面或纯粹的依赖。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知道反抗权威会迅速招致报复。合法性和依赖性的双重支持再一次增加了权威作为一种控制模式的整体效力。

接受权威意味着“放弃个人判断”。然而，即便是在放弃个人判断时，人们仍可能相信，权威的话语可以被详细阐述得令人信服。因为权威通常既有权力，也有理性作为其后备。但是，权威的优势在于，对于已经相信的臣民来说，它省却了详细阐述理由的麻烦，正如它也不用对勉强服从者使用武力。这就是权威的基本经济价值。从独立寻求专业建议的客户的角度来看，权威可能是“一条通往本应由理性指引的目的地的捷径”，而对于利用权威去控制非自愿合作的专业人士来说，权威可能是一条通往本应由胁迫指引的目的地的捷径。

如果可以泛泛地说，权威有说服和强力作为后备，那么当专业权威与科层机构脱离时，主要以说服为后备。因为，当独立专业人士的权威失败时，他们几乎总是诉诸论证而非胁迫。面对具有选择自主权的客户而言，专业人士无法动用在强制性上完全可与统治者和雇主可能采取的暴力威胁、监禁和解雇相较的保留权力。人们对专业人士的依赖的主要基础是他们卓越的能力，但如果专业人士试图威胁使用自己的技能来伤害客户以让他人顺从，这是对职业伦理的严重违反。专业人士可以威胁要退出一个案子，有时，比如在审判或治疗过程中，客户会认为这么做的后果非常可怕。这种威胁也许很少见，但它们表明了权力的另一种非理性基础，即心理依赖的重要性。

虽然独立的专业人士可能不具有统治者和雇主所拥有的正式强制权力，但他们往往能从其客户的依赖情绪中获得权力。即使自主的客户可以选择另一位专业人士，他们也可能无法承受长期关系中断带来的结果。在人类漫长而焦虑的时间中，深刻的情感危机使人们往往需要向专业人士求助，相比其他权威和其服从者的关系而言，这种情感危机更有可能创造情感上的依赖。这种情感依赖可能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因为依赖关系的特征往往就是矛盾的心理。但是，依赖的形成，虽然偶尔会引发憎恨，却有助于加强专业权威；专业权威的来源不仅仅包括自身宣称的卓越能力。



电视剧《良医 第一季》(2017) 剧照

此外，在专业人士和非自愿客户之间的所有接触中，依赖在加强权威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国家中，在人们与渴求的利益和畏惧的惩罚之间，经常有专业人士充当中介。社工、教师和医生证明人们是否有资格领取福利金、获得毕业证或免于兵役。作为各种机构准入和准出的守门人，专业人士拥有确保人们顺从的手段，而这种顺从完全不需要人们对权威的道德基础有任何信念。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信任的基础可能会被一种无声的相互怀疑所侵蚀：客户可能会怀疑自己的福利是否真的被放在第一位，而专业人士会觉得自己被客户欺骗了，因为客户也有理由对他们并不完全诚实。国家和其他机构越需要专业人士在行政管理上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就越可能同时扩张和削弱专业权威。在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客户与专业人士的

接触中，其中的依赖、权力和信任程度差别很大。更富有、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经常在自愿而非强制的环境里与专业人士会面，他们也更愿意在私人环境中支付费用，而不是在由国家付费的公共机构中接受服务。他们也更有可能和他们咨询的专业人士有同样的文化框架。他们有共同的假设，会坦诚地与专业人士对话，并且认为专业人士声称拥有的能力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穷人和工人阶级与专业人士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因为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交流上碰到各种障碍。他们并不分享共同的假设，在沟通中也更戒备，更感到疏远而有敌意。他们和专业人士的接触很多都是非自愿的，或者发生在公共机构中，而且他们对这种接触没有控制权——而私人支付手段是可以提供某种控制权的。在学校、医院、办公室和代理机构这样的场景中，来自下层和工人阶级的人就算服从，也更多是出于依赖，而不是因为信任。他们可能单纯是因为没有多少其他选择。

穷人与医生的接触可能不像他们与社工、教师、律师和法官的接触那样复杂和一言难尽。但是，他们在与医生的接触中仍然有许多被疏远和疏离的经历，例如与专业机构中的精神治疗师的接触。由于医生的财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相比于其他专业人士，穷人与医生的接触中遇到的文化差异、沟通困难程度、无能为力感和依赖感可能更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鸿沟实际上可能会加强医生的权威，因为治疗能力被认为是一门高深奥妙的技艺。但是科学的医疗并不想以此作为人们服从的理由。

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还有一个可以为其权威增加力量的独特的合法性基础。他们并不是作为个体声称拥有权威的，而是作为一个已经得到客观验证的团体的成员。专业人士提供判断和建议，也不是以闭门授受的或个人偏好的标准为基础的个人行为，而是作为有着共同标准的团体一员提供的。在现代专业中，这些共同标准的基础被认为是理性探究和经验证据。专业权威还假定拥有特定、重要的价值取向——就医学而言，其价值取向是健康。如果从业者违反了这些价值观，或没有达到专业团体所要求的标准，其权威的行使就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在极端情况下，还会被认为是渎职。

专业权威在另一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专业人士不仅提供行动建议，还会评估现实和经验的性质，包括咨询者的“需求”。就像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中的君主一样，他们的权威还延伸到事物的意义上。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权威管制着什么。

## 文化权威与职业控制

大多数关于权威的概念都强调对行为的管制。例如，在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的经典定义中，Herrschaft (德语，有时译为“权威”或“支配”) 指的是人们服从社会主流规则认可的合法命令的可能性。但是英语中理解的权威 (authority) 包含的不仅仅是命令的下达。科学论文、神圣经文，甚至是一本语法书都体现了权威。教会等机构会对世界的性质做出权威判断。在现代社会，随着不同的专业团体对现实的不同方面拥有主权，这些判断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因此，权威也意味着某种对现实的定义与关于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可能比其他定义和判断更为真实有效。我将这种形式的权威称为文化权威，以将其与韦伯所说的社会权威区分开来。这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即意义和观念的领域）同社会（即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的领域）之间的区别是一致的（尽管这种区别总是带来困扰）。

社会权威和文化权威在几个基本方面都有所不同。社会权威包括通过下达命令来控制行动，而文化权威则需要通过对事实和价值的定义来构建现实。社会权威只属于社会角色，而文化权威也可能存在于文化事物中，这些事物包括往昔智力活动的产物，如宗教文本（圣经）、公认的参考标准（词典、地图、数学资料）、学术或科学著作，还有法律。这种特殊形式的权威可以不经行使而起效；一般来说，人们（甚至是处在权威地位的人）经常在为了解决模棱两可的问题时请教它。

虽然它们经常相结合，但社会权威并不一定包含文化权威。人们可能会服从政府，但在私下里认为政府所宣称的东西不真实或不公正。文化权威也不一定总是意味着对行为的权威。神职人员或科学家可能在道德或自然方面拥有权威，但也可能会受到习俗的限制，无法做出具体的选择和行动，更谈不上管制了。

在医疗系统等次中，医生对护士、技术人员和其他下级的权威主要是社会权威；医生试图管制其行为。医生给病人提供指示或建议时，他们也是在行使社会权威。但在提出任何建议之前，医生必须确定并评估病人的病情。患者就诊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医生的建议，他们首先想要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生病了，以及他们的症状意味

着什么。“医生，我得了什么病？”他们问，“这严重吗？”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文化权威就成了行动的先决条件。解释症状和体征、诊断生理或病理状态、对疾病进行命名并告知预后情况的文化权威是医生行使社会权威的基础。通过塑造病人对自身经历的理解，医生创造了使自己的建议看起来合适的条件。

他们并不是作为个体声称拥有权威的，而是作为一个能力已经得到客观验证的团体的成员。

当然，并不是所有接受医生的判断为权威的病人最后都会接受他们的建议。医生可能会告诫病人，如果他们不戒烟减肥则命不久矣。病人很可能认为这是对事实的权威判断，但拒绝听从建议。这时，医生的文化权威就超过了其社会权威，而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就接诊自愿就诊的病人而言，医生通常缺乏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执行他们关于现实的定义或实施他们的指示。法官做出裁决，而医生通常只能提出建议。但是，医生的权威非常类似于德国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对权威的一般定义：“权威高于建议而低于命令，是不容轻易忽视的提议。”一个人不能安心地忽视医生的建议，通常不是因为医生会威胁采取强力，而是因为如果拒绝建议，医生预测的后果会发生。一旦人们接受了医生的文化权威，他们就会认真看待那些预测。

然而，还有一系列医生执行的职能，在其中病人或多或少是被迫接受医生的文化权威。为了评估认证，病人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专业检查。作为文化权威，医生对导致身体不适或精神错乱的原因做出权威判断、

评估人们是否适合工作、评估伤者的残疾程度，还有宣布死亡，甚至在人们死后评估他们写遗嘱时是否具有主动遗嘱能力。这些专业判断对法院、雇主和其他社会权威都会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应该只提供事实，而其他人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处理。在现代社会，这种文化权威与社会权威的分离是相当普遍的，人们常常鼓励把这作为一种保护潜在对立各方共同利益的手段，以公正和客观地评估“事实”。因此，社会中其他机构对合法化的寻求往往促进了人们对医学文化权威的依赖。在这一点上，医学权威既是医学专业及其客户的一种资源，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资源。

因此，专业宣称拥有的那种权威不仅涉及提供服务的技能，还涉及判断客户经验和需求的能力。专业权威部分地可以由一种特殊的依赖条件来定义一对专业人员卓越能力的依赖。依赖有时也来自客户的情感需求和专业的行政职能，尤其是福利国家创造的那种行政职能。而且，正如我已指出的，专业权威的合法化涉及三个单独的要求：第一，专业人士的知识和能力已经被其同行群体所验证；第二，这种公认有效的知识和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的；第三，专业人士的判断和建议是以如健康等一系列重要价值为导向的。在定义专业时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属性——集体性的、认知性的、道德的——正好与合法性的这些方面相对应。社会学家认为，专业（profession）是这样一种职业（occupation），它通过系统性的、必要的训练和集体性的纪律来自我管理；它以技术化的、专门化的知识为基础；它是一种服务，而不是利润导向的活动，这一点会体现在其伦理准则中。

当然，不能简单地从表面来看待专业的主张。专业地位带来的好处鼓励着潜在的，甚至是地位牢固的职业去发明或完善各种证书、学问和伦理准则，以获得认可。这些特征不应看作专业地位的标志，而应被视为让专业权威合法化、让从业者团结一致，以及从国家那里获得垄断许可的手段。在这方面，职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取决于其集体组织方式以及公众和政府的接受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专业主义是一种职业控制的形式，而不是某种工作的固有性质。但是，专业主义也带来某种团结，是工作的一种意义来源，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规范人们信念的系统。

本书在历史方面的任务，部分在于解释这一复合体在医学领域是如何发展的一各种形式的依赖和对合法性的宣称是如何建立的，它们是如何采取制度化形式的，医学权威的边界是如何扩大的，以及权威又是如何转化为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

医学权威的兴起与现代文化中信念基础的普遍变化以及福利国家的发展都密切相关，因此，认为医学权威是医生们凭空创造出来的看法是有误导性的。最近许多关于医学专业的著作都将其描述为一个卡特尔，有一段时间它确实如此，但这只是医学专业成功因素的次要部分。此外，问题在于解释医学专业的权力最开始来自何处，用权力的结果来解释原因是无济于事的。

毫无疑问，对美国医疗结构最具影响力的选择主要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并特

别将医学权威的兴起归因于医生治疗能力的提高。科学的作用在任何描述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未必能保证医生总是掌握控制权。也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科学的发展可能会使医生更为依赖组织，导致专业自主权降低。现代医学实践需要医院和医疗技术，因此，不同于许多其他专业，医学专业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因为需要相当大规模的投资，所以医学专业其实很容易受到资本提供方的控制。在解释其他个体工匠丧失独立性时，技术需求经常会被引为原因之一。一些人试图论证技术远非必然导致对组织控制的服从，在这一点上，医学领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一种观点由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这种观点认为，医疗结构最好解释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镜子。在这种解释中，医生之所以能成功实现其专业抱负，是因为资本家认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要求，所以促成了这种转变。这种解释遇到的困难在于，资本主义能兼容许多不同的医疗保健制度，

我们完全不清楚美国医疗的发展是否符合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利益。虽然最初由资本家建立的基金会一再努力试图将医疗保健合理化，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因此，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需要进一步探究医学专业能够成功地长期维持其主权地位的原因。

## 02

### 变迁的步伐

#### 医学权威的增长

专业的兴起既是为文化权威而斗争，也是为社会流动性而斗争的产物。我们不仅需要从医学专业的知识和抱负的角度来理解它，还需要从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变化的背景来理解它，这些变化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愿意承认对医学专业的依赖，并将这种依赖制度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专业权威的接受是美国的“文化革命”，就像其他革命一样，它让新群体拥有权力，在医学这里，既有对工作和制度掌握的权力，也包括解释经验的权力。

在一个国教宣称对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拥有最终发言权的社会里，医学的文化权威显然会受到限制。但在19世纪早期，这已不再是医学面临的主要障碍。哪怕许多对疾病持有理性主义和积极主义倾向的美国人也拒绝接受医生的权威。他们相信，常识和乡土智慧可以同样有效地解决大多数健康和疾病问题。此外，医学专业自身缺乏团结，无法对持不同和不相容的观点的成员行使任何集体权威。

正如我已指出的，权威要求放弃个人判断，而19世纪的美国人不愿意对医生做出这种让步。权威意味着拥有某种让人信服的特殊地位或权利要求，而19世纪的美国医学的权利要求并不让人信服。深奥的学问、拉丁语知识，以及英国内科医师传统上拥有的高雅文化和卓越地位，在等级社会中比在民主社会里更能让人信服。现代专业主义必须重新建立在拥有技术能力的基础上，而这种能力需要通过标准化训练和评估来获得。但是，医学专业的标准化同时受到内部和外部的阻碍，内部是医学从业者的宗派主义，外部是整个社会对特权垄断的普遍抵制。

将医学转变为一个权威专业的力量既来自其内部发展，也来自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更广泛的变化。在内部，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科学的进步，医学专业在19世纪末获得了凝聚力，并且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时也更有效。随着医院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医生变得更加依赖彼此，以获得转诊病人和使用医疗设施。因此，他们更容易调整自己的观点以适应同行们的看法，而不是把自己标榜为相互竞争的医学派别的一员。更大的凝聚力增强了专业的权威。专业权威还受益于诊断技术的发展，它加强了医生对病人进行身体检查的权力，同时减少了医生对病人自己陈述症状和表象的依赖。

与此同时，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他们更依赖专业权威并更愿意接受其合法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赋予了人们不同的能力。在前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农村和小城镇社区生活方式赋予了其成员在满足自身需求方面的广泛技能和充分自信。劳动分工不甚发达，人们有着强烈的基于宗教信念和政治理想的自力更生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权威很难发展。美国人习惯于在自己家里或社区内处理大多数疾病问题，医生只是偶尔介入其中。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美国社会越发城市化，美国人日渐习惯于依赖陌生人的专业技

能。由于电话和机械化交通降低了时间和出行成本，向专业人士咨询的费用也不再那么昂贵了。在科学技术的真实进步的支持下，专业人士要求拥有恰当权威的主张也更加可信，虽然在客观上并不总是如此；科学对人的想象的影响，甚至比起其实际对疾病治疗工作的影响还要大。技术变革正在让日常生活日新月异：人们似乎完全可以相信，科学也会为治疗做出巨大贡献，而最终科学也确实做到了。此外，一旦人们开始将科学视为能够解释和控制现实的一种优越且理当复杂的方式，他们就希望得到医生对经验的解释，而不管医生是否能提供治疗方法。

当传统的确定性正在被打破的时候，专业权威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组织关于人类需求以及事件的性质和意义的不同构想。在 19 世纪，许多美国人，以民粹主义者为代表，仍然相信常识便已足够，继续抵制专业人士对权利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比如进步主义者，相信科学提供了道德和政治改革的手段，认为专业是一种新的且更先进的秩序基础。进步主义的观点一直被陈述为一种不偏不倚的理想，然而，这种观点恰巧与新兴专业阶层解决问题和推行改革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事实证明，进步主义者的文化胜利相较其政治胜利更为持久，而这与专业人士在新职业和组织等级中地位和权力的上升是分不开的。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篡位夺权，专业人士的新权威反映了新生活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这种不稳定性对传统信仰的挑战。一个人越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新的科学世界让人不断产生这种感觉——就越愿意用专业人士的眼睛来看待世界，后者声称自己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还得到了同行团体的认可。

医学权威的增长还需要被理解为制度的变化。在 19 世纪，医学专业还未巩固其地位之前，一些医生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威，他们会为很多问题发表意见，绝不限于身体疾病方面。事实上，在早期美国社会的小社区里，受过教育的人相对较少，所以一些医生可能拥有比如今大多数医生都更广泛的个人权威。另一方面，我在这里探讨的是医生身份中内在的权威，这种权威已经在一个标准化的教育和执照授予系统中制度化了。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让权威可以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并将整个专业的权威传递给所有个体成员。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医学的专业权威制度化之前，医生可能凭借品德和对病人的熟悉而获得个人的权威。而一旦医学权威完成了制度化，那么标准化的教育和执照授予程序就赋予了所有通过考核的人以权威。行外人士和业界对某位医生权威的认识变得相对不那么模棱两可。权威不再取决于个人品德和普通人对个人的看法，而是越来越多地融入制度结构中。

当传统的确定性正在被打破的时候，专业权威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组织关于人类需求以及事件的性质和意义的不同构想。

还有一些事态发展，例如医院的兴起，也让人们对专业权威的“固有”依赖增加了。我这里指的不仅仅是精神病院的发展和非自愿住院程序，尽管精神病院显然是一种重要的、激进的制度化医学权威形式。即使重病患者是自愿从家中转移到综合医院的，住院也会增加病人的依赖程度。在家里，病人可以很容易地拒绝医生的建议，而许多人也确实如此，这在医院里要困难得多。对于重病患者，从属于医生的临床人员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病人家属成为医生的代理人。他们不仅需要在医生不在的时候执行治疗，而且还要对病人进行持续监测，保存病历，并且强调必须遵守医生的指示。

还有一些制度性变化也让人们变得依赖医学权威——无论他们是接受还是敌视医生。随着医生越来越多地充当认证者和守门人，一些需要认证才能获得某些好处的人们对医生的依赖也增加了。法律禁止大众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获得特定种类的药物，这也增加了人们对医生的依赖。埃利奥特·弗雷德森 (Eliot Freidson) 写道：“一门专业控制的附属设备越是重要，对设备的批准就越是能加强专业权威。”在 20 世纪，医疗保险已成为保证人们依赖专业的一种重要机制。当保险只能赔付由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时，受益人就会因保险金而对医生产生依赖。医生对药物和外科手术的批准已经成为一系列保险和税收优惠的必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专业权威都已经成为制度上必不可少的部分，遵守与否已不再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人们对医生的判断的看法依然重要，但是已经远不如从前那么重要了。

在合法化机制（标准化的教育和执照授予）以及依赖性机制（住院、把关、保险）的共同作用下，医患关系有了一个超越个人性格和态度的明确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并不纯然建立在人们对医生和病人角色的共同期望上，而是建立在一些制度化安排上，如果有人不遵守这种安排，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专业权威的制度强化也约束了医生彼此之间的关系。在 19 世纪，医生的权威在于其威严的人格和他与病人的关系，这和 20 世纪的医生完全不同，后者的权威在于持有必要的资格证书和附属于某个机构。在普通人越来越依赖专业人士的同时，专业人士之间也越来越相互依赖。这两种变化都促进了医学专业的集体力量的增长，并帮助医生把他们的临床权威转变为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权。

## 从权威到经济权力

想要将权威转变为高收入、自主权和其他特权回报，医学专业需要既控制其服务市场，又控制管理医疗实践、资金筹措和政策的各种组织架构。经济权力的获得不仅仅是通过在医疗实践中建立垄断——通过将替代性医疗从业者排除在外和限制医生的供给——达成的。它还需要塑造由医院、保险和其他影响医疗实践的私人机构构成的体系，需要限定公共卫生活动和其他公共卫生投资的范围和适当形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作为专业经济权的基础，这些组织安排和政治安排已经比医疗实践的垄断更为重要。

一开始，医疗服务市场的出现与专业权威的出现是分不开的。在早期美国社会的孤立社区里，照顾病人通常是亲属关系和互助义务的一部分。但随着大城镇的发展，治疗的功能越来越多地从家庭和社区转移到付费医师、药剂师、医院和其他商业及专业来源那里，这些不同的来源还在市场上竞争性地销售服务。当然，即使在今天，家庭仍然在医疗保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已大为降低。照顾病人的主要机构从家庭转向市场的过渡——也就是说，把医疗保健转变成商品——一直是医疗系统变迁的暗流之一。它同时还涉及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病人和照料者在情感上越来越疏远，以及对健康和疾病进行管理的主导者从女性向男性转变。

医疗保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商品？医生出售的是货物（如药品）、建议、时间还是可获得性？随着市场的形成，这些问题必须要得到回答。为了获得行医时所需要的信任，医生必须向公众保证其产品的可靠性。正如玛加利萨尔法蒂拉森 (Magali Sarfatti Larson) 在论述专业时所指出的，标准化的产品需要标准化的生产商。培训和执照授予的标准化成为寻求权威和控制市场的实现手段。

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医疗保健市场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开业行医对于未经训练的从业者和医学院毕业生来说都相对容易，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而医生的经济地位往往不稳定。到 19 世纪末，尽管行医执照法已经开始限制行业进入，免费诊疗所、公司医疗计划，以及各种替代独立私人从业者的科层组织机构都让医生越来越感受到威胁。在医生看来，市场竞争不仅对收入构成威胁，还会对他们的地位和自主权构成威胁，因为市场没有在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这模糊了商业和专业之间的界线，还有将他们降格为雇员的危险。

专业主义和市场规则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且不可避免。医学等专业在历史上一直声称自己高于市场和纯粹的商业行为，因而不同于经商和贸易。为了在当地获得公众的信任，专业人士为自己设定了比市场最低规则更高的行为标准，并坚持认为，他们只能彼此评判，而不是由业外人士来评判他们是否符合这些标准。市场的理想假定消费者的选择占据主导地位，而专业的理想则要求其成员独立且权威的判断占主导地位。一个对客户做出太多让步的专业人士首先就违反了一项基本专业原则：用埃弗里特·休斯 (Everett Hughes) 的话来说，江湖医生的定义就是取悦客户而非同行。专业精神要求在工作中从客户导向转变为同行导向，这明显背离了普通的市场规则。

市场的理想假定消费者的选择占据主导地位，而专业的理想则要求其成员独立且权威的判断占主导地位。

在完全竞争时，市场不会遵循任何卖方集团的有组织判断。市场是一个以现行价格买卖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系统。在经济学家推崇的理想情况下，买卖双方的行为相互独立，价格是由供需水平客观决定的。在理想的市场中不存在依赖关系，任何单独买方都应该有自由选择卖方的权利，任何卖方都有自由选择买方的权利，任何买方和卖方都不能强制要求对方接受其条款。除了制定交换规则和执行合同所要求的，市场上也不应该存在任何其他权威关系。在家庭和国家中，资源都是根据权威者的指导进行分配的，而市场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缺乏这种权威指导。吊诡的是，在竞争

性市场中，秩序的基础正是权力的缺失。卖方作为一个集体可能希望保持商品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但只要他们作为个体行动，他们就会被迫将商品价格降至均衡水平，从而争取到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

卖家不喜欢这种可能性，只要有可用手段，他们就会很快颠覆这种局面。权力厌恶竞争，正如自然厌恶真空。专业组织是抵抗市场的一种形式。同样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工会也可以构成市场势力的基础。这些情况是并行发展的。正如资产、体力劳动和专业能力都可以用来创造收入和其他报酬，它们也可以被垄断性公司、有力的行会或工会、或者强大而拥有准入制度的专业用来建立市场势力。而这正是 19 世纪末医学专业想要实现的目标，当时公司正在组建托拉斯，工人正在试图组织工会——所有各方都试图控制市场力量而非被其控制，并且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医生日益增加的权威具有刺激和限制市场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权威让照顾病人的职能从家庭转至医生，并把社区纳入专业服务的范围。另一方面，它也获得了政治支持，以对此前不受控制的医疗服务供应施加限制，如具限制性的执照法。通过扩大需求和控制供应，专业权威的增加可以帮助医生获得更高的工作回报。

医学专业的市场势力只是部分源于国家的保护，它还源于病人对医生与日俱增的依赖。在理想的市场中，买方对于卖方是不具有依赖性的，但患者往往依赖他们的私人医生，而且这种依赖性会随着他们之间知识差距的扩大而增加。病人无法轻易地脱离与医生的关系，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脱离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一旦他们开始接受治疗，就无法再不受限制地选择卖家了，而自由选择正是自由市场的标志性特征。

医学专业能够发展出这种市场势力的一个原因是，它主要面向个人患者，而不是向组织出售服务。这样的组织，如果数量众多的话，在评估临床表现时可能做更严格的辨别，还会游说反对对医生供给的垄断限制。当然，医学专业坚持认为，薪水制度侵犯了私人医患关系的完整性，在 20 世纪头几十年里，医生能够利用他们日益增长的市场势力来摆脱科层控制的威胁，并维护他们的自主权。

### 战略地位及捍卫自主权

如今当我们谈及卫生保健系统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一大批组织：医院和卫生中心、公共卫生和规划机构、专业协会、医疗保险和制药公司，等等。

虽然其中一些组织的前身已经存在很久了，但在 19 世纪末以前，即使在松散的意义上，它们也没有真正地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虽然存在一些组织化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的前身，但它们并不怎么重要。到 1870 年时，已经有几百家医院落成并投入使用，但直到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它们还是更多地与慈善机构有关，而不是和医学相关，且在医疗实践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同样，公共卫生问题一开始起源于人们对卫生情况和统计数据的关注，而不是医学的关注。直到 19 世纪末，随着医院和公共卫生活动的扩大并且与医疗保健的关系更加直接，一个相互联结的体系才开始形成。

科层机构的兴起给医学专业带来两种威胁。首先，雇佣医生和提供医疗服务的组织可能会直接与独立从业者竞争。其次，为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设备或资金的组织，如医院和保险公司，可能会开出不利于医生的交换条件，并减少后者在费用制定和决策方面的自主权。医生们试图完全消除第一类组织——免费医疗机构、公司或共助会医疗项目，以及后来的预付型团体执业计划——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安排不合理地违反了职业道德。而第二类组织——医院和保险公司——医生们试图对其施加影响，以符合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控制自身工作和制定自身价格方面的利益。

至少直到最近，医生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是 20 世纪为数不多能抵挡潮流的职业群体之一，这种潮流将各种个体工匠和手艺人吸纳到工业和科层组织范围内。事实上，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医生有能力逆转其他职业所经历的历史。当许多技艺娴熟的手工艺者正在失去垄断权时，医生们正在建立垄断权。就在手工业开始从属于大公司的同一时期，医学专业却在使其自主权制度化。医生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反而成了小资本家。

医学专业维持自主权的成功有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如果医生受制于保险公司、私营医院和大型医疗机构的等级控制和垄断权力，他们的收入可能会受损。他们会失去“自己当老板”所能带来的好处，即选择工作时间、客户、专科领域的自由。对

许多医生来说，对自主权的关切甚至压过了单纯的财务考虑。例如，尽管国民医疗保险可以通过覆盖一些未付账单来提高许多医生的收入，但私营医生普遍反对这一提议，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独立性最终可能会受到损害。

然而，让工业化大公司吸纳个体从业者的力量，同样完全有可能让医疗保健组织吸纳医生。通过直接雇佣工作人员，组织可以更好地控制他们的行为以及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以更密切地监控其工作人员的表现，要求工作人员更好地遵守它自己的目标。组织可以重新组织生产过程，降低高收入的熟练技术工人的重要性，支持低技能水平、低收入的劳动力。

就在手工业开始从属于大公司的同一时期，医学专业却在使其自主权制度化。

那些作为卫生系统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组织必须要决定，是否将医生纳入它们的层级中。例如，医院可以支付薪水雇佣医生来完成必要的医疗工作。保险公司也完全可以雇佣医生，来提供保险受益人可享受的服务。确实有一些健康医疗计划是这么做的，但这并不是通常采取的方法。

医院和保险公司通常允许医生保留独立从业者的身份，尽管让医生处在这些机构的组织之外无疑会增加医疗保健的成本。对医生进行监控是非常困难的，保险公司尤其面临巨大的信息问题。作为独立从业者，医生不太可能会对组织利益敏感，例如保存资源。因此，出于公司吸收独立手工艺者同样的原因，保险公司和医院都有着明确的动机来寻求对医生的控制。但医生们能够阻挡这种控制，而医院和保险公司反而发展出了一些财务制度来应对自主权带来的高成本。

在不让医生成为私营医疗计划的雇员方面，医学专业的集体政治组织至关重要。但对捍卫自主权来说，或许最重要的是权威在创造经济权方面的作用。医生的守门权威也让他们在与组织的关系中处于关键地位。实际上，医学专业的权威让他们可以自由处置病人的购买力。而从医疗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来看，拥有开具处方的权威就拥有了摧毁的力量。同样，医生决定病人何时、何处前往医院的能力也赋予了他们对医院政策的巨大影响力。医生开具处方药和其他医疗供应品的权威也使得制药公司等生产商必须争取他们的善意，资助医学专业的期刊，补贴其专业协会和政治活动的费用。

到 20 世纪中叶，医学专业在医院、医疗保险和制药行业中的战略地位成了维持医学专业经济地位的关键，取代了之前由其垄断行医所发挥的早期作用。就算现在完全废除医师执照法，医生收入受到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他们的文化权威让他们可以留住病人，保险制度的结构使他们能够维持其收费水平。

到 1920 年，以及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医学专业已经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建立了维持其独特的专业支配和自主权的组织结构。在批评者看来，医院、行医和保险缺乏一个统一组织，公共卫生与医疗保健分离，这些似乎是不合理的。但缺乏组织有时也是系统性的。医院、公共卫生和医疗实践只是部分整合在一起——不允许有力的协调权威出现，因为这将威胁到医学专业的自主权和对市场的控制。这种松散的结构为近几十年来的斗争埋下了伏笔，在这场斗争中，医学专业一直在努力捍卫自己的特权，反对合理化医疗保健组织的努力。曾经被医学专业击败或限制的组织重新出现，威胁了医学专业自主权。同样，医学专业面对的是两种相互关联的威胁——竞争和控制。预付费医疗计划，现在被称为“健康维护组织”，代表了医疗保健中一种竞争性的科层组织形式。保险公司在控制医疗费用的压力下开始寻求监管医疗决策的方法。医院和其他组织合并成更大、更强的团体组织。除了私营科层组织，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的监管权力也若隐若现。

除具有其他职能之外，专业主义还是团结的基础，可以用来抵抗威胁一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力量。在 19 世纪，专业主义是医生抵制来自其他医疗从业者的竞争的基础，19 世纪后期，它开始帮助医生和其他群体抵制公司和大社团的竞争和控制。在 20 世纪，除了这两个职能，专业主义还成为反抗政府的基础。

当然，医学专业并不反对所有的政府干预。它积极地寻求执照保护。大多数医生至少支持一部分公共卫生项目，他们也没有强烈反对给医院和医学研究的公共投资。也很少有人质疑国家权力在支持医学管控异常行为中的作用，比如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监禁。在 19 世纪，医生积极鼓吹立法惩罚各种性行为。道德行为上的医疗改革是与国家权力向私人生活的扩张齐头并进的。因此，专业人士对政府干预的反对并不严格遵循哲学上纯粹的极端自由主义。

医学专业对政府的主要担忧与对社团和科层组织的担忧是一致的。竞争和控制一直是他们担忧的问题。私营医生试图阻止政府与他们竞争，管制他们的行为，或者最糟糕的一将医疗保健服务像教育一样纳入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他们努力划定公共卫生的界限，将公共医疗服务限于为穷人提供，并阻止强制性医疗保险法案的通过，这些都是上述担忧的例证。

因此，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最初的挑战主要是建立自己的权威和对市场的控制，然后是在面临大型组织和政府威胁介入其中时保持这种地位。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将追溯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这段时间里专业权威的兴起和竞争性市场的衰落。在上部的后三章中，我将论述医院、公共卫生和私法人等机构，它们的发展——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快要结束时——可能威胁到专业自主权。本书的下部论述了 20 世纪医学专业在面对医疗保险时是如何维护自主权的，以及围绕卫生保健的政治和商业方面所进行的斗争。

现代经济在任何地方都是由大公司或国家控制的。如今，像其他人一样，大多数专业人士的收入和大部分自尊感来自他们求学和工作的组织。医生也依赖像医院这样的大型组织，但他们坚持反对组织通常所要求的控制。在所有的专业中，医学既是模范又是特例：模范在于，其他专业都在效仿它；特例在于，没有一个其他专业能够拥有它这样独特的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威。但是如果说医学是一个特例，那么它也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社会——曾经如此不信任行会和专业知识——现在如此欢迎工作和信念体系中的专业主义。



保罗·斯塔尔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与公共事务教授，传播学与公共事务讲席教授，致力于政治、公正政策与社会理论领域的诸多问题。《美国瞭望》杂志创办人之一，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资深顾问。另著有《媒体的创造：现代传媒的政治起源》，获金史密斯奖。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无名的裘德》(1996)剧照

## 非虚构 托马斯·哈代： 裘德般的“傻瓜”和“反抗者”

迈克尔·米尔盖特 | 新书试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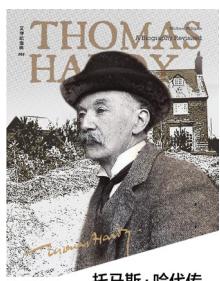
在时代转折中，  
看见作家的思想矛盾与冲突

托马斯·哈代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和二十世纪的诗人”。1982年，迈克尔·米尔盖特评述这位伟大作家的经典传记首次出版。之后，有关哈代的诸多新信息纷纷问世，其中很多已出现在米尔盖特本人编辑或与他人合编的哈代作品集里；与此同时，一些学术研究也挑战乃至颠覆了许多既定的假设。

在这部经过广泛修订、全面重审、细致扩充的新版传记中，这位世界顶尖的哈代研究学者不仅借鉴了这些新材料，而且充分发挥了他长期研究哈代生平及作品所得的深刻理解力。

哈代生活中大大小小诸多方面都在书中得以全新阐释，包括他的家族背景，他作为诗人略显笨拙的摸索自学之路，他与第一任妻子以及她与他家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他的爱欲纠葛，他与那些抱负不凡的女性作者之间隐秘的合作，他参与自己官方传记的秘密写作，以及他如何借助唤醒记忆的技巧将卓越创造力延续至耄耋之年。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有关《无名的裘德》出版后的故事，分享给读者。



1895年11月1日，《无名的裘德》单卷本由奥斯古德麦基尔文公司出版，随着最近出版和发行业务的全行业变化，维多利亚时期常见的三卷本小说版式已经消失殆尽。同一天，乔治·道格拉斯爵士到麦克斯门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第一本小说寄达时，他正好独自和哈代待在书房里：“我记得并无吉兆，天气阴沉，而哈代夫人此前在学骑自行车时遭遇到了意外，正在忍受其苦。”此外，道格拉斯相信哈代并没有“因感觉工作做得好而受到鼓舞”，并且“他几乎不期待其新作大获成功，也不期待读者的大肆诽谤，这将会是作品的一部分”。哈代对《无名的裘德》的期望值或许比道格拉斯所意识到的要高，但是他过去所遇到的负面批评，仍然让他对现在所遇到的敌意的深度、直接性和程度准备不足。即便是那些称赞《无名的裘德》是一部杰出的评论家，也很有可能对其并未减轻的阴郁表达惊愕，对其直截了当地处理争议性问题感到不安，并对其固执的目的性感到恼火。那些认为该小说是一场灾难的人，则随意用公开的谩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它惊人地背离了作者以前作品的方式和内容方面。

13日的《卫报》称其为“可耻的噩梦，人们只希望尽可能尽快彻底地将其忘掉”。刊登在12日的《蓓尔美街报》上的评论的标题为“淫秽的裘德”，作者沉湎于对哈代热情叙事的一种完全庸俗化的解读：

因此，在适当的时候，一个不幸的家庭出现了；很快，先前出生的孩子和后来出生的孩子就开始吸引人们短暂的注意力，因为他们在房间里被绳子缠着脖子吊死在了衣服挂钩上。惨剧发生后，讯问、悔恨和一种新的罪恶意识，最终导致了所有离婚者的再婚，据我们估计，两对半夫妇总共有六次婚姻和两次猥亵行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创纪录的业绩。从此以后，他们均过着不幸的生活，除了裘德，因为他吐血身亡了；而艾拉白拉则用在烛火上加热过的伞骨来把她的头发烫成卷发，后来又狡黠地望着她的老熟人江湖郎中。

伦敦的《世界报》以“堕落的哈代”为题，收回了其早先对连载版小说中的删减的抗议，并不得体地取笑了诸如杀猪这样的场景：“由于该小说最初设定的读者群是美国读者，或许所有这些关于猪肠和‘内脏’的谈论都是为了向俄亥俄州波科波莉斯的居民致意。”接着，文章以崇高的、正经的口吻，指责哈代通过苏这一人物为“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少的神经质的准女主人公”树立了一个不妥当的榜样，并指责他模仿了“左拉和托尔斯泰的创作手法——《土地》的作者左拉和颓废的社会学家托尔斯泰……哈代先生所设想的人性，主要是由贪婪利己和歇斯底里组成的”。哈代对这些攻击的痛苦反应出现在了他11月写的许多书信中。对亨尼卡夫人、热恩夫人、道格拉斯、克洛德和高斯这样的朋友，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几乎相同的话语坚持说：《无名的裘德》压根就不是一部目的小说，尤其不是一部“关于婚姻问题的宣言”的小说，杀猪场景既是一种故意的人道主义姿态，又是对艾拉白拉本质上的动物性的戏剧化体现；而且他唯一担心的是，人们不是认为该小说对道德有敌意，而是恰恰相反，认为它过于强烈地赞同基督教对仁慈的劝诫，并认为它在强调苏最终回归正统信仰时是彻头彻尾的“高教会派的”。尽管有些异议毫无疑问是夸大其词的，但它们几乎无法与一些评论家的奇怪的曲解相提并论。

11月10日，哈代致信高斯，对他两天前在《圣詹姆斯公报》上发表的评论予以感谢，这尤其揭示了他对即使是最热心的文学朋友也不可靠的困惑、痛苦和愤恨。这篇评论在许多方面都是透着智慧的和表示赞同的，但是高斯和当时及以后的许多读者一样，发现这个故事是过度凄凉的，而且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凄凉，他在开篇几句话中也暗示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很阴郁的故事，甚至是污秽的故事，哈代先生终于向他的崇拜者们展示了……这位作家的天才得到了过于广泛的认可，以至于我们无法质疑他是否有权利带我们进入他喜欢的场景；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自由地说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很显然，我们不喜欢这些场景。我们认为，即使是最穷苦的人，他们的命运也比哈代先生所情愿承认的具有更多样性的快乐，或者至少他们的痛苦得到了缓解。不管是不是那样，我们已经习惯于发现他比以前更能意识到美，但不是在《无名的裘德》中。我们细读该小说，为自己有一种存在的空虚感而感到震惊。

哈代的信承认高斯对小说的几何结构所作的一些评论的感知力，并以“衷心感谢你

的评论”结尾。但最后，由于未能控制住自己对评论第一段的语气和措辞的愤怒，他添加了一个附言，既表达了他对朋友那不冷不热的态度的不满，也表达了他自己对小说及其主人公的重大义务：

有一件事我没有答复。这个故事的“污秽”特征，显示了一个人希望过的理想生活和他命中注定要过的肮脏现实生活之间的反差。在他年轻梦想的巅峰时刻，扔掉猪阴茎的场景，就是为了强烈地引起这一反差。但正如我所感觉的那样，如果这需要解释而非不言而喻的话，那我一定是不幸地失败了。我本打算将这个想法贯穿小说的始终。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中，尽管或许它显现得没有在我那可怜的傀儡即裘德。身上那么明显。

不久之后，一本新的国际杂志《大都会》邀请高斯再为该小说撰写一篇评论，哈代试图引导他进行一次更了解情况的、更一贯表示赞同的阅读。在其忧心忡忡的出版商的催促下，他似乎也激发了乔治·道格拉斯爵士为 1896 年一月号的《书商》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无名的裘德〉的一些批评家》的文章。

《无名的裘德》压根就不是一部目的小说，尤其不是一部“关于婚姻问题的宣言”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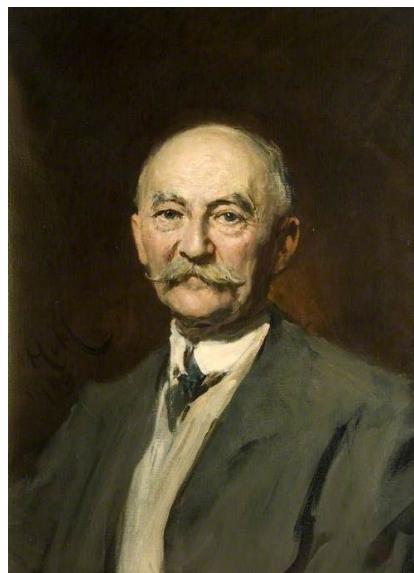
后来的评论，包括威廉·迪恩·豪威尔斯、H.G. 威尔斯和哈夫洛克·霉理士的评论，显然比早期的评论对这部小说更为有利。但哈代仍然不得不忍受珍妮特·吉尔德在纽约《世界报》上、奥列芬特太太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反婚姻联盟》一文）和 A.J. 巴特勒在《国家评论》上（《颓废的哈代先生》一文）的抨击，以及许多其他的抨击。总的来说，有可能证明正面评论和负面评论的数量是不相上下的，无论如何哈代本来都应该厚起脸皮，当然也无须那么吃惊。当安德鲁·朗得知哈代对他对苔丝的批评所作出的反应后，他对克洛德说：“哎呀，我们应该培养一点坦然淡定的精神。”但哈代的薄脸皮与其个人品质以及他个人历史的某些方面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些方面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尽管哈代陷入困境后怒气冲冲的样子一点也不招人喜欢，但也并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讶。

在这段不愉快的插曲中，哈代再次彰显了他自己能够既是“傻瓜”，又是“顽抗者”，就像裘德一样。他对编辑和评论家们对其作品的反应表现出的明显惊讶，与他的一处明显失败是一致的，即：他没能意识到他对男女关系的直接处理——由于他不愿接受把婚姻作为小说情节的必要目标和结论，这一处理方式又得到了强化——必然会遭到批评和抵制。毕竟，奥列芬特太太在“反婚姻”的背景下讨论《无名的裘德》完全有正当理由。当哈代在连载出版之前就这些问题受到质疑时，他总是准备执行战略性撤退。由于当时的出版体制要求连载的最后一部分发表之前以书籍形式出版一部小说，所以除了从一开始就写下他最终打算出版的内容外，哈代实在是别无选择。无论从财政角度而言连载有多么重要，它在文本上的存在都是短暂的，因此在有必要进行无限的改编甚至是毁损之前，实际上它是可利用的和可任意处理的。完整的、原始的、原计划的文本可以在小说以书籍形式出版之前予以恢复，偶尔的修订或许是在连载被接受和文本恢复过程本身涉及的重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压力下重新做出的删除或修改，有时会显示它们毕竟给小说带来了改进。然而，一旦恢复的文本以卷册的形式出版，哈代就不太愿意让步了，即使是在纯技术性的细节上。一位读者提出异议说：安吉尔在现实生活中会作为谋杀亚历克的从犯而被判刑入狱。哈代并没有完全认为该异议是愚蠢的旁枝末节。相反，他对来信者对法律的解读提出异议，并坚持认为，即使安吉尔被送进监狱，他被判的短暂刑期也会让他在苔丝被处决的那天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因此他就出现在了小说的最后几页。

在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时，哈代没有过多或深入思考他自己的第一次自卫反击的正义感或适当性。他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区分对作品的攻击和对作者的攻击，他也不情愿忘记或原谅伤害过他的人。哈代个人对公共引文的生动运用源于一则要烧掉《无名的裘德》的声明，该声明出现在威克菲尔德教区的主教威廉·沃尔沙姆·豪写给《约克郡邮报》的一封信中，豪是一位有一定声望的牧师和赞美诗作家，却被哈代认为是一个不屑一提的“悲惨的二等教士”。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是一个喜剧情节，《生活和工作》确实注意到，烧一本厚厚的书绝非易事，既然主教选择在盛夏时节来表达他的姿态，他大概就不得不为了烧一本书而专门生起炉火。然而，哈代对一位“可

怕的、教条式的教皇主义——基督教的别称（但其实是保罗主义加上偶像崇拜）”的代表的如此具有象征性的行为深感不安，他认为这是对道德和进步的持续敌对，甚至是对宗教本身的持续敌对，因为它与“基督的真正教导”相同之处甚少。在豪去世后，哈代还愤怒地发现，豪曾煽动把该小说从 W.H. 史密斯的巨大流通图书馆中撤出。《生活和工作》记载：“哈代对这个道貌岸然的阴谋一无所知，否则这可能已经激发一个有头脑的人发表一番关于扼杀文学的言论了，尽管烧书事件并没有激发他这么做。”

对文学扼杀（一个将文学审查和经济扼杀巧妙结合在一起的术语）的抗议充分依赖于原则性和实践性的反对意见，但在《生活和工作》中，紧随其后的却完全是另一种评论：“对哈代来说，这件事唯一悲哀的特点是，如果那位主教能真正了解哈代本人，他就会发现一个在个人行为、道德观和宗教的重要事实方面与他自己几乎没什么两样的人。”这段话的显著之处，与其说在于哈代竟然想象他和主教——比如说能在雅典娜俱乐部相遇——有可能会得益于相识相知，不如说在于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样的问题上，他竟然感觉到不仅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还有必要为其个人美德和道德感抗议。当然，在哈代撰写《生活和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更多地了解了豪主教以及他那绝对不可小觑的成就。



托马斯·哈代

如果哈代能够被他素未谋面的人的攻击所伤害，那么他认识的人的攻击应该会让他感到受到了背叛，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萨维尔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可能对《德伯家的苔丝》写了带有敌意的评论，他感到甚是痛苦，这反映了他从小培养起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即友谊与忠诚密不可分。他可能也非常痛苦地意识到，他多年来在大都市的俱乐部和友情上的投资，终究没有在他的职业上发挥良好的作用。奥列芬特太太不仅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批评了《无名的裘德》，还写信赞扬豪主教将其付之一炬的行为，《生活和工作》相当哀伤地抱怨：她在温莎患病期间，哈代还曾特意探望过她。几年后，哈代得知亨利·詹姆斯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曾就他们所认为的《德伯家的苔丝》那令人憎恶的文风和不自然的性行为交换过意见，他称他们俩为小说家中的波洛涅斯和奥斯里克，并惊呼道：“那两位品行端正的女性的所指不明确，从上下文中无法判断。竟以这样的方式来暴露她们赤裸裸的精神，多么有失体统啊。”哈代的老朋友高斯曾当着他的面说《无名的裘德》是有史以来最不体面的一部小说，哈代也没有完全原谅他。有人可能会说，在安德鲁·朗这件事上，哈代应该有能力将他的个人生活和文学生活分离开来。然而，许多比哈代更自信的作家都很难忽视如此亲密的朋友所说的如此伤人的话，而对于哈代来说，职业与个人、想象世界与日常世界之间的传统区别似乎并不存在。哈代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如此难以区分地交织在一起，几乎别无二致。他如此执着地汲取已知的和经历过的现实，他的生活主要就是每天集中大量的时间待在麦克斯门的书房里，这几乎是是他唯一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他在接受批评时，最终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或社会声誉。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哈代将带有敌意的评论视为对他的专业精神的直接的、故意的反应，它们是在声称从实践能力方面而言他不擅长创作故事连载、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因而损害了其声誉，并危及了其作品的销量。

引申开来，这种批评还倾向于给他因文学上的成功而业已取得的地位蒙上一层阴影，使他受到个人的嘲弄，使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更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方面本身往往是值得钦佩的，但当时的阶级传统教导他把这些方面视为尴尬的根源，包括卑微的家庭背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以及他那上博克汉普顿的出身与他现在认为的自己所处的文学和社会圈子之间的隔阂。

要评论他对负面批评或牢骚批评表现出的敏感的生硬性，实际上就是要承认那种不可分割性，就是要主张一种令人紧张的、可疑的、来之不易而紧紧抓住不放的正直，正是凭借这种正直，哈代努力实现了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的目标，不是在他本希望过的那种理想生活的背景下，而是在他个人命运中的咄咄怪事和商业出版体系中的紧急情况强加给他的“肮脏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下，而只有通过那种商业出版体系，他才可以赢得更充分的自我表达。哈代从一开始就珍视艺术家角色的崇高理念。他对雪莱敬慕有加，视其为英雄般的艺术家；他可以称赞亨利·詹姆斯为敬业的艺术家，“一个真正的文人”，尽管他不喜欢他的为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无情地苛求自己，也苛求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艾玛。当他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时，他迂回曲折，争论中或夸夸其谈，或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带着近乎恐慌的心情，他感受到了一种威胁，不仅是对他作为一个文学商人的财富的威胁，而且是对他艺术家自身的完整性的威胁。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哈代获得的版税看起来数额足够大，也足够稳定，使他能够在那个非通货膨胀的时代考虑放弃小说创作，回归他长久以来一直在考虑的诗歌。因此，他似乎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在其收官之作《无名的裘德》中，他将毫不犹豫、毫不妥协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将一劳永逸地谴责那些对教育和性别公正的否认以及对淳朴人性的否认——他认为这些否认广泛地、隐性地存在于英国阶级制度中——并最终将会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些感情自《穷汉与淑女》之前就一直在他的记忆和想象中酝酿。本已饱受争议的《德伯家的苔丝》的成功提供了一个跳板，从那里可以展开对《无名的裘德》的最后一次全面挑战。《生活和工作》援引了几次作者受到严厉批评后的虚张声势，其中有一个出自本杰明·乔维特之手的口号：“永远不收回说出口的话。永远不做解释。完成它，让他们嚎叫吧。”但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面对如此广泛而令人痛苦的公众曝光带来的心理压力，或是面对这种压力带来的诸多影响，包括：婚姻危机，对婚外情的失望，年龄增长和可能的健康状况下降带来的抑郁，以及对被认为是文学同志的关系的幻灭。

1895年最后几周的黑暗并不是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哈代特别珍视史文朋的来信，在信中，史文朋首先感谢哈代把《无名的裘德》作为礼物赠给他，并称赞了这部小说的美丽、恐怖和真实，此外还有克雷吉太太、艾伦·特里（然而她觉得小说的语言有时显得不必要地粗俗）和“乔治·埃格顿”发来的贺信，后者是《基调》一书的作者，她称赞苏的性格特征是对“一种比普通男性观察者所认为的更为罕见的性情”的心理上的深刻治疗。12月初，哈代夫妇开启了短暂的伦敦之旅，观看了福布斯罗伯逊和帕特里克·坎贝尔太太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表演，之后还与他们二人共进晚餐。哈代还见到了亨尼卡夫人和其他朋友，待到他返回多切斯特时，他能够向乔治·道格拉斯爵士保证，《无名的裘德》“进展十分顺利”，伦敦社会“根本不能被震惊到的批评家们所代表”。

他将毫不犹豫、毫不妥协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将一劳永逸地谴责那些对教育和性别公正的否认以及对淳朴人性的否认

1896年初，坎贝尔太太在多切斯特的国王武器酒店住了几天，并花了很多时间待在麦克斯门。1月12日，她写信告诉一位朋友，她一直在哈代用小提琴演奏的老曲子的伴奏下跳即兴舞步。关于在伦敦上演戏剧《德伯家的苔丝》的可能性，哈代再次积极征求了他人的意见。2月初，哈代在伦敦时，曾拜访坎贝尔太太讨论此事；他与福布斯罗伯逊以及他的合伙人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开展了更多的谈判；3月中旬，哈代就正在讨论的条款征求了亨利·亚瑟·琼斯的意见。他确实通过哈珀兄弟公司安排了该剧在纽约的上演，由米妮·马德恩·菲斯克扮演剧名角色，正如他后来了解到的一个名叫洛里默·斯托达德的人对剧本作了大幅修改。该版本于1897年3月2日首演，并在纽约演出结束后举行了北美巡演，但预期的伦敦演出未能实现。《生活和工作》把谈判的破裂归咎于《无名的裘德》引起的公愤，但哈代于1896年8月给苦恼的坎贝尔太太写了一封信，信中含糊其词地提到其他复杂的因素，将小说改编成戏剧本身很可能就存在问题。尽管如此，为了在表面上履行手续，在美国首演的当晚，

也同时举行了伦敦版权的剧本的“演出”，据说在伦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盗版”演出，直到以菲斯克太太的名义成功地对其下达禁令才告结束，哈代于1900年公开否认参与过此事。

（哈代的妻子）艾玛惯常的热烈可能是迷人的，甚至是有趣的，这使她成为一个活跃的写信人，即使有时候会体现出惊人的断断续续。这也使她成为一个狂热而有力的（即使不是特别连贯的）社会和宗教运动的拥护者，她越来越使自己致力于这些运动，而且经常是公开的。她憎恨《无名的裘德》的众多原因之一是它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阴郁的描述，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她在才智方面与哈代渐行渐远，其决心丝毫不亚于他在情感上与她渐行渐远。他对既定的制度和价值观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这直接与她自己日益加深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这种宗教信仰以过时的福音主义为中心，其特点是对罗马天主教的敌意和对有限的人道主义事业的热忱。1897年2月，她致信丽贝卡，哀叹自己的通信者是一个“裘德式的人物”，并继续表达她对作家们的“空虚的唯物主义”以及他们的“智力自豪”的憎恶，她还宣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愈发致力于“改良之道和方案计划，以消除那云层般浓密的邪恶”。

艾玛的侄子戈登这段时间在多切斯特上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麦克斯门度过，他一直坚持认为，虽然夫妻俩肯定在《无名的裘德》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婚姻本身不能被称为是不幸福的。然而，吉辛于1895年在哈代身上所观察到的“奇怪的坐立不安和难以平静”显然与整个家庭内部的基本不安状态有关。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关于艾玛恳求理查德·加内特停止出版《无名的裘德》的故事，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但听起来却足够真实——或者也许只是足够带有恶作剧的性质——从而得以广为流传。剧作家阿尔弗雷德·苏特罗回忆道，《无名的裘德》出版后不久，他在拜访麦克斯门时对该小说予以称赞，艾玛则尖锐地回应说，这是哈代第一部“没有先让她读手稿”就出版了的小说，“她坚定地补充说，如果她读了手稿，这部小说就不会被出版，至少是没有经过大幅修改就不会被出版。她还补充说，这本书给他们在该郡的生活带来了改变……哈代一言未发，甚至连眼皮都没从盘子上抬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哈代越来越多地诉诸这样的沉默，将其视为掩饰尴尬和避免出现更令人苦恼的场面的最可行的办法。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艾玛言谈举止的不合逻辑性，但对于她公开的斥责和公开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对立和独立，他只能隐忍。

1896年圣诞节前不久，亨利·约瑟夫·穆尔及其女儿拜访麦克斯门，发现艾玛满怀柔情，哈代本人同样心情愉悦。穆尔当然是老朋友了，不过他离开麦克斯门后，那种欢快的气氛也许并没有保存下来，虽然哈代在最深层的个性和目标上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在更表面的层面上，他容易在思维、感觉和情绪上迅速转变。他最黑暗的忧郁不仅能与外表的亲切共存，还能与真正的快乐交替出现，有时候他似乎完全有能力至少是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忧郁，即使不是故意制造忧郁。毕竟这些阴暗的情绪常常有助于创作，从这个角度而言倒是一大幸事，这不仅体现在他为一只心爱的猫设计墓碑时表现出的“忧郁的快乐”，这只猫的失踪曾使他陷入绝望，还体现在艾玛去世后他创作的“1912—1913年组诗”达到了其创作巅峰。

然而，在1895年至1896年间创作的最好的诗歌中弥漫着一种凄凉的气氛，个中不带丝毫的虚假。如果说《无名的裘德》讲述的是一个人跌至人生低谷的故事，那么哈代本人在《威塞克斯高地》和《在阴郁中》三首组诗等诗中似乎险些陷入绝望。弗洛伦斯曾说，重读《威塞克斯高地》令她心痛不已，因为她知道该诗是在《无名的裘德》遭遇负面评论之后写的，当时哈代“受到了如此残酷的对待”。该诗也是在亨尼卡夫人拒绝了他并给他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之后写的，就此而言它同样重要：

对于一个罕有的漂亮女人来说，我现在只是她的一个思绪，  
我进入她的脑海，但另一个思绪接踵而至，更博得她的欢喜；  
然而，我对她爱得如此全心全意，她自己甚至并不知晓；  
好吧，时间能为脆弱的心灵疗伤，现在我可以对她放手。



### 迈克尔·米尔盖特

1929 年出生于英国，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休英语教授。继其有影响力的批判性研究《托马斯·哈代：其小说家生涯》（1971）出版之后，牛津大学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其重要的编辑和传记作品，包括七卷本的《托马斯·哈代书信全集》（与理查德·珀迪合编，1978–1988）、《托马斯·哈代：一部传记》（1982）、《与遗嘱有关的行为：勃朗宁、丁尼生、詹姆斯·哈代》（1992）、《艾玛与弗洛伦斯·哈代书信集》（1916）、《托马斯·哈代的公众声音》（2001）等。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文内图片来自无墙幼儿园

## 专栏

# 058 唐浩多 应对暴力：从《家暴图谱》 到“无墙幼儿园”

杨樱 | 接力访问

唐浩多试图去理解其他人，无论是他想帮助的人，还是他一度无力面对的人。

在和唐浩多聊天之前，我知道他做了很多事：

在海口一个叫滨濂新村的城中村里开了一家伴伴杂货铺；同一个空间后来变成了支持困境儿童的“无墙幼儿园”，自出版《儿童口述诗》的作者就是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同时，作为一个公立中学的美术老师，他匿名调查了学生的家暴遭遇，发起一个叫做“聊社”的家庭会议工作坊，希望从学生、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入手探讨家暴背后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艺术实践者。

我7月中旬加上他的微信，发现id是“叶灵，曾用名唐浩多”。有点不理解。“BIE别的”6月14日发出的“无墙幼儿园”稿子上，主人公不还是叫唐浩多？

## 01

唐浩多在微信里叫叶灵，工作或者做其他正经事的时候叫唐浩多。叶灵是女儿取的名字。唐浩多有两个女儿。取名是他们之间的某种密谋。比如海口有个“桑托·伍灵子海滩”，这是唐浩多女儿自己的叫法，和“叶灵”一样，都是一问一答里凑出来的童言，因为唐浩多跟她们说世界上的命名都可以有自己的版本，就好像他们的名字，长大了不喜欢，自己换个也可以。

唐浩多对这些比自己小很多的人类有很大的耐心。否则“无墙幼儿园”做不到那样自由：无时间限制、无空间限制、无模式限制。任何小朋友都可以跨进杂货铺的门槛玩耍。但是能跨进来本身就说明了某种渴望。

唐浩多描述过一个小孩进门时候的踟蹰状态：

他第一次来，可能三四岁。你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我都想不到他的动作。他想要踏进来的那一刻，可能是有点紧张，就滑了一下。穿着拖鞋，没摔，一只鞋子脱出来了。其实我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我是谁，就是铺面邻居的一个孩子，美甲店的。我就说：“你好，你想进来玩吗？”

他不说话，一个劲掐自己的拖鞋，好像觉得是因为你这只鞋子我才绊倒的。他不回应我，边掰边走到门槛边上。我知道这是小朋友的方式。我就说：“我知道了！刚才是不是鞋子让你滑倒了？”他说是的。我说，“你没摔着吗？你可以玩了。”

他就放松下来了。

“无墙幼儿园”里的许多孩子被唐浩多称为“困境儿童”，这是他在“流动儿童”之上的修正说法。城中村里父母多在外打工，或者疲于生存，小孩缺乏陪伴，常常结队在社区里玩耍。他们很多有复杂的原生家庭关系，所以“无墙幼儿园”的功能之一，是对受过大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长期陪伴、教育等深度工作。他们的年龄从幼儿园到初中不等，也有完全没有念过书或者辍学的孩子。目前往来较多的有30多名，如果算上离开的，就有50名。



这个儿童教育项目的起点，就是一个叫“月亮”的孩子，唐浩多2021年在为她办的画展上讲述过她的故事。月亮的生母在她未出生的时候就在物色养母，只因她是女孩。养母本是菜贩，后来去各处打工。唐浩多见到月亮的时候，养母在滨濂新村和人合伙做生意。见面的场景后来被唐浩多一再复述：时值半夜，他和两个朋友在伴伴杂货铺附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觉得时间太晚了，就问她是谁，为什么不回家。月亮的回应极其暴戾：操你妈，我家里还有三把刀，你信不信我拿来插死你！

月亮震惊了唐浩多。当然，比这句话开场白还让他震惊的很多细节他还会陆续遇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试着了解滨濂新村，一个离他在海口的住家不太远的地方。了解的方式，就是开一家杂货店。

## 02

伴伴杂货铺首先是个真的杂货铺。社区观察是唐浩多自己内心的想法，开一家店是他对社区和妻子表达的说法。当时唐浩多已经不想只做观念输出——也就是从艺术家本体出发，把他对社会、政治等等的思考和感受用某种作品形式表达出来，他觉得无趣，就想走到实践的层面。不是那种去个地方做一阵子调查，回来再做写作分析的实践，而是长期身处某地的实践。

当他发现滨濂新村的时候，仅仅在直觉上判断可以做点什么，但没有具体计划。与此同时，他必须对妻子有个交代，为什么在租了个人工作室的情况下又要找个地方。

伴伴杂货铺最早出售日用品和少量蔬果，日用品主要是代购，来自香港、泰国和澳大利亚。不过这个面目维持时间很短，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代购受阻，需求也下降，更久之后唐浩多发现，大家消费力也下降很多。眼下店铺里只卖四种东西：老人治疗关节的活络油，泰国的蜈蚣丸和青草膏，再有就是海南本地的蛇油，很像香港街区老铺的配置。

在伴伴杂货铺，各种各样的捐赠物品和唐浩多与孩子们做活动时候的杂物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这些丸啊膏啊就放在一个小格子里，老客户才知道。月亮第一次来的时候，唐浩多满地找东西给她，最后找出来进货时顺手带的金嗓子喉宝。好歹是甜的。月亮出



孩子们在无墙幼儿园画画、下棋、自由活动

门飞快吃完。再回来问他，还可以拿一盒吗？

滨濂新村里的店铺流动性很大。伴伴开了5年多，有些相邻店铺已经换了五六手，最短的一两个月就会关张。要说做生意，这都不能算个市口。滨濂新村也就是这几年才成了海口的城中村——城市不断扩张——过去只是郊区。房子都是小产权房，村里人原来自己做点小买卖，城市化带来更多人，房子就租给他们，村民收点租金。

唐浩多最早来的时候，看到新村里划出来的免费停车位都被这里的小青年私下安上了折叠三角架，给钱才开锁把架子放下来，让人停车。这就是村子里一部分小青年来钱的方式。

这个新村和唐浩多工作的中学就隔了一堵围墙。

### 03

唐浩多1983年生于海南儋州。他记得村子到了他小学六年级左右才通了电，要到他初三或者高一的时候，家里才有第一台电视。他小时候的娱乐产品是小人书和画片。因为擅长临摹，初中由一个学长介绍学过一个月的画画。

这个技能在高考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唐浩多的记忆里，他们村的80后没有读大学的，绝大多数读到初中毕业。他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小镇中学，能力也普通。不过有几个同学听说考美术生文化分不用太高，就想走这条路。唐浩多就和他们一起，一边自学，一边把会的东西教给他们。最后其中一个人竟然和他一样，也考上了本科。

唐浩多在海南大学读书，学雕塑，想着这个专业可以接点工程赚点钱。按照唐浩多父亲的认知，上了本科，去当个老师什么的就不是问题。当老师是父亲心目中的最好的工作，体面稳定，但唐浩多觉得没啥意思，如果是这样他可以去分数更低的海南本地师范大学，而且老师工资当时才几百块钱。唐浩多的眼界已经到了纯艺术，他从各种渠道知道了北京的798和艺术村，网上也有全球各地艺术家的作品。他想做个艺术家。

但是2007年，唐浩多还是做了一个中学老师。

这就要说到他和父亲的纠葛，另一个漫长的故事。为了梳理这层纠葛，唐浩多在2017年参加了由艺术家满宇参与发起的“一个人的社会”，这个以精神分析为方法和切入点的项目试图以参与者的生活为场域，揭示社会和文化在个体身上施加的结构性问题。

参加这个项目得以让唐浩多以一个他者、而非儿子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父亲。他的童年、他作为男性的处境、他作为家族成员的压力、他为何无法控制自己的暴怒和施暴的手、他为何要用蛮横纠缠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子的选择，从职业、婚姻到生育。

唐浩多毕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和父亲的关系。他鄙视他，同情他，屈服于他，就是不能挣脱他。毕业之后弟弟上大学，父亲第一时间就跟他说，以后弟弟的四年就你来供了。他觉得不可思议，父亲还有工作能力，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他自己的责任在哪里？

“情感漩涡”，他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困境。“我真的是很在意这种关系，我很害怕关系的断裂和破灭。”

生活里最痛苦的记忆——包括离家之后父亲如何对母亲施暴——他连在“一个人的社会”精神分析师面前都无法讲述。最后只能以录音的方式一个人讲出来，而这三段录音，他永远也不会拿给别人。

这种痛苦让唐浩多无法找到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我。2016年，他响应当时策展人康学儒“创作走出室外”的倡议，把实践作为解决创作不满足的尝试。出于偶然，他认识了一个在海口街头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那有个南大立交桥，桥下面碰到一个拾荒的老人，当时他应该是60来岁了。我就坐

下来跟他聊天，他挺和善的。我问他为什么会流落在这个地方？当时就觉得好奇。聊天以后才知道他的命运。

他当过10年兵，在国内5年，巴基斯坦5年。部队转业以后就到了村里，其实是村里的一个小干部。没多久，他老婆就得了一场很大的病，需要很多钱，但那个时候农村的医疗保险还没有实施，有多少你就花多少钱，当时他们工资很少，似乎是九几年。于是他借了很多债，还转让了自己的干部职位，就跟人家说好了，人家给他一笔钱，他去打报告，上面也同意。就这样钱也不够。他就去新疆打工。最后老婆还是死了。

他有一个女儿，初中毕业，在深圳打工，后面失踪了。他那时候躲债已经到了深圳，过了两三年就到了海南，做过买卖，也做过建筑工人，在琼海。好不容易存了七八万，得了肺水肿，看病用了很多钱。他还有一个弟弟，是个脑瘫，后来去世了，他最后给弟弟买了口棺材，葬在了老家。他就只剩下一个人了，钱也快没了，也不能去工作，就露宿街头，吃别人剩下的快餐。我们海南夜生活还挺丰富，那些烧烤店剩下什么他就捡来吃。就这么碰到我了。

我了解这个事情之后觉得这个群体太不简单了，就决定继续去采访。我每次采访都会写一个夜访日记。因为都是晚上出去，凌晨，他们凌晨才出来。因为白天看不出来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穿得工工整整的，也会去喝茶——我们那边喝“老爸茶”，比较平民的，消费也不是很高的，他们也在那边打牌，看看报纸什么的。

我遇到了一个广西人，他女儿读大学，他也露宿在那个桥下面，拾荒来换钱，但是家人根本不知道。他每个月就省下来一些钱，他想，租一个房子800块，不租就省了800块，女儿大概每个月可能需要这么多伙食费。女儿根本不知道父亲在这里是这么生活的。

这是唐浩多第一次具体地接触到其他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看待艺术实践的方式。原本计划采访更多人，但因为一些原因中断了。在参加“一个人的社会”时，他也考虑过之前接触的某个流浪者，但因为后者居无定所，不一定能找到，也因为他渐渐意识到，他和父亲的关系才是他真正要突破的痛苦之源，因此最终还是选择了父亲。

在2019年“一个人的社会”展出现场，唐浩多曾经展示过一组《家暴图谱》。他以简笔水墨画的形式罗列了他和兄弟姐妹曾经遭受的不同家暴形式。每一张画都有四个说明项：施暴对象、施暴原因、施暴方式和使用语言。

比如有一张的背景是坟堆。一个女孩——那是唐浩多的姐姐唐浩红——被绑在树上。施暴理由是爬树。施暴方式是“用绳子捆绑双手，背对树身，绑在其上，直到夜晚”，使用语言是“我不会解绳的，晚上有很多鬼会出来找你”。

另有一张，是同村一个村民家暴儿子的场景：镰刀抵在儿子脖子上。唐浩多备注：至今还有深深的疤痕。

这家暴连唐浩多的父亲也看不下去，但是那个男孩最后考上了大学，家暴反而被作为正面案例广为流传，唐浩多的父亲也十分信服，在自己施暴之后常常拿这个事情来举例说明自己的用心。

### 04

因为在“一个人的社会”里对家暴的回顾，唐浩多开始关注身边的家暴。他在教书的学校发放问卷，学生匿名作答。唐浩多发现：

生活于城市的青少年学生遭遇的家庭暴力并不比乡村少；另外，他们经受的语言暴力比身体暴力的影响还要深刻持久。身体疼痛不是造成他们精神创伤的主因，而是成人对孩子的轻视和精神压迫。从孩子嘴里说出的话，家长总是不以为然，习惯顺从自己的理解，殊不知两者差得多远。孩子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成人认为是小事，孩子犯的小错误，成人往往将之放大。这是一种对孩子不平等的权力压迫和精神压迫。

唐浩多收到了很多纸条，上面有对家暴的各种来龙去脉的描述，是另一种《家暴图谱》。但是当他希望以一个学校社团的面目正式提出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聊社”——却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阻力。学校的不情愿尚可想象，并且以心理小组的形式最终也得以建立，但学生的回避他却没想到。当匿名的形式消失，他试图探讨的议题就变成了一种会被潜在污名化的标签，刚开始的时候有几十人报名，约见面的时候降为五六个，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学生也不再来了。

也许方法上有点问题，为什么有个名目和办公室事情反而变得不顺利？他还没有答案。回顾匿名调研的时候，学生甚至会介绍新的聊天对象给唐浩多。

“因为她聊了以后有些事情特别不明白，甚至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跟我借一本书，借来以后，就会把她们的问题写在一个纸条里。夹在里面交给我，匿名，我不知道是谁。然后我要在写在纸条里面，下一节课或者第二天的时候，再把这本书交给某个同学，但他只是一个传递者，有些人提问用个笔名什么的，还问了很多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同性恋的，挺多的。”其实无论形式，唐浩多想做的都是他体会过的经验：梳理关系的来龙去脉，包括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和学校的关系，和家庭的关系。但他还在调整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深入去了解一个人的话——我对我父亲就是这样——更多维度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简单评价他。”

05

推荐唐浩多参加“接力访问”的人是老杨，他们彼此不认识。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老杨的母亲吴姥姥作为[里林提名](#)的接力人和我聊了天，[作为吴姥姥的“助理”](#)，老杨也参加了。吴姥姥不久之后去世。

不久之前问老杨，还想找人接力吗？他发来了两张图片，说要推荐一个诗人。

图片上就是诗集和诗。具体是这样的：

唐老师

月亮（10岁） 2020.11

唐老师拉大便  
唐老师坐在秋千里  
然后飞了起来  
唐老师吓唬小孩  
唐老师亲嘴  
唐老师把鸡鸡放在嘴里  
唐老师在看电脑  
唐老师在玩蹦蹦床，在唐老师的鸡鸡里  
唐老师拿屁股来吃  
唐老师拿屁股来玩  
唐老师拿嘴巴来咬  
汪光俊打郭福晶的脸  
唐老师开摩托车  
唐老师在看手机  
唐老师在查资料

老杨说：“这孩子的诗让我看了有点儿过不去。想知道遭遇了什么，又怕知道……”我跟老杨说不能让一个13岁的未成年人作为接力访问对象，栏目定位不合适。老杨说，那就推荐唐浩多吧。他致力于为流动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活动空间，以及组织各种具有疗愈和联结、教育的活动。但愿月亮那孩子现在成长顺利。

后来我问唐浩多，月亮怎么样了。他说以前女儿在伴伴杂货铺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会说“爸爸抱抱”，后来月亮也说，“唐老师你能抱一下我吗”。现在月亮还是没能上学，有老师会用其他方法教学，只不过不是学校里的文化内容。以及，月亮的妈妈已经把唐浩多当朋友了——在“无墙幼儿园”工作了5年以后。

**Q: 你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 可能想把《家暴图谱》完善一下，做成一个册子。我当时在“一个人的社会”里手绘了两本，几十张图，但是远远不够。我觉得暴力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被吊着打，有些扇嘴巴，有些是罚站，有些我还不知道。我希望以某种形式搜集这些，然后画出来，变成自出版。

**Q: 你最近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A: 资金。主要是无墙幼儿园的，比如我们想做艺术节，还缺一万块钱，现在公益资金还剩下2000块。我不想公开募捐。还有人说可以来帮我们募捐，只要让他提成50%。我就很惊讶。以前可以通过自己造血，但是现在销量也不好，还是跟经济有关。

**Q: 你想邀请谁来接力？**

A: 满宇。一个非常纯粹和有态度的策展人，他这几年参与发起的“5+1”、“居民”和“一

个人的社会”等艺术项目，能给人很大的启发。特别是他后来融汇了精神分析、社会学和当代艺术的理论，此后发起和组织的项目是真正关心具体的人以及人的内部精神的，而不是仅仅是那个流于表面和物欲逻辑的艺术。也可以说融汇了精神分析的视角，艺术的维度被更多的打开了，而不是封闭的。这个打开非常重要，使得艺术家不再为艺术家的身份而焦虑，甚至放弃做艺术也是一种选择。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文内图片来自“共生不错”舞团

## 专栏

# 059 丸仔 “他们什么都做得到， 什么都不会错”

杨樱 | 接力访问

如果把舞蹈看成日常的身体语言交流，  
它就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丸仔伸出一只手。

“我做一个动作，然后你再做一个，”看我愣神，他又补充一句，“随便什么动作。”

我也伸出一只手。

丸仔把伸出的手掌，蜷成拳头，再伸出食指。

我如法炮制，但我伸出食指和中指。

丸仔又伸出三个手指……然后，他表示很满意，觉得我终于上道了，“跟说话一样，有人跟你说话，你会有反应，动作也一样。可能是模仿，也可能不是，只要跟上就可以了，它就会自主发展出一些动作出来。”

丸仔是在给我做示范，他的工作坊里的工作大约是如何进行的。“人人皆可舞”。即兴舞蹈的意义所在，也可能是起源。身体做出的反应，就是一种即兴的舞蹈。“共生舞”的基础，或者更早一点，“舞动所能”的基础。

**曲栋介绍丸仔**，艺术家。这种称呼多半指向模糊。丸仔为人所知大多是因为舞蹈家的身份，丸仔自然认可这个身份。只是在丸仔眼里，所有人都是舞者，就跟我们前面伸出手来，你的身体语言、你对别人的动作做出的反应，这些都可以视为舞蹈一种，所以舞蹈艺术家对于丸仔到底有多少实际的标签意义，存疑。

丸仔介绍自己会说是行为艺术家。很久以前，他还是一个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的时候，看到有一场“多媒体装置艺术”的展览宣传，他认为是他学的计算机行业的新动向，结果发现是一堆神神叨叨的人在搞艺术，他觉得这东西好，他头脑当中跟艺术相关的那一部分被调动起来，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他可能更擅长的领域。

他开始琢磨、积累各种表演经验，把在香港能找到的展览都找来看，并进入了一个“东亚民众剧场网络”，感觉就像内地的各级群众艺术馆。他在那里做自己的创作。

香港有个大作家叫刘以鬯（这个字发“唱”的音，我每次看到它都要把它当成乱码），他有一本小说叫《对倒》，被王家卫改编拍成电影，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样年华》。还有部作品《酒徒》，更有名。有一次被改成舞台剧，丸仔也参与了，演其中一个酒徒。大家觉得他演得不错，但很快就有同行发现了问题：“你是真喝酒？”他说是啊，人家告诉他有一种东西叫“演”，不用上场给自己弄个烂醉的，这道理他当然懂，但他还是喜欢那个醉酒的状态。事隔多年丸仔总结：“他们上台是表演，我的不是，我是行为艺术，我是真喝酒，是真醉，不是表演。”

你看，艺术在他这里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丸仔最终也没有在电脑上做什么事，浪费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名分。他说他做过最正常的一份工作是考古，在香港。在香港还能考古？丸仔就很得意。好的时候一年有十个月开工，差的时候就只有三四个月，没有开工，就没有他考古的事，这也好，他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舞蹈。

舞蹈就是接触即兴。即兴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更多没有舞蹈基础的人来学习，再后来是各种有障碍的人，这倒也不意外，他们更需要肢体表达，然后就是一些理念的输出，在工作坊里把这些理念变成方法、做动作——所谓学习，这个时候它还是一个教的过程。接下来问题来了，“你跟一个盲人表达什么是红色的花，你知道会很难；你要让一个聋人理解音乐，一样很难。”所以，到最后，他发现动作的规范与节奏、身体韵律这些东西都是刻板理解，真正发生的只有交流。交流也并不是输入输出、接受的关系，而是交融。

就像上面丸仔拉着我比划划，你伸出一只手，我伸出一只手，丸仔给自己的这套摸索命名为“共生舞”。

这个思路历程，大约从香港到广州，从 1998 年到 2006 年，再到 2018 年。丸仔的官方介绍和自己写的文章中都提及过。

1998 年接触即兴，2005 年认识了老师 Alito Alessi，2009 年在香港与人一起创办“共生舞团”，任艺术总监；2012 年跑到哥伦比亚跟着 Alessi 老师挣来了“舞动所能认证教师”资格；那一年，丸仔的世界开始深入内地腹地，跟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合作；2015 年在美国又获得了一个“与肢障舞者共舞”的导师培训证；2016 年在美国参与“即兴教母”（原来每行每业都有教母）Nancy Stark Smith 的工作坊，据称深得“生活即是舞蹈”的真谛，大约在那个时候，他总结了他自己的舞蹈图谱，有了一套自己的“修齐治平”，可以在江湖上开门派了；2018 年，丸仔在广州搞了一个“共生不错”舞团，工作重心更偏向内地。

经过这个过程，丸仔把自己弄成一个完全异类——在我的理解范围内——的舞者。我看各种总结里，丸仔至少感谢了十几个人。



2019 年 6 月“共生不错”舞团一周年活动

早年间丸仔在香港做公益，社会有很大的空间，艺术家当然很穷，但经常会有各种项目，政府的也有，更多来自于民间，或者政府也会把它们的项目交给民间来做，所以生活还好。

他香港出生，祖籍东莞，在 2000 年之前去内地最近也就是东莞，次数屈指可数。到 2006 年前后开始在广州做公益，发现各种人，练功的，搞声音艺术的，各种各样的有着各种思想和主张的小组织，经常搞些活动，很活跃。最初他以为广州没有这样的人。

丸仔在“共生不错”舞团做艺术总监，开始的时候还回香港，后来发现每周都要来几天，要住店，要来回路费，就长驻广州。因为这几年总是有风云莫测的肺炎隔离，所以他的生活节奏略显杂乱：2020 年一年的时间都在香港——他说他是困在香港；2021 年活很多，有个项目要去澳门，内地的项目也要跑来跑去，不过那一年总的来说至少自己的行程是可控的；2022 年大多数时间都困在广州，不过在广州的日子还好——那时候他住在曲先生的宿舍里，曲栋为手心咖啡员工租了房子，而且很幸运的是，几次封控他们

都不在封控区里。

三年之后,他觉得论隔离,最好的是澳门,住在酒店里,服务也都不错。在深圳的一次隔离,管理人员就很凶,什么事也不管,也不会让你问,问了也不会有解答,不许抽烟,不许喝酒,有些人要抽烟怎么办!他替人鸣不平。他的不平不在抽烟,是在济南突然多出来的居家隔离,要抽血检测,他那会儿工夫至少说了四次他害怕抽血,说了三次他有心理阴影,我看了看身材有点发福的丸仔,脑补了一下这个惨烈局面,觉得还是不想为好。

除了这些,丸仔就是继续他的穷艺术家生活。曲先生说到他的时候,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我问很没钱吗?跟香港比也算得上没钱吗?丸仔说也不是太大问题还可以打车,准确说是拼车,费用跟在香港坐地铁差不多。曲先生的宿舍也可以省一笔钱,虽然广州租房也不是太贵。

“他们以为我来大陆会赚钱。很多人来大陆,就是赚钱。我没有啊,一年下来也就五六万,一个月合下来几千块钱。”

“这是一个生存问题,是一个一直会存在的问题。”

我突然想起那些视障员工,他们在管控最严格的时候生活怎样?丸仔说不知道,因为那时生意太差,大家都各自回了老家。

丸仔在广州的工作很有成就感。他说舞蹈团中有一个成员,类风湿关节炎,走起路来像干尸——一边说边比划,丸仔的身体语言有天分——那人上下肢都没什么活动能力。他问丸仔自己能跳舞吗,他自己觉得不行。但丸仔一看就充满创作热情:能啊。

他说很奇妙,那时他每两个月来指导一次,很快就好了很多,能做越来越多的动作。我觉得这样想起来有点玄学的意味,丸仔也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揣测是这个人身体的生物机能肯定有损失但还没到什么也不能做的地步,只是类风湿关节炎很重,退行性的变化会让他每个动作都不如从前完美,都更力不从心,久而久之,他的身体就没有信心去动起来了。后来有了信心就可以完成一些动作。

丸仔前一段还带着这位“奇迹”见证者跑到香港演出,以前这个人哪里能想到这样的事,除了老家和广州,根本不敢想去太多地方,而且还演出。当然了,丸仔虽然喜欢奇迹,但还算是冷静,不认为他是在做康复训练,也不是在做治疗,是那个人自己发生了变化。

丸仔说他是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他就好了。“他开始就坐在那里不动的,我就说简单的自己动,这是自己很容易控制的事,他慢慢地在打开。不仅是自己动,还跟其他人去动。”

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反着用“温水煮青蛙”这个典故。

我说你跟他们打交道是要一点点总结如何跟他们交流,积累一些经验吗?丸仔说没有。有时候说话太累了,就让别人说,怎么说都可以。有一点,不要有“错”的概念,不要思考准确性。丸仔这个时候提到了尊严。尊严的关键是真实。舞者有各种障碍,视障人士理解的真实是什么?听障呢?没有障碍的人讲的真实与他们感知的真实是有差异的。

我觉得这又有点玄学了。我走了一下神,我们说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某种障碍,但认知上可不一定没有啊。

“所有的东西都不指定的情况下,我要琢磨怎么跟大家找到一个共通的语言。丸仔说比如和盲人说:‘我们看着对方的脸,他可以按照他的理解来,你不用在意他懂不懂。’提要求,比如大家都往前就可以了。它自己会向前发展,它自己的故事,它的方法,它自己的品位,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发展过程。”

没有所谓对错,障碍人士就能对自己做的事情建立信心。“他们什么都做得到,什么都不会错。”丸仔又解释一遍他这个舞蹈团的名字,“共生不错”。

说到走神那一小会儿,是他说的话让我想起前一天在手心咖啡看到的:一个小胖子进门来,很欢快地对着一团空气微笑着说你好。我们正茫然,柜台里视障咖啡师学通跟他打了招呼,小胖子这才找到说话的方向,他们开心寒暄,然后学通带着他到柜台另一边,小胖子闻过了咖啡豆的香气,学通为他做手冲,在摸索了一番咖啡机之后,小胖子又站起来摸着旁边的一扇门,大概纯粹是好奇心。我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忙?曲栋不以为然,他们要是不求助的话,你不用主动做什么。

好像很有道理。这都是跟尊严有关的事。丸仔大名里有个“樑”字,和曲栋在一起时,丸仔开玩笑,说这叫“栋樑”组合。

丸仔说他的舞团叫“共生不错舞团”,就是“不会有错”的意思,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解跳舞,做动作。我们习惯于我们的世界,他们有他们的世界,里面有他们理解的真实。他们并不缺认识世界的能力,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尊重确实不多。

后来我们聊起丸仔的家人,他说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小两岁,妹妹小八岁,弟弟已经结婚了,还没有小孩,妹妹还没有结婚,我算了一下比他小八岁其实也不小了,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妹妹没有结婚。他们家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本来可以很顺利地做事,但不做,也不结婚,也没有一个看起来正经的工作,还穷……在父母那里可能只是不理解,在弟弟那里,多少就有一点抱怨。弟弟说他没有资格做大哥,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批评,丸仔虚心接受。但他也会像一个烂仔那样替自己打圆场,“至少我还知道回家”啊,或者“至少能回家”。

他出生在1975年,大学毕业正是九七前后,他一直做社会活动,我隐约听说他做过不少事。

不过他开始就说:我是香港人,今天不谈政治。

#### **Q: 你最近做了什么有趣的事?**

A: 最近在学怎么在水里跳舞。我2020年3月去泰国的时候,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看起来像在学浮潜,实际上是琢磨在水里怎么动,怎么放松,和在空气中是不一样的,水怎么推动你,你怎么应付水。另外一个人碰你的时候,你的响应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是绳缚。很多人会想到性,实际上它可以无关,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我发现我也很喜欢被人绑。他们有不同的小圈子,不同圈子有不同风格。比如有的会跟女性主义有关系。它们有专业的绳缚表演。一次四个人,三个都是专业的老师,只有我一个学习的。绳子不粗,8到10米,有很多条。(拿出本子来给我看,他为此画的画)

这是我在广州最神奇的发现。我四十多岁了,还能遇到这种表演,这种方式,挺有生命力。

#### **Q: 你还会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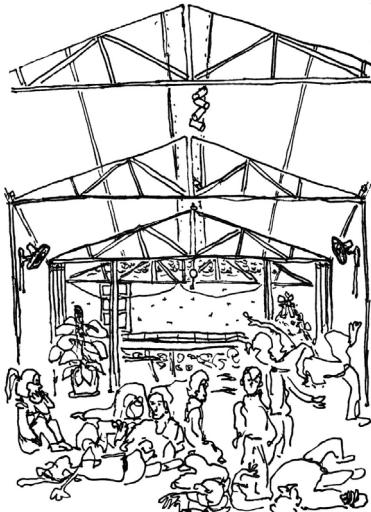
A: 会啊,还卖过。

(在我们谈话间,丸仔不断地从他的包里翻出一些东西,比如一支笔,用来讲解他的港普,然后一本厚厚的大本子,里面是他画的画——画家这个身份,比他是一个舞者更让人确信。看他跳舞的视频,脑子里根深蒂固的那些偏见会不时跳出来——这也算跳舞?但画不会,线条准确,略有点夸张,更强调动作的意义,就跟看到的那些视频一样,各种人翻滚在一起,很准确。他入不敷出的时候,有人来买他的画,卖了几千块钱,解燃眉之急。)

#### **Q: 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赚钱肯定是一个事,但想一想现在生活还是OK吧。你有一笔钱,然后生活几个月,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支出。

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有一个好消息。他是什么人呢,就是在公司里做,工作很辛苦,



实际上很忙，压力很大。我就看着他，我说你的好消息是什么呢。他说他升职了。你看，我以为他说的好消息是他辞职了，终于可以不用这么忙、这么大压力了。我问他升职不是更忙了吗？他说是啊。我说这算什么好消息！

**Q: 你想推荐谁来接力？**

A: 甘杜夫，上海的，一个绳缚艺术家。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将来的事》(2016)剧照

## 专栏

# 060 似玉 当初设定的“35岁退休” 达成，就快乐了吗？

杨樱 | 接力访问

如何填满生活稳定之后的空洞，  
并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

提名似玉接力的黄卫平说，似玉“人狠话不多”。似玉确实说话干脆，行动力强悍，描述自己的人生危机的时候，用的也是快刀斩乱麻的语气。

如果你了解似玉的经历，你就了解了相当一部分1980年代生人的成长轨迹。他们有着相似的轮廓，也有着极为相似的痛苦：在种种物质需求都已经被满足之后，个人的价值感到底应该被安放在何处？换句话说，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

有类似困惑的人，通常都并不贪心，他们没有对财富和名利的一味攀比，不少人还对一味光鲜完美的仪式感生活心有抗拒，觉得本真才是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并且也确实得到了回报——从中获得了自我价值的肯定，也获得了生存安全感。但上一班坐的火车已经到站，而下一班该坐什么他们一无所知，一种滞留在过渡阶段的感觉让他们倍感折磨。似玉可能是这类人里对换车的感觉更清晰的那个，因为是她自己制定了换车时间：35岁赚够了钱，我就“退休”。

她做到了，然后遇到了新一轮的问题。

似玉是1981年生人，从湖南考到天津上大学，之后的结婚、生子、创业都在天津。第一份工作在外企公司做人力资源。28岁开始创业，发挥自己的本行技能，开了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和职业培训公司，而后又自学心理学，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公司——自己接了三年电话，“听了很多悲惨故事”。她也看到了这些讲述背后的情感需求，但这还是在职业范畴之内的感知，很多年后，类似的场景也会在她的生活里出现，那时候她已经很不一样。

事情到两次创业的时候就有点卡壳。这差不多是2013年左右，似玉看起来已经很有

行动力，也很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种种设想，但是两份创业带给她的满足感都在逐渐消散，她能意识到公司的社会价值，但是于她自己而已，还是缺了点什么，并且她很难描述那种被卡住的感觉。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刚工作那几年没有很明显，是因为大公司和创业初期解决问题的过程暂时填满了她的价值需求，同时也在提高她对自己的预期。当一切稳固下来的时候，空洞出现了。在这个时候，她生了第二个孩子。

“其实已经认命了，即使过得没有那么愉快，想想为了孩子之类的，就会认。觉得算了，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以后就继续工作，挣点钱，是吧。”似玉说，女性是很容易认命的。

但这命很难认。她有三年的时间，最常去的地方是美容院，因为实在无聊。与此同时她感觉到自己快死了，“是生命力上的死，事情都在做，但是不过心”。这种感觉很难被丈夫理解，这也成了俩人之间最大的陌生感。

她回头看自己这段生活，觉得自己并非是对所有这些觉得厌倦，而是不能感受到其中的情感。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能。“我不敢跟人建立那种很深的情感关系，包括我的孩子。”

这种感觉最直观的感受是害怕。似玉说，她有很强的和人链接的能力，包括和别人家的孩子相处，耐心和愉快都不在话下，但和自己家的孩子就不行。她必须劝说自己尽量拉长和孩子的相处时间，但还是忍不住会跑掉。后来她发现这种不稳定模式有个坏处，就是孩子反而很难建立预期。于是她就学会了“远观”，还把自己这种心理状态和孩子们探讨过：作为一个妈妈，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总的来说，似玉这个妈妈，除了生活照顾其他方面据说还是靠得住的。她的孩子比较介意的是她极少开家长会，除了期末和开学，其他家长会都不出现。因为似玉受不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车轱辘话，她觉得毫无意义。不过好在生活照顾这件事丈夫可以补全不少工作。还有一件事似玉是没问题的，就是全家一起吃饭。她最享受的就是和孩子们一起吃饭。除此之外似乎就不行了。

似玉这种对深层关系的恐惧，是以一种奇怪的契机被突破的：她看到了身边和她生存状态很不一样的女性。“就是打扮光鲜、化妆精致的人开始出现在我身边了。以前可能也有，但我没注意。我一直对这些不是很在意你知道吗？反正靠脸吃不了饭，这些又麻烦，我给谁看？”

似玉有个观察，她身边出现的这些精致女性，人格独立的不多。“想取悦他人，并不一定是男人。”那时候似玉加入了不少女性团体，比如以舞蹈为载体的，主力参与者都在四五十岁左右，经济基础非常好，平时就“穿得仙仙的”。大家的状态都是不同程度的迷惘，“都没过好你知道吗？”似玉说。不知道她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了某种共同体。

似玉继续说，生活上的僵硬会反映在肢体上，不敢说话，衣着有很多颜色禁忌。跳舞会让她们发现一部分自己的肢体感觉，让自己变得柔软。“之前都是用脑子、用理性去生活的，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就去实现什么，以为这是正确的事情；现在就是要靠感受，跟自己有一个连接。”

这个说法很多接力访问者都提起过，大抵都是“身心灵”的范畴：与自己对话，倾听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和感受，尊重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根据社会规则去驯化它。似玉也有类似的过程。她发现做事的动力得来自爱，而不是恐惧，如果是后者，就会觉得很苦，很不快乐。

感受到这些会让似玉更敢于放手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2020年的时候，她发起了一个教育项目，核心是帮助孩子提高注意力。这来自于她多年从事心理咨询的观察。孩子对学习或者类似的东西缺乏专注力，家长为之苦恼，来寻求对策。似玉觉得，厌学也好，注意力缺失也好，都只是结果，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这个教育项目要求参与者有很长的参与时间，从孩子的角度，就是每周有一次机会稳定地进行某件事，有一个稳定的对象倾听ta说话，关注ta的情绪，给予认知上的反馈。调整就会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从3分钟都坐不住到可以持续更久去做一件事，从混乱的思维方式到自己可以梳理情绪和思考。似玉为此和团队开发了教材、配套程序和测评系统，这些都来自她自己的投入。

但是似玉遇到了两个阻力。第一是家长往往要求速效，项目持续太久会让他们不耐烦。第二是教育政策管控。后者并不是一个直接作用力。说起来有点荒谬，因为大量补课被禁止，很多孩子的焦虑就被缓解了，由此，孩子注意力缺失的症状以及和家长的冲突随之缓解——虽然依然在积压，但不至于出现爆发点。这两个原因都让似玉的项目失去需求。

2022年年初，似玉在武汉参加了死亡咖啡馆活动，随机报名参加带领人培训，并在天津做了二十多场死亡咖啡馆活动。之所以投入这个世界，是她想知道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活得特别值得，死亡之前一个人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遗憾都

有些。了解这些，可以让似玉看到生活价值的方向。

她在正式开始活动之前就发现，很多人都会聊到“下辈子”，其实是一种虚拟语气，就是“如果我……那么我……”这样的假设。当时她还在完成带领人培训作业，采访了身边的朋友。因为了解朋友的实际生活状况，她既而观察到了每个人“被卡在哪里”。绝大多数都是出于某种责任，但同时也是某种认知局限。关于不能做什么事，人最不缺的就是理由。

似玉是不是因此决定抛弃所有可能“压制”自己探索生活的存在，她没有提及。在我们聊天之前，她发来了介绍，很长一段。除了早期两家创业公司和孩子注意力培训项目，她还是大理四家客栈、两个滑翔伞户外运动基地和一个青少年夏令营的创办人，同时活跃在通识哲学和死亡咖啡馆社群。她说所有这些——包括之前的创业以及可能之后会出现的活动、项目——都是生命体验的各种形式。活着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去做，似玉似乎是想表达这种自由激励下的松弛感觉。

不好说似玉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开心的问题，但她至少让自己处于一个当下的状态，至少当年她存下的钱还可以继续支持她的探索。她在大理忙活的时候，两个孩子也来大理玩耍。女儿今年高考结束，她不知道她填了什么志愿。她完全没有参与。



杨 樊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 Q: 最近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A: 做市场推广。类似地推这样的事情，你要去跟人合作。

#### Q 你感觉到的大理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听说很多人都把这里作为重新生活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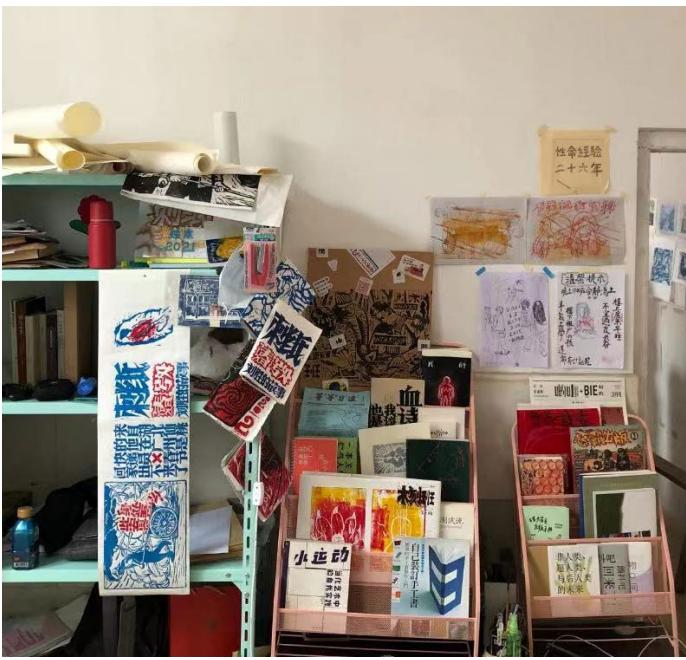
A: 都是疲惫的人，焦虑的人，抑郁的人，各类人群过来游戏和加油的地方。因为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了。大理跟其他的风景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大理已经被定义成这样：大家来这里躺平。在自然风光里理所当然地躺平，你躺平我也躺平，躺一躺，觉得够了，就走了。

#### Q: 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怎么定位个人情感。我也说不清楚，好像很难去描述。就像我跟我孩子不太能够待在一起，是不是？现在我可能在尝试跟他们待在一起，浸润在关系里边。可能要把理性的的东西给去掉，完全去掉不太可能。比如和孩子在一起，你会考虑 ta 长得好不好看，是否比别人优秀，能力是否更强吗？不会。你可能更关注的是跟孩子在一起，氛围、感受好不好，是不是开心。所以我在回到一个感受层面。

#### Q: 想邀请谁来接力？

A: 大智。一个很真实的人，开一家店，同时参与救援队。有时候店没开，可能就是参加救援队培训去了。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存和对社会的关心想得很清楚的人。



题图来自“刺纸”

## 专栏

# 061 陈逸飞 后来我明白了， 你不必凝视旧系统里的道路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被广州和大卫·格雷伯改变的青年。

## 01

1996 年出生的陈逸飞说他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压抑。比如说他无法理解社会上一些事情，明明不应该，但为什么偏偏就那样发生了。他会跟同学吐槽、看看微博，但这样只能做一个“愤青”，就连看书也不完全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画画。好在画画可以让他不那么难受，作为一个内向的人，这是传递感受的最理想尝试了。去北京之前，不管在老家哪里学画，他都是学得最好的。

去北京是一个老师说的，“去中央美院”。没人告诉他还有个叫广州美院的地方其实离家更近。他就自己搜索怎么考中央美院，怎么去北京学画，又自己住进了画室的集体宿舍。后来他听说很多美院的同学是从美院附中来的，那种被命运微妙拨弄的感觉他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这是我的说法——那时候我和他走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深井的村子里，即将去参加他和朋友们的搬家派对——他的原话是，其实这个世界一直都有阶层和信息壁垒的。

后来陈逸飞给我看他北京那会儿的作品，看上去都不是太快乐。死亡、骷髅，黑漆漆的各种。还有一个“坚定的锡兵”，2 米多高，是陈逸飞在北京画的最大也是最后一幅画。只有一条腿的锡兵是安徒生创造的童话形象，陈逸飞很小就记住了这样一个沉默坚定的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

这些作品和后来他做的很多事情一起，收在一个作品集里，用作留学申请。作品集有一个名字，《你和你的艺术站在哪里？》。题目来自一个德国画家，后来也出现在了作品集里：一个人打开门，问坐在房间里画画的画家，“你和你的艺术站在哪里？”画家手边是一张

纸，上面有艺术史上各种流派，而闯入者一只手指向门外，那里正有一支游行队伍经过。两种不同的站位，两种不同的道路。

陈逸飞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试图在身边找答案。自从在北京画室住过集体宿舍之后，他就开始学着表达自己。他强调这一点，并非是之前从未做过这件事，而是为了之后他要做更多类似的事情设立某种开端——如何让自己的观点更清晰、更能获得听众，这是一项至今他还在练习的技能——他会带走得近的同学一起去看展，和他们讨论艺术的各种话题。但北京本身不能为艺术的站位提供新答案，它太主流了，进入那个行业，进入那个学术系统，非此无他。另外一方面，北方那种为人处事他也不太在行。比如他最早美院几个宿舍的室友，抽烟喝酒骂脏话打篮球才能成为哥们，陈逸飞这种戴眼镜的南方小个子，没什么表情说话又很平铺直叙，往往自己以为已经很亲切了，人家觉得他特别高冷。

陈逸飞在中央美院的时候，已经和同学方政、孙逸飞一起成立“夹山改梁”艺术小组，一起参加书展、做公众号、举办展览。后来他们又在中央美院门口的花家地租了个房子，画展就办在家里，也开放沙发给陌生人住。欧飞鸿就是这样出现在他生活中的。



“夹山改梁”发起人合照（拍摄于 2023.7.24）。左上：陈逸飞 右上：孙逸飞 左下：方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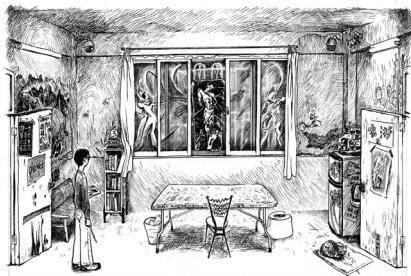
如果没有欧飞鸿向他介绍小洲和另一种生活，陈逸飞那会儿为自己规划的道路就是留学。他要去德国。后来他会说，当时他还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这是之前读的美术史留给他的思维方式：“那种以大师叙述为主的艺术史线索，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杰出人物”。他想知道世界上其他艺术世界会有怎样的面貌——选德国是因为成本更低——中央美院给他的感觉是大家像在操作一门擅长的手艺，思想探讨稀缺，和社会的关联更是模糊。留学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补偿。花家地办展的时候，他计划去海淀学德语，想想光通勤就得两三个小时，成本也高。所以他决定搬去广州，住到欧飞鸿所在小洲村，理由之一是那里靠近广州的歌德语言中心，学德语的成本比较低。

陈逸飞是福建漳浦人，去广州肯定比待在北京要愉快得多。不过即便如此，他也只打算在这过渡一年。他是要出国的。

他来广州还有一个原因，是欧飞鸿向他描述了“上阳台”。不过那是 2019 年，“上阳台”已经没有最热闹时候的气势。这个自组织以多样性著称，按规则申请后，只要旧业主会通过，并能按比例承担房租，就可以成为空间的“业主”。至于发起活动，那只要现有业主大会同意就行，甚至不必先成为“业主”。

空间在广州美院不远处的一个居民楼里，其实是一处底商，格局开放，位置隐蔽。来的人形形色色，表达一度过于自由。来玩过的人都兴奋不已，回到自己的日常里跃跃欲试也想做一个类似的版本。这本来是一个无需使用说明的自适应社群，不过后来监管加强，活动缩水，活泼主动的氛围减弱。陈逸飞最初和欧飞鸿一起去，感觉疏离，“一度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

小洲村的生活要好一点，不过也有适应期。虽然之前有过描述，但是没有亲眼所见，陈逸飞不太知道一个人要让自己家变成公共空间是什么意思。欧飞鸿是个艺术家这没错，但是他从来没见过其他艺术家会这样对待自己家——在自己出门的时候，这个家



陈逸飞漫画描绘自己在小洲时期

便可以开放给朋友使用，与此同时，家是一个壁画修炼场。陈逸飞来广州之后，除了和欧飞鸿一起在叫做“家游”的项目里一起画壁画，后期又衍生出阅览室和驻留功能。欧飞鸿自己住在楼上，底楼是开放的阅览室，几面书架围出一张留宿沙发床，任何人只要申请都可以在这里驻留。而且欧飞鸿不锁门。不是故意不锁，是锁坏了从来没张罗去修过，可能是过于信任底楼那一道公共门锁的缘故。所有这些，陈逸飞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欧飞鸿也没有和陈逸飞“介绍”“上阳台”，只是让他加入自己的日常节奏。如果有大家都感兴趣的活动，那就一起参加。陈逸飞觉得自己最早有点像在拼图，得到很多碎片，自己再试着凑在一起。不过2019年的12月，欧飞鸿拉他一起去做手工书“刺纸”，他自此进入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刺纸”从内容上是欧飞鸿和陈逸飞各自知识结构和朋友资源的整合，既是对某种时代声音的回应，也是对自身经历的回顾。比如《刘胜的故事》或者《经血不脏》，前者讲述小洲里的一个申通快递员的故事，后者由艺术家林发起并主编，是对女性话题



陈逸飞在工作中

月经的阐释。“刺纸”是一个把很多人的经验汇集到一起的过程。到2021年的时候，“刺纸”衍生出漂流书包的项目，就是把包括刺纸在内的各种自出版刊物放进一个特制书包里，在去不同地方做活动的时候交给不同的申请者，相当于一个流动阅览室。“我自己也经常像一个人肉书架，在日本、韩国以及国内各地旅途中都会铺一桌书来分享。”陈逸飞说。

“刺纸”不光是手工书，也可以化身工作坊，感兴趣的人可以现学版画和书籍装帧，并在动手的过程中讨论不同的议题。“刺纸”和“漂流书包”是一种认识朋友的媒介。欧飞鸿会说，“尤其是还没有认识的朋友”。

这样的工作方法和越来越多不同的人开始进入陈逸飞的生活，2020和2021年，广州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空间也达到了最高潮。他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流动性是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在边做边探索这个东西的可能性，它怎么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创作交叉，或者是怎么延伸。”

陈逸飞和欧飞鸿作为一对共同工作的搭档，有相当不同的聊天风格，前者总是试图让自己的表达更精准完整，后者就在日常对话里游走，几乎是混不吝风格。不过两者的搭档倒是相当默契。这也是欧飞鸿推荐陈逸飞继续接力的原因之一。这个小他18岁的年轻人确实有独特之处。

至于搁置留学一事，则要到2020年。疫情管控，物流受阻，不过陈逸飞生活没有太大干扰，只是不能出小洲村。也是在那一年，陈逸飞发现了大卫·格雷伯。那本叫做《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的小书就插在欧飞鸿的公共书架上，不过后者自己当时也没看过。发现这本书让陈逸飞人生的很多模糊问题有了回应，不仅仅从思维方式上，还有具体的实践形式上。

他说：“看完我知道了一条：不需要凝视着旧系统的道路。直接从自己和身边去尝试发明新的世界、新的生活。”

你可以理解为这本书颠覆了陈逸飞对很多概念的认知方式，包括政治、社会、国家、机构和人性。大卫·格雷伯是个说话不掉书袋的人，他以一种很诚恳的语气反思了自己所在的人类学专业，为什么它明明掌握人类社会不同样貌的标本，却从不愿意将之作用于现有的社会的任何改善？

这可能是探讨无政府主义最为和善的方式之一。

陈逸飞把《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看成一本关于“爱与希望”的书。“它就说，你不相信人是可以不需要被规则规训，被威权统治，被领导塑造的。”总的来说，大卫·格雷伯负责提出问题，以及提供若干回应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视角制造的效果是振奋人心的，就如陈逸飞后来感知到的，“它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其他的可能。”

## 02

《刺纸》最近一期是陈逸飞和朋友李平一起做的，内容是“更年期”。这个选题来得有点偶然。李平50岁了，在大公司工作多年，很显然也在对抗某种中年危机，策略是打算去英国留学学艺术。她报名了一家留学辅导机构，老师也挺时髦，听说她想学版画，建议她去联系“刺纸”。于是李平亲自跑到了小洲，成了陈逸飞的朋友。



陈逸飞在工作中

李平是一个不一般的朋友。不仅在陈逸飞的推荐下买了《经血不脏》，还觉得《经血不脏》的内容制作方式也适合自己关心的一个话题：“更年期”。

陈逸飞没有展开描述他们是怎么展开关于更年期的讨论的。只是转述了李平告诉他的一一个经历：某天晚上因为心里老是对儿子的事情过不去，就一晚上没睡着。

李平说，这就是一种更年期症状。

这促使陈逸飞答应做这期“刺纸”。因为他也想到了自己母亲的一次失眠。

“我妈有一次也跟我说，因为我什么事情，或者好像就是因为我和她通话的时候不小心点开了视频，她发现我那阵子在留胡子，就觉得我有事，一晚上没睡觉。我就联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更年期很难控制自己的表现？”

其实我也好奇陈逸飞要如何和李平做更多探讨，毕竟这是一个他既无知识积累，也绝无经验感知的话题。

他寻求了女性朋友们的帮助。具体的方式就是在李平自己的经历之外，女性朋友会发起和母亲的对话，陈逸飞女朋友帮忙进行约稿……不是所有的妈妈级别的被访问者都有撰稿的能力，因此很多就变成了组织讨论并整理对话的要点。

我想起来他做这一期选题的初衷：“那你问没问你妈妈？”

陈逸飞在这个问题上罕见比较慌乱：“我妈妈没有那种转化（写稿）的能力……我也没那么确定我妈到底有没有到……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清不清楚这个事情的定义或者是不是在这个状态……也可能她还没到……”

我只好换了一个问题：“你妈妈是怎样一个人？”

“比较强势，对观念比较固执，很典型的闽南妈妈。”

我不知道典型的闽南妈妈会是怎样，但从后来陈逸飞说的来看，陈妈妈是某种艺术家妈妈：对儿子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五险一金充满了担忧。至于他的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这都不是太重要。原本以为去北京上大学之后就可以平步青云，什么事情就会变成这样呢？尤其是住在广州的一个村子里，看着也是惨兮兮的。早知道不要送去学画画了……

比较能理解陈逸飞的是爸爸。爸爸觉得陈逸飞去参加艺术活动或者书展，相当于自己去广交会，是一种拓展潜在客户的方式。此外他们有一些价值观层面的交流——陈逸飞的爸爸很厌恶身边的朋友同学见面只会讨论谁赚钱最多，以及人应该有多少钱等等之类，陈逸飞就对爸爸说，人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不能只为钱而活。

他说自己有的时候也得“画饼”，说自己是在为未来投资，不应该过于注重眼前的回报。这些话题说完之后，我们就从“妈妈到底有没有更年期”这件事上滑走了。

### 03

陈逸飞最近的确是要去德国了，不过不是留学，而是拿到了一个研究项目的奖学金。他的课题是“自组织与社群艺术的可能性”。此时他已经退掉广州的租房，在飞鸿和一些朋友家蹭住，直到拿到签证为止。

我们在“刺高联”（刺纸和高压俱乐部联合会，刺纸和朋友们的一个空间代号）乔迁派对上见面，作为“刺纸”成员之一，陈逸飞的工作是提供酒水以及其他服务。几十个衣着不同寻常的年轻男女出现在深井小学旁边的一家铺面里，这里是欧飞鸿继小洲村之后的新活动空间。一个古琴专业的长发男生负责打碟，简易灯球在水泥广场和店铺门面打出彩色光斑，有人在跳舞，有人在聊天，有人在推手。

这个乔迁派对是一个叫做“游动论”的活动的一部分。这个古怪名字背后的实际动作是空间交流，陈逸飞去德国研究“自组织和社群”，说起来也很像一个时间被拉得更长的考察交流。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韩国釜山艺术节和日本东京做过关于广州空间和活动的分享，时间分别是 2022 年末和 2023 年春天。我说你这看着挺国际化。陈逸飞不置可否：“但是我英文一般。日文只在五十音基础上会讲几个句子。韩文字母表都还没记住。”

他说这路线安排的一部分考虑是去谈恋爱。

陈逸飞和女朋友是后者来小洲“刺纸”工作室玩的时候认识的。2022 年 9 月去了东京念研究生。12 月的时候，韩国签证更容易办下来，又因为陈逸飞的香港朋友认识韩国策划人金建宇，后者是釜山艺术节的策划者之一，于是俩人约在了釜山。

谈恋爱又要干活，在韩国如此，日本也是如此。不过谈恋爱不耽误学习。从日本回来之后，他又在漳浦家里、广州、武汉、长沙分别做了一次“草芥之梦：日本漫游见闻”的分享会。那是一个长长的人名和社会团体清单，相应的，陈逸飞从日本带回来的书籍、小册子、单页、漫画和画册摆满了一大张桌子。它们共同的主题是平民艺术，“王道乐土叙事之外

平民的处境和创造”。



分享会海报，由陈逸飞设计



#从日本带回来的部分书籍、漫画、画册

此时“你和你的艺术站在哪里”已经不再是一个迷惘的提问，而是有着清晰答案的一系列陈述。并且这些陈述还在生长之中。

在韩国，陈逸飞看到了首尔版本的“上阳台”，叫“Beyond Suyu 104”，一个已经存在 20 年的社区，同样围绕一个空间进行不同的社群活动。除了活动那里还提供餐食，以某种公社的方式进行。整个空间可以打乒乓、做瑜伽、练习书法、阅读。参与者定期分担打扫工作。

至于要去德国看什么，陈逸飞还没把握。他设想的路径比较像那种资深旅行者，到一个气味相投的地方，问问当地人有什么推荐。网上也能找到一些，比如柏林一个叫浮动大学的地方（Floating University）。陈逸飞从手机里翻出资料照片给我看。一些人站在湖中。一种临时建筑。看上去没有什么视觉上的特别之处。

陈逸飞说他暂时也只能通过这些图片想象一些议题，但是他直觉柏林这样的地方会有生产不同的内容，比如可以灵活拆装的建筑物。此外，和广州之前“上阳台”里发生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在于，欧美的这一类自组织空间往往看起来有激进的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诉求，但同时也处于更自由更安全的社会环境之中。至少陈逸飞觉得这是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和政治概念下进行的异体实践，更像是某种共存。知道这些差异化存在，或许有助于他回到广州之后引入新的活动和做事方式。

他本来没有对自己的申请抱多大期望——毕竟计划书里一张图片也没有，而他说的事情大多数都比较抽象——直到接到面试通知。陈逸飞和朋友研究了面试官的推特，发现她研究中国问题，于是在面试的时候作了相应的回应。

可以做的事情太多。

他开始重新理解艺术作品对社会的作用力，不再是作品，而是实际的应用，比如说包装设计。他提到包豪斯和其背后的社会理想，也许他们用建筑和生活用品改变、影响社会的方法也可以成为他的一种思路。

他希望以后能像广州的朋友们一样，发展出不同的空间和网络。在那个设想里，“应该有更丰富的自我学习环境，在其中有更多的互相激发和生产”。

这个“将来时”青年，又严肃，又踌躇满志。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最近就是游动论了。在各地与不同人相遇，并且在广州的前台空间还持续策划着几场自己也很想听的分享活动。

**Q: 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签证问题。已经找了黄牛了还没排到号。而且黄牛答应的期限都已经过了。

**Q: 想要邀请谁做接力？**

A: 我推荐我的半个老乡大爱。大爱来自云霄，我老家漳浦的隔壁县，她主编《城关阿志》，描绘着县城的珍贵之处，也记录着县城的困境；还想推荐思培，漂流书包就是诞生于她策划的展览“穿针引线”，也能回应到我提出的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无主之作》(2018)剧照

专栏  
062 小泉

## 感知自己所处的社会 是一种能力

杨樱 | 接力访问

另一种能力是把感知表达出来。

小泉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总要在一大堆说明里绕好一会儿。比如，一个时尚品牌旗下的媒体栏目采访他，介绍是这样的：“王懿泉，以小泉的名号行走江湖多年，拥有多重身份：策展人、艺术家、事务所合伙人、艺术媒体人”。

小泉补充了后半句：“在工作室，他有 50% 是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和 WHYNOTTHINK 咨询的合伙人，20% 是一位艺术家，25% 是一位策展人。至于剩下的 5%，他说自己是一个吉祥物。”

其实听他多说几句，就会明白小泉想通过自我介绍做到很多事：希望告诉别人自己的多样性，试图去解答人们心中未出口的疑惑，想要让最应季最当下的议题和说话方式加入到自己的陈述里，因为他确实也是这些东西的密切关注者。他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擅长这么做。聊天的时候好几次为了不让刚想问的问题滑走，我不得不打断他的即兴演讲，如果不这么做，他可以派生出层层话题，然后在你以为已经离题万里的时候，陡然杀回最初的话头。

挺能侃的，用北京话说。

小泉是北京人，1987 年生。本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新闻，拜学校性质所赐，得以掌握新闻在中西两种不同语境的不同定义和使命。不过他在大一，最晚不过大二的时候就张罗着要去学艺术，一来是因为学校提供形形色色的课程，从建筑、哲学入门到戏曲研究，他都饶有兴趣地学了，人文视野从此不一样；二来有一个朋友爱好艺术，常在一块儿分享，学校图书馆又有各种大使馆捐赠的艺术书，让他发现艺术有其他学科没有的融合性和灵活性。不过还有个事儿也挺重要，即他作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意识到他能找到的本行工作和他的个性可能并不能达成一致。

说起来这个事情要从口述历史联系开始——至于是老师回避历史讲述还是鼓励学生直面历史就不得而知——总之就是小泉的老师在讲到国共和文革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建议同学们回家和父母长辈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比问老师更好。

那时候小泉有一个 MP3 爱国者还是三星他忘了堂哥送的高考礼物他常拿着它录音。他记忆里出乎意料的家族历史是大伯说的一段往事。“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我们家族闯关东到了东北那一支回到北京来寻亲了，竟然就找到了家里。但是我爷爷做主，两家人不认亲，然后就切断了联系。”小泉说：“原因当时没说。”他是这么分析的：

我当时听下来觉得可能是经济原因，我估摸那时候是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了对吧，我爷爷开始当家作主，我家那时候都变成农民了，家里突然多了人是不是要给你分地，这是很现实的……我爷爷那么多孩子，7 个，再认亲人就太多了，是吧？

小泉家住五棵松，玉泉路，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总听爷爷奶奶说祖上的故事。他看自己的面相——和奶奶很像——觉得自己有蒙古或者满人的基因，不过这事儿没法考证，至少在父亲和大伯那里就无法达成一致。小泉认为，诸如此类的过去就是历史的裂缝。他对这些缝隙极感兴趣——不仅是自己家的，还有别人的：不仅是关于家族血缘的，还有其他历史时期和事件——但是他认为，以公共信息的披露程度、公共记忆被修改的方式，还有个人记忆的碎片化程度，这缝隙是注定无法填满的。他也“一定得不到新华社外交部之类的工作”，而这是他们学校的常见出路之一。也有可能这是小泉的一个借口，但他确实打定主意去读艺术硕士，为此被本科同学持续怀疑，因为觉得他根本来不及现学什么手艺，申请注定坎坷。

手艺，或者用小泉的话说，造型能力，确实是一个困扰小泉很久很久的问题。但并不是考研这件事。考研的时候他申请了中央圣马丁的“叙事空间”，这是建筑系旗下的一门专业，允许跨学科。其实他在读这个专业的时候已经有机会发现自己最擅长也是最乐意从事的工作方式，但那会儿他被“造型能力”困扰，一心一意把自己设定为艺术家。而这困扰的时间，几乎持续了 10 年。

关于这 10 年间小泉如何锚定自己应当以一种手艺人的执着练习造型能力，而又如何因为缺乏耐心和信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应当也有很长的故事可讲。在这 10 年间，他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做过表演艺术，从事过艺术媒体，给人做过艺术公关咨询……直到疫情开始之后，他渐渐意识到，他真正喜欢的事情还是和他最初的专业有点关系：把各种各样的信息以某种方式关联起来。他擅长沟通、转译、提炼……至于造型，他终于确定，找人合作更适合自己。

意识到这一点对小泉某种意义上是种解脱，虽然他很快又进入另一种纠结：如何把自己对政治和社会的感受评价变成一种可以输出的内容。这事儿他过不去。他认为一个人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知是重要的——如果 ta 能有感知的话。比如说这么多年断断续续在做的口述历史，一开始是自己家人和太太的家人，后来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像职



陈翠梅作品《野蛮入侵》

业习惯一样和人聊起家族。

小泉不久前为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策划过一个展览，因为这次交往，他意识到不能很简单地介绍陈翠梅为“华裔”。

“那天在上海我又和她聊到马来西亚身份的问题，我问她，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她爷爷很早就去了南洋，父亲 1940 年代出生在金门，然后两岸炮弹打得比较严重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她的父亲去找爷爷——我推算的应该是 50 年代中期到了马来西亚——她是 1978 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然后我说，你是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对吧？她就说，她要到 2013 年马来西亚大选的时候更加觉察到自己的马来西亚身份。因为当时她发现这个政治事件和作为华人的自己是有关的。”

小泉给我看他手机里的一长串文件夹。都是他搜罗的林林总总的信息碎片。其中有一些都和这些家族历史有关。比如他很快就翻出一份截屏，内容是 2017 年 9 月 6 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的文章：《谍影疑云：消失在朝鲜的亲人》。若是在纸媒时代，这基本上就属于剪报了。之所以留下这篇文章，是他觉得个人家庭故事背后可能是更为宏大的政治背景，而两者互为理解历史的路径。

有的时候他连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别人家族故事也会留意。小泉不觉得这些是八卦或者家长里短，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把自己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变成某种展览或者表达，也许他会混淆虚构和非虚构，他希望让受众知道一切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可循，但又被具体的叙事吸引……

在小泉跟我讲的故事里面，最动人的是他的父母。

我也是到大学之后做调研才知道，80 年代邓小平提倡办乡镇企业，你看过那电视剧吗？我妈就是《大江大河》里边的杨巡。1949 年之后，我们家那边的人都成为了农民，不管之前是啥，反正农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家里都有地，但我们所有的地在 1950 年代都变成了人民公社，到现在还在人民公社变体里边。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子女们都顺利成为了农民，然后在农村公社干活。到 1980 年代文革之后，经济开始活跃，乡镇企业就要把有技术、有初高中文凭、有小学文凭的人转到企业里，所以由公社和村书记牵头，组了汽修队、珐琅厂、陶瓷厂，所以我妈妈变成了珐琅厂的工人，名义上是工人，其实还是农村户口。

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也慢慢起来了，广东制造业和外商也慢慢开始进来了深圳开始实验了，你会发现北方的一些技术储能完全不行，加工业很薄弱。第二点，村办企业一开始能满足 80 年代初的市场，80 年代中后期，珐琅厂不太行了，我妈妈就开始准备自己要创业了。她一边在厂子上班，完成日常掐丝珐琅的这些活儿，他一边在跟我姨夫、就是她的妹夫一块开始学驾照，最后我妈妈变成了一个大卡车司机。后来我姨夫搞到了钱，买了一辆大卡车，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北京做运输，很辛苦。

我小时候是在传统北京农村的四合院长大的，有自留地，父母太忙，只是晚上回来睡觉而已。90 年代中期，房地产起来了，我爸妈他们做运输就赚到了钱，然后他们买下卡车，自己做一个运输生意。我爸爸因为是专业的汽修师，还留在修车队，但修车队也没有什么活，因为整个乡镇的运输队没什么效益了。我爸有大量空闲时间，就修自己家的车。我爸妈都保留了乡镇体制内的职业，然后自己创业，当时工作制度是大小礼拜，一周 6 天工作，我父母可能工作 7 天。

再到 90 年代中后期——我推荐你一部电影，管虎的《上车，走吧》。两个年轻农民，黄渤和高虎演的，他们想脱离土地来北京，最后就承包了北京老板的中巴车队，做司机和售票员——我爸妈后来就从卡车变成公共汽车，开始做小中巴运输生意，跑玉泉路到公主坟 373 这条线路。那个时候我爸妈发财了。

当时有大的 373 和小 373。大家叫大公共和小公共。车票 5 毛和一块，开始 5 毛，后来变成一块，再后来变成了 2 块。小中巴一开始很多人不信任，其实它缓解了大公共，因为你挤不上去；后来北京又涌入了很多，公交运力不足。所以有一些财务比较好的人会选择乘坐。民营和个体要加入城市公交系统，有经营门槛，需要交笔钱。大概在 2000 年代初，可能非典之前，北京政府推出新的政策，就停止民营小公司和个体进入到这个行业。

当时我爸妈就没有办法做这个生意了，就转型，不过他们错过了一班车。那时候很好的转型方向是从小公共汽车的运营变成 4s 店。但是 4s 店需要固定店面和一笔代理费，去代理上海大众或一汽大众或者宝马，然后我爸妈就在决策过程中错过了。我一个舅舅，沾一点点亲戚，他就进入汽车销售业了，很快就赚到了钱，买了几套房。

我妈妈可能觉得拼搏了这么多年，也累了。我猜女性可能 40 多岁出头了，儿子也上了中学了，然后老人也老了，还是要照顾家庭。于是我妈就去保险公司上班了。

小泉的妈妈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说了几句话：“如果你现在工作了，你就变成一只小毛驴。”小泉在眼睛上比划了一下，“北方拉磨的小毛驴，戴着眼罩”，然后继续转述他妈妈的话：“我妈说，你就会在围着磨盘来回转。儿子，区别就是你早一年还是晚一年挣钱，对我来讲仅此而已。但是如果你有能力考研或者出国，钱我还能承担得起的话，我就给你这个钱。因为这样你可能延迟几年做小毛驴，或者说接下来你眼界打开了，就不是小毛驴了。”

这是不是小泉去圣马丁学艺术的动力，他没有说。不过出国对他来说确实意味着了解不同社会规则的机会。这也解释，他看到导演郑晓龙的某次访谈的时候为何会如此惊讶。

小泉继续在他的信息收纳堆里扒拉出来几帧截屏，是郑晓龙在 2012 年的时候接受一部纪录片的采访，谈及北京出国热。他谈到了自己当年拍摄的《北京人在纽约》，说当时拍这部片子，是为了给出国热降温并让出国率下降。他对自己完成了这件事觉得很有成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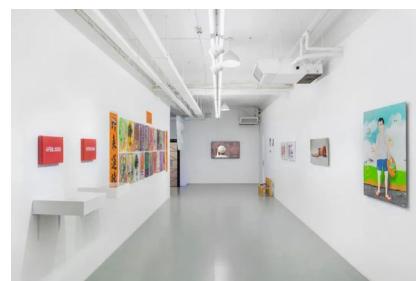
《北京人在纽约》上映时间是 1994 年，不管郑晓龙的任务如何，很多人都把它当成了大开眼界的路径：不少人第一次看到了美国。小泉作为一个北京人，有开拓者的身份认同，也从未想过，这事会有另一种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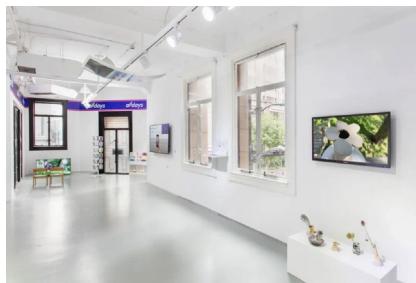
《吾辈》展览海报

“我就想，文艺家、艺术家，就文化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电视剧是为了干预社会，带着明显的政策角度，对影视人来说这是不是值得自豪的？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做《吾辈》，我就想把咱们自己的事儿讲清楚。我们 80 后也是看着前辈的片子长大的，我们有自己自由的解读，但是我们很少在公共表达中表达过对自由的追求，而很多电影电视剧在官方媒体上表达的是另一种东西，两代人之间可能完全是误解。我们认为那片子真牛，他们说那其实是为了抑制自由。”

《吾辈》是小泉在 2022 年 8 月上海发起的展览，一共有 33 位出生于 1980 年代的艺术家参展。现场布展有一个“关于纽约的小角落”，还有特定的“时间和运势”，也就是对时代的脚注。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这个展览多少说明了小泉的焦虑。不是个人生活那种，是自己终究将面对怎样的时代。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答案。“这个时代不属于我这样的人。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内循环是循环的了的吗，现在国际循环也循环不了吧？”他不确定在艺术这件事上，他未来需要怎样的能力才能和受众有效沟通。不光是他一个人，按照他的说法，主流艺术媒体给国内多样性艺术的版面少到几乎没有了。

说起这些的时候小泉就有点愤世嫉俗。他用了一句老派歌词。“我拿青春赌明天。”他说：“我已经看到牌桌是这样的，我还赌吗？”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吗？**

A: 在浙江衢州龙游县做一展览，在当地村里的一个民房里，名字叫“饮食超链接”，就是讨论吃的和本地文化的关系。还跟那间民房隔壁，叫“聚贤饭店”的农家菜和老板合作一个饭局，还给老板做了口述历史。老板在北京木樨园做过服装生意，提起了北京的浙江村，后来还去了石家庄和贵州做别的生意，然后现在他回家了，真正回到了浙江的农村，很有意思。

**Q: 你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关心我的事务所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的发展问题。我们是一家跨学科的事务所，因为跨学科这个词很新，我们应该如何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让需要与我们建立合作的伙伴们找到我们。核心竞争力上面，我们该如何让市场为知识付费，如何提高设计费、改善设计行业里的“买方市场”现状。

**Q: 你想要找谁来接力？**

A: 电影人郭晓东。他对于 90 年代的体验和记忆比我更深，2000 年代初他就热火朝天的参与了那时候北京的文化艺术活动，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这些年，他的工作集中在电影领域，他发起了好几个项目，比如说新亚洲影志、新亚洲电影奖、庐舍社团。这些电影团体的气质都有一种自我组织感在其中，有自由自在也有连结互助。我很羡慕他。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专栏

# 063 梁莹菲 “我不想离社会太远， 但是我又不想太进去”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摄影记者，  
想远离标签化和“上帝视角”。

小饼干在邀请梁莹菲接力的时候，提到后者说的一句话，“关于创作，别人总是问我有什么想法，但其实我不是因为有想法，而是因为有很多痛苦”。

后来我在广州昌岗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见到梁莹菲，她说这句话其实是她刚结识的一位朋友说的，后者严重抑郁，并在这样的状态下参与了艺术家满宇发起的“一个人的社会”项目，这个项目要求一个人深度介入自我，并以某种创作形式表达出来。梁莹菲想知道，是什么驱动她参加“这么小众的活动”，是不是她一开始就知道要创作的东西是什么。

后者回答说，没有，一开始就只是意识到了痛苦而已。

梁莹菲觉得这话说得妙，“为什么我们想去做一些东西？最开始更像是我们只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因为觉得痛苦，所以才开始去探索我们要说什么。”

“所以你认同这句话，是因为你有你的痛苦是吗？”

“对比起来，我已经是一个蛮普通的人。做的东西都是这打一枪那打一枪的。我没有深刻的痛苦，我可能是有同理心去感受别人的痛苦。”

梁莹菲之前是《财新》的摄影记者。平时她报选题，在选题通过后抵达事件发生的地点拍摄影像（照片或者视频），然后配合文字在财新发表图片故事。

见面之后我才想起来，之前在做孟建英的接力访问的时候，看到过梁莹菲署名的故事：那些侗族打工者在江边排练侗戏的场景，还有孟建英在五金加工厂里工作的样子。当时我的感受是，照片比文字好。虽然文字以现场描述和事件叙述为主，但梁莹菲有很多叙事者的问题，绕不过去形容词和赋魅的陷阱。这和技能训练有关。但是影像通常

可以弥补文字信息的短板。从媒体需求的角度看，这也是她的工作的核心价值。

不过工作8年之后，梁莹菲连这一点也很犹疑。这可能是某种算不上痛苦、却更为根本的问题：你的工作价值到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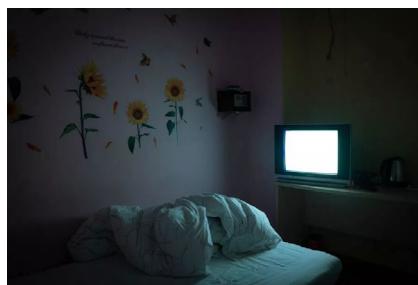
她说她经常会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也怀疑自己做的事情的意义：“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我做一个社会新闻，去拍拆迁、农民失地、失独父母，这些是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也拍了，或许对他们也是重要的，但是后来我又觉得，或许真正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表面上的，而是一个人内在发生的风暴。我想拍那些。”

2018年，梁莹菲做了一部关于“性侵”的影像项目。她在此前参加过一场公益徒步，小饼干也在其中，不过两个人交集不多。一直到2018年，小饼干公开揭露当年徒步时的性侵者，梁莹菲才意识到原来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自己和对方朝夕相处，却一无所知。在复杂的心情下，她发起展览，除了使用当时徒步时拍的照片，还有当事人此后的日记摘录、照片和其他性侵受害者的口述摘录，还邀请其他人朗读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性侵害故事。这个叫做《伤痕之下》的影像项目入选2019连州国际摄影展，还拿了奖。[后来展览被整理成文字，发在“财新mini”公众号上。](#)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梁莹菲看过一张弦子的照片。央视前实习生弦子也是在2018年提起对央视主持人朱军的性骚扰指控，并提交至法院。当时弦子接受路透社采访，摄影师拍了一张照片，是她在一个空房间里背对着镜头的样子。这是一张其实让弦子很崩溃的照片。因为她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需要隐藏自己的受害者形象，但是她无法改变媒体的叙事方式，只能写一篇微博反对自己被呈现的形象。

这篇微博让梁莹菲印象深刻。她在影像项目里使用的照片其实都与性侵本身以及当事人本身无关，反而都是事情过程中或者之后的一些环境，比如失眠时的天花板，徒步时路边的鸟……她更希望这些影像和文字、声音一起搭建某种场景，让人意识到性侵害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也不能被一两个标签所概括。



梁莹菲将受访者的创伤记忆进行了影像化的再现

不过这更多像一个个人项目，在职业环境里，梁莹菲有很常见的无力感。其实她原本是学广告的——她出生于 1990 年——在她毕业前后，短视频平台和直播正好颠覆了原有广告行业的运行规则，但她学的还是《广告狂人》那种传统广告业的做事方式。因为大学有很多人去做了摄影记者，前辈提携，她才进入了这一行。

她日常和社会新闻打交道，理论上要把事件发生现场用影像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不过新闻纪实摄影也面临民主化和碎片化的冲击，辛苦拍到的照片可能不如微博上的普通在场者来得有说服力，后者虽然技术不够好，但胜在位置、数量和速度。

与此同时，梁莹菲去到现场，直面当事人的痛苦和寄望，却发现自己能做的总是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推动这件事的发展，去促进良性的反响，甚至也不会有什么反响。就像石头丢进海里，你慢慢会觉得虚无在累积，而且对方对你寄托那么多，你只能这样。”

有的时候她会责怪自己。武汉疫情时候她曾经采访过一位失去妻子的老人。她拍的视频后来在海外比赛里拿了奖，影响力扩大，老人被有关部门找去问话。我对梁莹菲说这不能怪她，这是她和老人共同面对的压力，但她看起来难以释怀，觉得自己拿了好处，而对方只有麻烦。

后来东航坠机，梁莹菲连夜翻山进去拍照。“就是为了拍那张小小的照片，然后就看到新华社之类的（媒体）直接坐车，就这样到现场，根本不费一点力气。那你这么辛苦是为什么呢？如果大家是公平的，我还可以用我的视角去拍不一样的照片，但你不能让我像做贼一样溜进去，进去了以后还拍不了。”

我觉得我和梁莹菲的对话有一整个媒体业崩塌的象征画面，出于不知道挽回一点什么的考虑，我提起上海疫情期间一张很有名的照片：深夜的五原路上，一个老人费力地拉着半身不遂的妻子去做核酸，没有轮椅，妻子坐在转椅上。路灯映照下，悬铃木的影子散落在俩人周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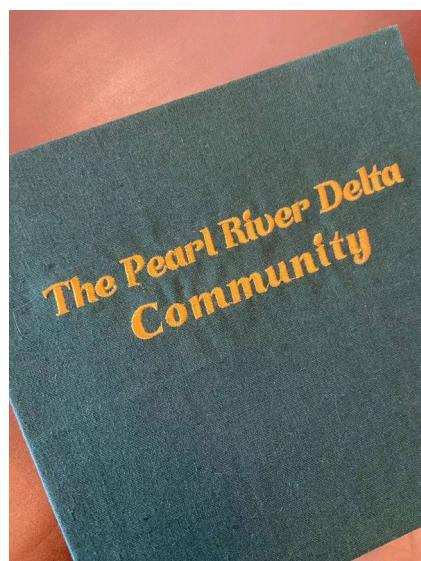
“我知道这张。雍和拍的。”梁莹菲说。雍和是上海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之一。

我说是，以及这张照片解封后还在某个画廊短暂展出。观看者无不感动。

梁莹菲说：“但是我有时候会考虑被当成符号的人，ta 自己是怎么想的。比如说轮椅上的老人，她看到自己的照片在网上传播的时候，她会想什么呢？”梁莹菲在上海封城的时候看了很多流出的照片，身在广州，却记得上海不同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我想了一下，也只能承认这张照片是象征性的。并且象征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人眼里必然是不同的。

梁莹菲可能想逃离这种象征性，所以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做了一本手工书。她在咖啡馆里掏出书给我看。绿色布面封皮，看起来很像小时候的照相簿。左右翻页，照片与照片之间有叙事上的呼应，有的小一号的照片可以从大一点的照片上抽出、展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

梁莹菲一边翻一边解说。“我采访了很多珠三角的外来务工者，还有一些外国商人，其实他们理论上都分属于不同的群体，比如少数民族，比如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感觉他们的状态很像，都是那种在异乡打拼、又拼命想留在这里的人。”

我认出一些地方。这是小北。对。他们是谁？昭觉来的彝族务工者。昭觉在哪里？凉山，被政府那种对接务工的人接到佛山去打工。

我们就在类似的对话里一页页翻过这本书。“这都是我之前做的一些图片故事。”确实，我看到了之前在电脑前看过的照片，侗族打工人在排练。

“这是一个彝族少年，在东莞的一个溜冰场。这是深圳的白石洲，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现在已经拆了。我觉得这两张照片里的样子很像同一个地方，就是那种生活在很拥挤的缝隙里的感觉。”

“这是康乐村的一个老板，我把他和一个小北的老板放在一起。”



确实很有意思，两个人都把精神领袖挂在墙上。小北老板挂着一个南非球员，康乐村的老板挂着财神和毛泽东像。

我在手工书里走过很多地方。如果没有梁莹菲的介绍，有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永远不会知道。她做了 20 本，放在微信朋友圈里，除了手上这一本都卖完了。一个前同事也买了一本。

这些拍摄于 2015 至 2022 年的照片有了和媒体报道迥然不同的叙事。“如果是媒体，这些照片会分散在不同的报道里，而且我觉得新闻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没发生点什么，就很难被报道了。但是做书不需要，我发现他们之间有相似点，就把它们放在一起。”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特别 local，就是我不会了解背井离乡的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文化，从来不会不自在，而且我一直在广州读书工作。所以在接触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就被带到这里来了。他们的状态、表情、眼神都是不一样的。”

我问：“如果你不做摄影记者，你会注意到这些吗？”

“高中大学的时候会，但我不会敢和他们说话。本地人都有点排外，就是小时候我家楼下有外地人吃烧烤，很晚还很吵闹，我妈就直接泼水下去，然后他们就提着刀冲到我家门口这样。我以前在一个书店，一个黑人问我会不会英语，我直接说不会，但他是用英语问的。就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可能意识到他们和自己不一样。”

最近梁莹菲开始做第二件事，画画。她以前为了考美院也画画，后来变成兴趣爱好。如今画画让她感觉到放松。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不必再承担对他者的责任，不会因为拍摄了什么就导致对方遭遇麻烦，另一个是可以表达更为不可言说的东西。

比如她发现家附近有一片回迁房，房顶一盏特别亮的路灯，恰好像舞台灯光一样照向一个流浪汉的落脚处，每天晚上都如是。梁莹菲就画下了这个场景。

她觉得画画这样的事情可以让她回到个人视角。她接受最传统的新闻摄影训练，一



梁莹菲的画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张照片应该体现被拍摄对象的某种特质。“但这不是很霸权吗？你决定了ta看起来是什么，你决定ta应当传递什么信息：肤色、眼神、在怎样的环境里。”

“我不喜欢这种上帝视角，凭什么？你凭什么觉得自己知道的就更多一些？”

**Q: 你最近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画了很多光膀子的男性，这也算是一种反男性凝视对不对？我觉得他们的肉体其实挺美的，类似这种（展示画作），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而且他们是免费的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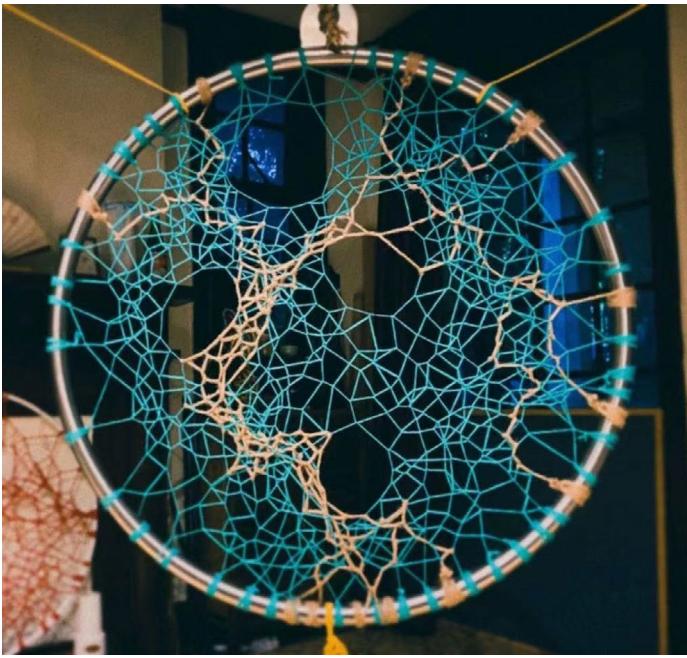
**Q: 你最近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A: 具体问题就是我在考托福。然后我最近还想画很多东西，但是我没有时间，可能考完托福以后就会开始画。我不想因为画画离社会太远，但是我又不想太进去。对，所以我要找一个平衡点。

另外我正在策划一些新的拍摄计划，肯定不能跟我以前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不允许还是一样的。

**Q: 想找谁来接力？**

A: 张晓磊。在我当记者的时候，他在一家环保NGO工作，后来他从机构独立出来，还做公益。现在环境议题都比较容易得到资金赞助，他却选择了另一种不声不响的方式做事。最近可能在考察野生动物。他也是我见过最没有攻击性、最谦逊的男性。



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甘道夫的办公室在心理学系楼中间的一个小房间，四面无窗，压抑得像个牢房。他自己贴上了窗户，面朝大海。

败绩”。

回国之后，甘道夫的故事听起来就像一个很正式的时代悲剧了。四个人约好回国创业，他先回来了，另外几个没回来，这事儿就耽搁了，耽搁到疫情来了，感觉就错过了所有。整个世界都不是以前那个了。

他一开始做的事情与他的经历有点关系。2018年《自然》杂志有一篇文章说科研人员的心理健康，三分之二的新晋学术研究者或者叫新手科学家容易焦虑或者抑郁。这事儿与学术生产的制度有关，比如最常见的，给导师做助理，这是一个职业还是学习的过程？很多人处在一个非常不明确的评价体系当中，导师对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学生的劳动有可能会被剥削。甘道夫的导师曾经就是这么一个体制的受害者，好不容易熬出头来，结果遇人不淑，第一个学生选了甘道夫，还没来得及剥削就抑郁了。

中国高校里这样的事儿也不少，于是甘道夫开始做起科研人员心理健康倡导，希望这些现象能引起更多的关注，但终究没什么效果。

随后疫情来了，回去上学的计划也搁浅，这时甘道夫有一个朋友在杭州经营女性社群，她请甘道夫做一个视频课，讲关于绳缚的历史和文化。做了一次之后他想，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做一个工作坊？

甘道夫是那种学习也好、家境也好的小孩，从小自信而且自由，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情欲表达跟绳缚有关，没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而是开始琢磨它。他从高中时就认准要学心理学，原本以为与此有关，但他说其实只是讨厌文理分科，想找个兼顾人文与科学的方向。

甘道夫茶桌上有一个杯子。那个杯子被细绳捆绑起来，上面趴着一个哆啦A梦，原来的设计是可以攀在杯沿上，然而不知为何挂不住，只能躺在绳网里。甘道夫说倒水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哆啦A梦一点一点地浮在上面，很绝望的样子。看这么一个杯子，你能想到的只是：很好玩。

甘道夫或者丸仔对绳缚的解释大概也是想有一个去情色化的过程。他说到绳缚的含义多种多样。人类每个文化中都有与绳缚有关的情欲表达。最简单的就是与刑罚有关，跟犯人有关。我们现在总是会想到日本绳缚文化，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有一个蓬勃发展成人文化，有销量很高的成人杂志，竞争激烈，就有细分市场，就有与绳缚相关的、与S&M相关的杂志，后来还有电影、小电影；再接下来竞争就会刺激发展，我怎么比你更厉害，我更不一样，就会有人说我更艺术，“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会强调艺术的维度的，它一点点从情色相关的东西里出来”。到2000年左右，发生了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一些西方人到日本来学，日本人也把绳缚带到国外去表演，它就被当成一种“来自东方的……”“古老的情欲表达……”，这个时候就与艺术与文化这些东西完全关联起来。看到它的人多了，许多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了，有的像冥想，有的像杂技。“墙内开花墙外香”，甘道夫用这个词解释日本绳缚文化的传播。他会介绍情色化之外的其他可能性，也想把人们对绳缚的想象力从情色产业的强相关性上解绑——每个人都可能决定绳缚意味着什么。但他也讨厌“去情色化”这个说法，他不会否定绳缚和情欲的关系，毕竟那等于否定了自己。

不过，他希望自己做的是一个在风格和审美上更接近于他的理想的绳缚社群。他喜欢有点禅意、有点忧伤”的那种感觉，而那时候的绳缚多半都与很吵的音乐结合，而且，他甚至觉得当时的绳缚活动里有些以捕猎异性为目的的参与者，让他觉得不是很安全。

这是绳缚潜伏的一个矛盾。它要实践；绳缚在发展过程当中就是来自于一种情色文化；它还要借助于视觉媒介在传播，图片影像必不可少……“不光是日本文化的背景，在

## 专栏

# 064 甘道夫 别想那绳子！

伊险峰 | 接力访问

“只有真心想要与你对话的人  
才会留在你的绳子里。”

每个人在提到绳缚的时候，都要很正式地补充一句：“唔，大家总是把它和性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是……”开始这么说的是丸仔，[他介绍下一个接力访问的人](#)时这么说。甘道夫也这么说。

甘道夫就是那个做绳缚的艺术家。工作室墙上挂了不少绳子，不粗，不会给人以太多压力，颜色各异，看起来甚至有点像女生的小摆设；四周挂着一些网，就是毛线粗细的绳子绷在大大小小的圆圈上；还有一些零碎小玩意。大的是几个悬在半空中的横梁，我在来之前看甘道夫的朋友圈，会有人被绑起来挂在横梁上。

“……实际上它是一种用身体对话的方式”，那天下午，甘道夫蜷在他的榻榻米上，至少为我们说了四五次“它实际上是……”。

甘道夫2018年回国，之前的四年在美国读认知心理学博士，那一段听起来有点像伍迪·艾伦那种知识分子风格的悲剧故事。甘道夫上高中时就有志于心理学，高中死党的爸爸——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他指点迷津，要做学术研究，还是要在美国接受训练。甘道夫不孚所望，从本科到博士，走在学术正途之上，每天做各种实验，人前欢乐充实，人后思考人生意义何在，绷了将近四年，终于败下阵来，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让任何人生活变得更好”，意义有限，道路漫长：先休一学期的学再说。没想到他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在他们那个团队里，每个人都以为对方充实快乐，把最美好一面呈现给同事导师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教学评估，次次被认定为happy department，甘道夫一休学，大家纷纷诉苦，原来很多人都在暗中吃药或者找心理医生咨询。可怜导师熬了多少年做学术助理，人到中年，生了两个孩子，蒙上天眷顾，时来运转，终于谋得一份教职，带上了博士生，第一个学生就是来自中国的甘道夫，教到学生抑郁，成了“履历上面永远的



各个国家的文化里,它都有一个可能是很异性恋视角产生的男性凝视。”

许多绳缚实践往往就会成为这种习惯性视角的再现:一个纤瘦的或者是很很多曲线的女性在绳子里面,默认的绳手是一个男人……“所以,我觉得既然没有我想要的空间,我就创造自己理想的空间,打破这些规范让绳子更自由一点。那个时候开始做一些分享,看起来大家还喜欢。”

很快,甘道夫做了一个叫“心意”的绳缚课程。

“第一,我们选择了绳缚这样一种媒介,它需要我们去和彼此共同完成;第二,这东西本身又很有争议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激发一次对话的机会了。”

请注意,这个时候开始进入甘道夫所说“它实际上是对话”那个话题中了。

“2020年的时候,环境已经很紧张了。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想写一些公众号文章什么的,后来发现不行,”我问是有关绳缚的文章发不出来吗?他说不是,“是发出来之后,你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这篇文章就不见了,像从来没有那篇文章一样。”

甘道夫说出很多个线下活动组织者经常会说到的那个问题,“不是特别信任基于互联网的公共表达”,“也不是不信任,就是我觉得我不能依赖这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会让你没有安全感。因为平台不是你自己的,你跟你的读者却要依赖于这个东西,然后你非常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你们的联系消失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科学性,不要忘了,甘道夫是个认知心理学候选(肄业)博士……

“传统意义上大家都理解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意识,大家会想这是一个大脑的功能,但现在更多的人特别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会向前一步思考。思维不光是大脑的功能,它是人的大脑、身体和环境耦合形成的一个现象。我们说在场,在场的还有我们的身体,而它往往被认为是在我们的对话和表达之外的,所以现在是重新把身体性强调出来,把它看作一种思考和对话的媒介。”

“我们从触觉入手,我们把触觉当成一种语言来认识它,然后去发现更多的新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很自发地产生很关于性别、关于关怀、关于社会的对话……所有这些东西会在大家使用身体对话的过程当中自发地呈现出来。”

听起来有点玄?“是不是跟你们做认知实验这些东西有点像?”

“某种意义上它就不再是一个实验,这算应用了。所以每一次做工作坊,其实我都会收获非常多的非常珍贵的大家的发现和感受,这是以前做科研不会有的东西。”



拥抱练习是“心意”中最常用的练习

“比如说,拥抱是一种常见的人际联系,现在关键是你如何用绳子去拥抱一个人?当你想要拥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身体就这么大,所以什么是触觉的延伸?你能够提供的拥抱是有限的,所以不要去想绑这件事情,当你的身体被绳子或者什么别的媒介延伸的时候,当你把张力固定在身体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拥抱留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你使用一种材料去延伸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拥抱一个人很多次,所以这时候很多人就会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安全感和被接纳的感觉。不要想绑。触摸。触摸。”

我表示还是不懂,但我很谦虚,表示我在“触觉叙事”上不是在行,过于“依赖文字或者语言的表达”,它很有可能真的是有局限性的。

甘道夫对于我的谦逊表示满意,他像一个布道者循循善诱用你的身体,用触觉去叙事,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探索如何用绳子去延伸你的新的体验。”

“拥抱的本质是束缚。当你被一个人抱住的时候,你在那里,哪里也去不了。如果你在大街上,跟一个陌生人,说我要抱一抱你,你不会要的,它是束缚啊。如果这是你想要和他在一起的人,这个行为就成为拥抱了,所以说它背后的是我们自己创造意义的方式。”我似是而非地点头,其实心里想的是:“呵,甘道夫,真有你的,我都有点信了。”

“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共同创造了意义。”甘道夫的学术演讲到了关键时刻,“类似的练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非常有趣的思考,包括很多男生,他们可能因为性别或者文化的原因,在生活当中很少去接纳别人给他的关怀,或者展示自己的脆弱性,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缺少的体验。”

这个我就很理解,我甚至觉得两个直男是无法聊天的,有的时候要借助某种媒介物,比如酒,喝上那么一点,才会开始正常的对话。

“所以,有的时候很震撼。因为自己的工作坊里不会有很多男生出现,有一次参加别人的一个活动,他们有艺术表达的环节,我算是导师,我看到那些男生,很壮的男生,就在那里啜泣,很震撼。他感受到了一些他没有感受的东西。”

这听起来很团建啊。感觉像拓展。我就说出来了。

“我也有团建项目。”我看看绳子,想哪个公司这么有魄力,“我也是所有互动都要用到绳子,我也有纯肢体的,比如我也做过一个手的旅程的练习,你就从皮肤到肌肉到骨骼里头的方式去触摸一个人,这是你走的一个旅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很多人就会感动。”

对于没有实际体验过甘道夫的活动的人——比如我——他总是觉得文字描述差点意思。

“比如一位朋友没有绳缚经验,谈到绳缚便总会聊到暴力与性张力,但我总觉得他在分析的是绳缚的图片,而不是绳缚的体验。我想在具身经验不在场的情况下谈论身体艺术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他又觉得这件事不应该难以理解:“人类一直在使用工具延展自己的感知觉,用绳子(或是任何一种材料)去沿伸触觉或许就像用望远镜延伸视觉一样简单。”

因为缺乏体感,我们就得使用排除法。



工作坊练习: 手的旅程

比如疗愈。甘道夫坚决否认。“我们这种工作坊很容易让大家觉得是一种疗愈性体验,大家觉得有安全感,就会吸引一些刻意做疗愈的。我不做。很多人做,最后他们就变成卖水晶、卖香水、还有卖外星船票的,充满新自由主义的臭气。”

冷不丁冒出一个“新自由主义”,他也觉得有点突兀,后来我理解他大概说的就是铜臭气,

就跟很多人在提到这种最后商品化焦虑的时候归结为大资本一样。(不过,这种纯粹而且有意的市场化,倒也与新自由主义有相通之处。)

这倒是一个必要的姿态。

“我觉得 2020 年疫情开始之后,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包括我开始做活动能成功,也是因为很多人忽然没有了工作。他们需要知道我不工作的时候我是谁。他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其实每个人都很痛苦。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表现得很强大,然后这个时候你表现出你的脆弱性,就变成了你的能力问题。”甘道夫在解释他的工作坊,但我似乎感觉是在说他自己读博士时的感受,“所以我选择绳缚这个方式,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不是要把你自己封闭到一个什么庙里面,然后切断外界联系,逼着你自己去解决困境,它是在一个对话当中完成的;第二个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脆弱性建立连接,每个人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是他独特的地方,把平常在企业里表现出来的干练啊、强大啊这层修饰去掉。”



甘道夫的网,他给教人织网的工作坊起名叫“一张网就是一个世界”

在他的榻榻米上坐久了,我站起来,走到那堆大大小小的毛线网前面。有一个有特别的位置,放在房间里的旧壁炉前。

这是什么?

“就是一个网。大家做了一系列工作,然后它变成了这个。工作坊的人。他们就是为了织网而织网。”

唔。

“它很迷人。它跟身体探讨差不多,理解成它是一种生成性艺术,像有个算法一样,它就是一个 process,不要去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你去感受绳子想去哪里。最后它会形成一个世界。”

感受绳子想去哪里。

甘道夫说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待在哪个地方,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想着的是休一个学期,没休够,就再休一个学期。一下子四年多就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他听说了某个地方出了某件事,他不知道这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觉得他应该去看看,在有两个街区远的地方,他下车,他怕给司机添麻烦,然后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他感觉很震撼,他没想到会是这样子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感觉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世界要毁灭了,另一方面又觉得世界好有希望,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其实就挺想要做一个留在国内的人。

“为什么男生少?”我想起之前聊到的事。

“首先参加身体类活动的参与者里女性普遍会更多一些,其次确实很多人对绳缚的理解就是情色,所以会有一些男生也是带着捕猎的心态参加活动。它就跟一些人去玩飞盘的想法一样。他可能也不是有恶意,也是想正常交往,但我在乎的是这个空间是不是让大家觉得有安全感,要从女性参与者的角度去考虑,我更在乎她们的体验。我会请男性参与者和自己的练习搭档(性别不限)一起报名,这样这个空间就不会让人产生有游荡的捕猎者的感觉。还有一些男性参与者自己会感到尴尬,或者拒绝和其他男性合作担心别人会笑。所以有人曾经只能自己待着,看三个小时手机,请他们和搭档一起报名他们自己的体验也会更好。”

“我会把这种规则理解为:为女性参与者创建安全空间的过程。”

甘道夫在谈话过程中会经常提到女性和酷儿的感受。他说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他的前(可能是好多个前)任是学电影研究的,有一天晚上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甘道夫瞬间领悟,这是对的。从此就是女性主义者了。

虽然这有利于他的这个事业——减少了污名化绳缚的机会,但他也不喜欢这个过程中付出“污名化情色”的代价。

他不认为这事不重要。并且它的情色起源很客观,就在那里。他总是用探戈来举例,探戈也有同样的文化起源、性的意味甚至性的模仿,诞生之初南美国家政府也是要禁止的,最后它还是会成为艺术。再说,为什么要污名情色化呢?健康的社会不是应该正视它吗?

我问有没有被人解读为色情活动?他说有些观望的人会这样想,但是参加过活动的人就不会了。如果有一天警察来了,他就邀请警察一起来参与工作坊(后来他补充,确实有从事警务的学员来参加工作坊,他的反馈是,部队里学捆绑要非常紧,像这样是会被教官骂的)。

我想象了一下这个画面,警察被他思维啊认知啊大脑啊触觉的延伸啊张力啊之类的词搞懵,着了他的道,捆成一团,好半天才会从暧昧中醒过来: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怎么被绑起来了?我要不要报警?

想着想着就很欢乐。这都快赶上昆德拉了。



**Q: 最近有啥有意思的事儿?**

A: 9月初要去柏林参加一场酷儿绳缚会议,五天的时间和世界各地的酷儿绳缚实践者们一起交流。我和组织方是疫情期间认识的,那个时候虽然世界封闭了,但反而多了许多线上联系的机会。大家的经验很相似,对传统绳缚有些疲倦,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相互给予了很多支持,比如 2022 年出不了门的时候,许多人会自发为我们组织一些免费的活动,线上冥想什么的,当时很感动。这次终于要线下见面了,虽然会是第一次见面,但总觉得已经认识很久了。

**Q: 你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希望找到一个想要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的人。最近很多人都离开了,现在可能偶尔有人来帮个忙教学,但我希望有人跟我一起做长期的教学搭档,一起去组织活动。这种合作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又很亲密,所以可能比找对象还难,需要 ta 愿意一起进行探索和尝试,还要有相似的或者共通的东西,在教学当中从各自的视角去和别人分享。我希望能从 ta 那里学很多的东西。

**Q: 你想找谁来接力?**

A: 我的朋友怡宁也是身体工作坊的领导者,她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从人类学者走向对身体的探索;还有一个是“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演员汤包。戏剧也有一种很大的力量,汤包在戏剧中把对人的倾听和创作结合在一起,他也是蛮值得去链接的一个人。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二，2023.08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